



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一九五三年·北京

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平裝本定價一萬五千元

一九五三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二版

一九五三年七月上海第二次印刷

累計印數 800,001—1,100,000冊

書號 1—3

目錄

抗日戰爭時期(下)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七六九—七七四
序	七六九
跋	七九三
改造我們的學習(一九四一年五月)	七九五—八〇三
揭破遠東慕尼黑陰謀(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八〇五—八〇六
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綫(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八〇七—八〇八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八〇九—八二三
整頓黨的作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八二三—八三〇
反對黨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八三一—八四七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	八四九—八八〇

引言	八四九
----	-----

結論	八五四
----	-----

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	八二一—八四四
----------------------	---------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八五—八九〇
-------------------------	--------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	八九一
------------------------	-----

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八九三—八九六
--------------------------	---------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八九九—九〇四
------------------------	---------

質問國民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九〇五—九一二
-------------------	---------

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九一三—九一六
-------------------------------	---------

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九一七—九三〇
--------------------------------	---------

組織起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九三一—九三九
--------------------	---------

學習和時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九四一—九五四
-------------------	---------

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九五五—一〇〇三
----------------------------	----------

爲人民服務（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一〇〇三—一〇〇四
------------------	-----------

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	一〇〇五—一〇〇八
-------------------------	-----------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綫（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一〇〇九—一〇一一
------------------------	-----------

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1031—1039
游擊區也能够進行生產（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1031—1034
兩個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1035—1038
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1039—1040
一 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	1039
二 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	1040
三 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綫	1041
中國問題的關鍵	1043
走着曲折道路的歷史	1044
人民戰爭	1046
兩個戰場	1047
中國解放區	1048
國民黨統治區	1049
比較	1047
『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是誰？	1049
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	1050
內戰危險	1051

談判.....一〇五二

兩個前途.....一〇五三

四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一〇五四

我們的一般綱領.....一〇五五

我們的具體綱領.....一〇六三

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的任務.....一〇八八

中國淪陷區的任務.....一〇八九

中國解放區的任務.....一〇九一

五 全黨團結起來，為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一〇九四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二〇一二—二〇四

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

二十七日）.....二〇五一—二〇九

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二二—二四

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二五—二六

給福斯特同志的電報（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二七—二八

對日寇的最後一戰（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二九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

(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序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現在黨的農村政策，不是十年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一〕，應該執行即將到來的七次大會的指示。所以印這個材料，是爲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裏担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對於担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

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的幾個，井岡山的幾個，都失掉了。這裏印的，主要的是一個『興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和一個『才溪鄉調查』。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幹部，或者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和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鄖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該縣的一個小獄吏。興國調查和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和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够。必須給予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羣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地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於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能有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斯大林的話說得對：『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二)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並非說我是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羣衆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跋（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

十年內戰時期的經驗，是現在抗日時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參考。但這是指的關於如何聯繫羣衆和動員羣衆反對敵人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線這一方面。黨的策略路線，在現在和過去是有原則區別的。在過去，是反對地主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在現在，是聯合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就是在十年內戰的後期，對於向我們舉行武裝進攻的反動的政府和政黨，和對於在我們政權管轄下一切帶資本主義性的社會階層，沒有採取不同的政策，對於反動的政府和政黨中各個不同的派別間，也沒有採取不同的政策，這些也都是不正確的。那時，對於農民和城市下層小資產者以外的一切社會成份，執行了所謂『一切鬥爭』的政策，這個政策無疑是錯誤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對於十年內戰前期和中期所採取的，也分配給地主一份和農民同樣的土地、使他們從事耕種、以免流離失所或上山爲匪破壞社會秩序，這樣的正確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錯誤的。現在，黨的政策必須與此不同，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也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那樣），而是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階層，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綫，但對他們中間存在着投降敵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動搖性反動性方面，又應按其不同程度，同他們作各種不同形式的鬥爭。現在的政策，是綜合『聯合』和『鬥爭』的兩重性的政策。在勞動政策方面，是適當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

礙資本主義經濟正當發展的兩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減租減息又規定農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兩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權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資本家都有和工人農民一樣的人身權利、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利，但又防止他們可能的反革命行動的兩重性的政策。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應該發展的，但在目前的農村根據地內，主要的經濟成份，還不是國營的，而是私營的，而是讓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得着發展的機會，用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制度。這是目前中國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對和阻礙這個政策的施行，無疑義地是錯誤的。嚴肅地堅決地保持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的純潔性，和保護社會經濟中的有益的資本主義成份，並使其有一個適當的發展，是我們在抗日和建設民主共和國時期不可缺一的任務。在這個時期內一部分共產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化，在黨員中發生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可能的，我們必須和這種黨內的腐化思想作鬥爭，但是不要把反對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的鬥爭，錯誤地移到社會經濟方面，去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成份。我們必須明確地分清這種界限。中國共產黨是在複雜的環境中工作，每個黨員，特別是幹部，必須鍛鍊自己成爲懂得馬克思主義策略的戰士，片面地簡單地看問題，是無法使革命勝利的。

〔註釋〕

〔一〕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的中央指示，是指當時所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決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即本書第二卷所載『論政策』一文。

〔二〕引自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三部分。

〔三〕這裏所說的十年內戰前期，是指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底的時期，亦即人們通常所稱的井岡山時期；中期是指一九二九年初至一九三一年秋的時期，即自中央紅色根據地的創立至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結束的時期；後期是指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底的時期，即自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結束後至黨中央在貴州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時期。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結束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內的統治，使黨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參看本書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三部分。

改造我們的學習

(一九四一年五月)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和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對於這些的認識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爲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抗日戰爭以來，我黨根據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戰爭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和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中國歷史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二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據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和國際的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是對於國內和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這篇報告和「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兩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關於整風運動的基本著作。在這些文章裏，毛澤東同志進一步地從思想問題上總結了過去黨內路線的分歧，分析了廣泛存在於黨內的偽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主要是主觀主義的傾向，宗派主義的傾向，和作為這兩種傾向的表現形式的黨八股。毛澤東同志號召開展全黨範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即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則整頓作風的運動。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號召，很快地在黨內和黨外引起了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大論戰，鞏固了無產階級思想在黨內外的陣地，使廣大幹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系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認真地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却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和少數黨的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學習國際的革命經驗，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並不是爲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爲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的幹部，害處更大。

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

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的許多同志。

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裏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着嗎？

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和外國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檢來的。

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給了共產黨。

我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和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這條原則，於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和實際分離。在學校的教育中，在在職幹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在延安學了，到郿縣（二）就不

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¹⁾，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的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從先生那裏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

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我們黨裏的極壞的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存在着這種典型，而且爲數相當地多，爲害相當地大，不可等閒視之的。

三

爲了反覆地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是爲了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裏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而是爲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說：應當從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爲此目的，

就要像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我們的許多人却是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脫離實際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衆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态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

有一副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背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的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副對子

記下來；或者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裏的牆壁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实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

第二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說的那樣：把革命氣概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B)。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爲着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爲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

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衆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頭重腳輕根底淺』，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

(一) 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和必要的結論。爲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着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地亂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的了解，然後才會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二) 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

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

(三) 對於在職幹部的教育和幹部學校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爲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爲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應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爲中心的材料。『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

我們走過了許多彎路。但是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和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在學習問題上的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會有好的結果。

〔註釋〕

〔一〕 鄜縣在延安南面約七十公里。

〔二〕 『邊幣』是陝甘寧邊區政府銀行所發行的流通券。『法幣』是一九三五年以後，國民黨官僚資本四大銀行依靠英美帝國主義支持所發行的紙幣。毛澤東同志文中所說的，是指當時邊幣和法幣之間所發生的兌換比價變化問題。

〔三〕 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馬克思在該文中說：『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種種發展形態，並探究這種形態的內部關係。不先完成這種工作，則對於現實的運動，必不能有適當的敘述。』

〔四〕 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九部分『工作作風』。

揭破遠東慕尼黑陰謀*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 日美妥協，犧牲中國，造成反共、反蘇局面的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正在日美蔣之間醞釀着。我們必須揭穿它，反對它。

(二) 日本帝國主義以迫蔣投降爲目的的軍事進攻，現已告一段落，繼之而來的必然是誘降活動。這是敵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我們必須揭穿它，反對它。

(三) 日本和軍事進攻同時發動了謠言攻勢，例如所謂『八路軍不願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作戰』、『八路軍乘機擴大地盤』、『打通國際路線』、『另立中央政府』等等。這是日本挑撥國共關係以利誘降的詭計。國民黨『中央社』和國民黨報紙照抄散佈，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傳互相呼應，其用意所在，甚爲可疑。我們也應揭穿它，反對它。

(四) 新四軍雖被宣佈爲『叛變』，八路軍雖沒有領到一顆彈一文餉，然無一刻不與敵軍搏鬥。此次晉南戰役(二)，八路軍復自動配合國民黨軍隊作戰，兩週以來在華北各綫作全面出擊，至今猶在酣戰中。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衆已成了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對於共產黨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

抗戰失敗，以利投降。我們應發揚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反對一切失敗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

〔註釋〕

〔一〕晉南戰役即中條山戰役。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寇以五萬餘人的兵力進攻山西南部黃河北岸的中條山地區。結集在該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共七個軍，另在東北面的高平地區有四個軍，合計二十五萬人。國民黨在黃河以北的部隊，本以反共爲其主要任務，對日寇向無作戰準備，在日寇進攻時，大部採取避戰方針。因此，雖然八路軍在這個戰役中積極配合國民黨軍打擊日寇，國民黨軍仍然全部潰敗，在三週之內，喪失了五萬餘人的兵力，餘下的部隊也渡河逃跑。

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綫*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德國法西斯統治者已於六月二十二日進攻蘇聯。此種背信棄義的侵略罪行，不僅是反對蘇聯的，而且也是反對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的。蘇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聖戰爭，不僅是保衛蘇聯的，而且也是保衛正在進行反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鬥爭的一切民族的。

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綫，爲着反對法西斯而鬥爭，爲着保衛蘇聯、保衛中國、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鬥爭。在目前時期，一切力量須集中於反對法西斯奴役。

中國共產黨在全中國的任務是：

- (一) 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堅持國共合作，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即用此以援助蘇聯。
- (二) 對於大資產階級中的反動分子的任何反蘇反共的活動，必須堅決反抗。
- (三) 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毛澤東選集

抗日戰爭時期

八〇八

* 這是毛澤東同志爲中共中央寫的對黨內的指示。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各位參議員先生，各位同志：今天邊區參議會開幕，是有重大意義的。參議會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中國。現在的中國不能有別的目的，只能有這個目的。因為現在我們的主要敵人不是國內的，而是日本和德意法西斯主義。現在蘇聯紅軍正在爲蘇聯和全人類的命運奮鬥，我們則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還在繼續侵略，它的目的是要滅亡中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就是要團結全國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和全國一切抗日的黨派、階級、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漢奸，都要聯合一致，共同奮鬥。共產黨的這種主張，是始終一致的。中國人民英勇抗戰已有四年多，這個抗戰是由國共兩黨的合作和各階級各黨派各民族的合作來支持的。但是還沒有勝利，還要繼續奮鬥，還要使革命的三民主義見之實行，才能勝利。

為什麼我們要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因爲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直到現在還沒有在全中國實現。為什麼我們在現在不要求實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當然是一個更好的制度，這個制度在

蘇聯早已實行了，但是在今天的中國，還沒有實行它的條件。陝甘寧邊區所實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義。我們對於任何一個實際問題的解決，都沒有超過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範圍。就目前來說，革命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其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就是要為全國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而不是只為一部分人謀利益。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佔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項政策，都是為着團結一切抗日的人民，顧及一切抗日的階級，而特別是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在土地關係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使農民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過活。在勞資關係上，我們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也有利可圖。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團結全國人民，合力抗日。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政策；我們希望不但在陝甘寧邊區實行，不但在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並且在全國也實行起來。

我們實行這種政策是有成績的，是得到全國人民贊成的。但是也有缺點。一部分共產黨員，還不

善於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還保存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的作風，他們還不明白共產黨員有義務同抗日的黨外人士合作，無權利排斥這些黨外人士的道理。這就是要傾聽人民羣衆的意見，要聯繫人民羣衆，而不要脫離人民羣衆的道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上有一條，規定共產黨員應當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就是針對着這一部分還不明白黨的政策而同志而說的。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並要跟別人的長處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後慢慢加以解釋。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爲是，盛氣凌人，以爲自己是什麼都好，別人是什麼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裏，自吹自擂，稱王稱霸。除了勾結日寇漢奸以及破壞抗戰和團結的反動的頑固派，這些人當然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使說錯了也是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只要社會上還有黨存在，加入黨的人總是少數，黨外的人總是多數，所以黨員總是要和黨外的人合作，現在就應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我想，我們共產黨的參議員，在我們這樣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參議會中受到很好的鍛鍊，克服自己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我們不是一個自以爲是的小宗派，我們一定要學

會打開大門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善於同別人商量問題。也許到今天還有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說，如果要和別人合作，我們就不幹了。但是我相信，這樣的人是極少的。我向各位保證，我黨絕大多數的黨員是一定能夠執行我黨中央的路綫的。同時也要請各位黨外同志了解我們的主張，了解共產黨並不是一個只圖私利的小宗派、小團體。不是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辦法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强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

各位參議員先生不辭辛勤，來此開會，我很高興地慶祝這個盛會，慶祝這個盛會的成功。

整頓黨的作風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黨校今天開學，我慶祝這個學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講一點關於我們的黨的作風的問題。

爲什麼要有革命黨？因爲世界上有壓迫人民的敵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敵人的壓迫，所以要有革命黨。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說來，就需要一個如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人民要想推翻敵人的壓迫，簡直是不可能的。我們是共產黨，我們要領導人民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步調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末，敵人就不會被我們打倒。

現在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呢？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是沒有問題的，黨的工作也是有成績的。黨有幾十萬黨員，他們在領導人民，向着敵人作艱苦卓絕的鬥爭。這是大家看見的，是不能懷疑的。

那末，究竟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呢？我講，還是有問題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還相當嚴重。

什麼問題呢？就是有幾樣東西在一些同志的頭腦中還顯得不大正確，不大正確。

這就是說，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主觀主義的毛病。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宗派主義的毛病。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黨八股^(一)的毛病。這些作風不正，並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佔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裏跑出來的。（笑聲）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產生這種歪風的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們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佔全黨統治地位的東西，但是它們還在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說明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確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會上的演說。

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被我們打倒的。

現在我來講一講主觀主義。

主觀主義是一種不正派的學風，它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它是和共產黨不能並存的。我們要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風。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

現在有些糊塗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着。例如關於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識分子，什麼是理論和實際聯繫等問題的糊塗觀念。

我們首先要問，我們黨的理論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呢？近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人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黨的理論水平已經是提得很高了呢？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比較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綫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落後。一般地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和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有多少人創造了可以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科學形態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是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

了，但是還沒有產生一本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理論書。像在中國經濟問題方面，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像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我們讀了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能不能就算是有理論家呢？不能這樣說。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他們的著作，但是沒有進一步地根據他們的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沒有企圖在理論上來思考中國的革命實踐，我們就不能妄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果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員，却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只能記誦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的結論和個別的原理，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綫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一個人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呢？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麼樣的人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够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够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真正領會列寧斯大林關於殖民地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學說，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現在我們黨的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

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後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這個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黨校的同志不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當成死的教條。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够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現在我們的黨校也要定這個規矩，看一個學生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怎樣看中國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會看的，有不會看的，這樣來分優劣，分好壞。

其次講一講所謂『知識分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對於知識分子覺得特別寶貴。黨中央在兩年多以前作過一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決定^(三)，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日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於是有人說：『哈！你弄顛倒了，亂說一頓。』（笑聲）但是，同志，你別着急，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

什麼是知識？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

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同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裏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呢？一個人從那樣的小學一直讀到那樣的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有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還沒有參加任何實際活動，還沒有把自己學得的知識應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門裏去。像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因為他的知識還不完全。什麼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須知道，就一定的情況說來，這種知識對於他們還是片面性的，這種知識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證明的。最重要的，是善於將這些知識應用到生活和實際中去。所以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些。

有什麼辦法使這種僅有書本知識的人變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他們參加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使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實際問題。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我這樣說，難免有些人要發脾氣。他們說：『照你這樣解釋，那末，馬克思也算不得知識分子了。』

我說：不對。馬克思不但參加了革命的實際運動，而且進行了革命的理論創造。他從資本主義最單純的因素——商品開始，周密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商品這個東西，千千萬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科學地研究了它，他從商品的實際發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學的理論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這樣，馬克思就成了一個代表人類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識分子。他和那些僅有書本知識的人有根本的區別。馬克思在實際鬥爭中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得到的結論又拿到實際鬥爭中去加以證明，這樣的工作就叫做理論工作。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學做這樣的工作。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學習從事於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他們大都是聰明有爲的人，我們要看重他們。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犯過的錯誤他們不應重複。他們必須拋棄教條主義，必須不停止在現成書本的字句上。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說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對於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的人往往經驗很多，這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他們就以自己的經驗爲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於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和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業做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一種是偏於感性和局部的知識，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知識。

但是，我們的工農幹部要學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①一套，這種學習的內容雖然陳舊了，但是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何況現在不是學的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語、歷史、地理和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我們黨中央現在着重要求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為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那一門都可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却沒有學習理論的可能。

由此看來，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爲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爲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

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

所以，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並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但是在這兩種主觀主義中，現在在我們黨內還是教條主義更為危險。因為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克思主義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他們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書本知識的幹部，願意和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願意從事實際事物的研究，可以產生許多理論和經驗結合的良好工作者，可以產生一些真正的理論家。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們的經驗上升成為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除了對於『理論家』和『知識分子』存在着糊塗觀念而外，還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和實際聯繫』，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個糊塗觀念。他們天天講『聯繫』，實際上却是講『隔離』，因為他們並不去聯繫。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繫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却在那裏『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讚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鑑賞家，幾

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爲着好看，也不是因爲它有什麼神秘，只是因爲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科學。直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氣力地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者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應該作啓蒙運動。那些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地對他說，你的教條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曾經反覆地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些人偏偏忘記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話。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於應用列寧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繫。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繫，行動上又不實行聯繫，那末，講一百年也還是無益的。我們反對主觀地片面地看問題，必須攻破教條主義的主觀性和片面性。

關於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全黨的學風的問題，今天講的就是這些。

現在我來講一講宗派主義的問題。

由於二十年的鍛鍊，現在我們黨內並沒有佔統治地位的宗派主義了。但是宗派主義的殘餘是還

存在的，有對黨內的宗派主義殘餘，也有對黨外的宗派主義殘餘。對內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對外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剷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能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和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

什麼是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呢？主要的有下面幾種：

首先就是鬧獨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見局部利益，不看見全體利益，他們總是不適當地特別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總希望使全體利益去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他們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張國燾是向黨中央鬧獨立性的，結果鬧到叛黨，做特務去了。現在講的，雖然不是這種極端嚴重的宗派主義，但是這種現象必須預防，必須將各種不統一的現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個黨員，每一種局部工作，每一項言論或行動，都必須以全黨利益爲出發點，絕對不許可違反這個原則。

鬧這類獨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個人第一主義分不開，他們在個人和黨的關係問題上，往往是不正確的。他們在口頭上雖然也說尊重黨，但他們在實際上却把個人放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劉少奇同志曾經說過，有一種人的手特別長，很會替自己個人打算，至於別人的利益和全黨的利益，那是不大關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大笑）這種人鬧什麼東西呢？鬧名譽，鬧地位，鬧出風頭。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業的時候，就要鬧獨立性。爲了這些，就要拉攏一些人，排擠一些人，

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資產階級政黨的庸俗作風也搬進共產黨裏來了。這種人的吃虧在於不老實。我想，我們應該是老老实實地辦事；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什麼人是老實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是老實人，科學家是老實人。什麼人是不老實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是大不老實的人，爲個人利益爲局部利益鬧獨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實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爲得計，自以爲很聰明，其實都是最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我們黨校的學生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集中的統一的黨，一切無原則的派別鬥爭，都要清除乾淨。要使我們全黨的步調整齊一致，爲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我們一定要反對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

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必須團結，必須反對宗派主義傾向。因爲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後才創立的，許多地方工作是外來幹部去後才發展的，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關係，必須加以很好的注意。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在這種條件下，只有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完全團結一致，只有本地幹部大批地生長了，並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內才能生根，否則是不可能的。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必須互相取長補短，才能有進步。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和聯繫羣衆這些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的情況的了解，對於和陝北人民的聯繫，和高崗同志他們比較起來就差得多。我們到山西、河北、山東以及其他抗日根據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不但如此，即在一個根據地內部，因

爲根據地內的各個區域有發展先後之不同，幹部中也有外來本地之別。比較先進區域的幹部到比較落後的區域去，對於當地，也是一種外來幹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幹部的問題。就一般情形說來，凡屬外來幹部負領導責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幹部的關係弄得不好，那末，這個責任主要地應該放在外來幹部的身上。担负主要領導責任的同志，其責任就更大些。現在各地對這個問題的注意還很不够，有些人輕視本地幹部，譏笑本地幹部，他們說：『本地人懂得什麼，土包子！』這種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幹部的重要性，他們既不了解本地幹部的長處，也不了解自己的短處，採取了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態度。一切外來幹部一定要愛護本地幹部，經常幫助他們，而不許可譏笑他們，打擊他們。自然，本地幹部也必須學習外來幹部的長處，必須去掉那些不適當的狹隘的觀點，以求和外來幹部完全不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義傾向。

軍隊工作幹部和地方工作幹部的關係也是如此。兩者必須完全團結一致，必須反對宗派主義的傾向。軍隊幹部必須幫助地方幹部，地方幹部也必須幫助軍隊幹部。如有糾紛，應該雙方互相原諒，而各對自己作正確的自我批評。在軍隊幹部事實上居於領導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幹部的關係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責任應該放在軍隊幹部的身上。必須使軍隊幹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責任，以謙虛的態度對待地方幹部，才能使根據地的戰爭工作和建設工作得到順利進行的條件。

幾部分軍隊之間、幾個地方之間、幾個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必須反對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本位主義的傾向。誰要是對別人的困難不管，別人要調他所屬的幹部不給，或以壞的送人，『以

鄰爲壑』，全不爲別部、別地、別人想一想，這樣的人就叫做本位主義者，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產主義的精神。不顧大局，對別部、別地、別人漠不關心，就是這種本位主義者的特點。對於這樣的人，必須加重教育，使他們懂得這就是一種宗派主義的傾向，如果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老幹部和新幹部的關係問題。抗戰以來，我黨有廣大的發展，大批新幹部產生了，這是很好的現象。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老幹部通常總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數量少，而且由於宇宙自然法則的關係，他們已部分地開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這裏講了幹部狀況，又講了自然科學。我們黨如果沒有廣大的新幹部同老幹部一致合作，我們的事業就會中斷。所以一切老幹部應該以極大的熱忱歡迎新幹部，關心新幹部。不錯，新幹部是有缺點的，他們參加革命還不久，還缺乏經驗，他們中的有些人還不免帶來舊社會不良思想的尾巴，這就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殘餘。但是這些缺點是可以從教育中從革命鍛鍊中逐漸地去掉的。他們的長處，正如斯大林說過的，是對於新鮮事物有銳敏的感覺，因而有高度的熱情和積極性，而在這一點上，有些老幹部則正是缺乏的⁽⁵⁾。新老幹部應該是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便團結一致，進行共同的事業，而防止宗派主義的傾向。在老幹部負主要領導責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幹部和新幹部的關係弄得不好，那末，老幹部就應該負主要的責任。

以上所講的局部和全體的關係，個人和黨的關係，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關係，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關係，軍隊和軍隊、地方和地方、這一工作部門和那一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老幹部和新幹部

的關係，都是黨內的相互關係。在這種種方面，都應該提高共產主義精神，防止宗派主義傾向，使我們的黨達到隊伍整齊，步調一致的目的，以利戰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整頓黨的作風，必須澈底地解決這個問題。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係上的一種表現；我們如果不要主觀主義，要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須掃除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以黨的利益高於個人和局部的利益爲出發點，使黨達到完全團結統一的地步。

宗派主義的殘餘，在黨內關係上是應該消滅的，在黨外關係上也是應該消滅的。其理由就是：單是團結全黨同志還不能戰勝敵人，必須團結全國人民才能戰勝敵人。中國共產黨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上，二十年來做了艱苦的偉大的工作；抗戰以來，這個工作的成績更加偉大。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所有的同志對待人民羣衆都有了正確的作風，都沒有了宗派主義的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確實還有宗派主義的傾向，有些人並且很嚴重。我們的許多同志，喜歡對黨外人員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視人家，而不願尊重人家，不願了解人家的長處。這就是宗派主義的傾向。這些同志，讀了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之後，不是更謙虛，而是更驕傲了，總是說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實在是一知半解。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一條真理：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員相比較，無論何時都是佔少數。假定一百個人中有一個共產黨員，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中就有四百五十萬共產黨員。即使達到這樣大的數目，共產黨員也還是只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黨員。我們有什麼理由和非黨人員合作呢？對於一切願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

們的權利。一部分黨員却不懂得這個道理，看不起願意同我們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給了我們這樣的根據嗎？沒有。相反地，他們總是諄諄告誡我們，要密切聯繫羣衆，而不要脫離羣衆。中國共產黨中央給了我們這個根據嗎？沒有。中央的一切決議案中，沒有一個決議說是我們可以脫離羣衆使自己孤立起來。相反地，中央總是叫我們密切聯繫羣衆，而不要脫離羣衆。所以，一切脫離羣衆的行爲，並沒有任何的根據，只是我們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來的宗派主義思想在那裏作怪。因爲這種宗派主義在一部分同志中還很嚴重，還在障礙黨的路綫的實行，所以我們要針對這個問題在黨內進行廣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們的幹部真正懂得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使他們懂得共產黨員如果不同黨外幹部、黨外人員互相聯合，敵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達到。

一切宗派主義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都和革命的實際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對宗派主義和反對主觀主義的鬥爭，應當同時並進。

關於黨八股的問題，今天不能講了，準備在另外一個會議上來討論。黨八股是藏垢納污的東西，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於革命的，我們必須肅清它。

我們要反對主觀主義，就要宣傳唯物主義，就要宣傳辯證法。但是我們黨內還有許多同志，他們並不注重宣傳唯物主義，也不注重宣傳辯證法。有些同志聽憑別人宣傳主觀主義，也安之若素。這些同志自以爲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們却不努力宣傳唯物主義，聽了或看了主觀主義的東西也不想

一想，也不發議論。這種態度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這使得我們許多同志蒙受了主觀主義思想的毒害，發生麻木的現象。所以我們要在黨內發動一個啓蒙運動，使我們同志的精神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蒙蔽中間解放出來，號召同志們對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加以抵制。這些東西好像日貨，因爲只有我們的敵人願意我們保存這些壞東西，使我們繼續受蒙蔽，所以我們應該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貨一樣。一切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貨色，我們都要抵制，使它們在市場上銷售困難，不要讓它們利用黨內理論水平低，出賣自己那一套。爲此目的，就要同志們提高嗅覺，就要同志們對於任何東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鑑別其好壞，然後才決定歡迎它，或者抵制它。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爲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最後，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後』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爲了救人，而不是爲了把人整死。一個人發了闌尾炎，醫生把闌尾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爲一個好同志。這個工作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

決不能採用魯莽的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

趁着今天黨校開學的機會，我講了這許多話，希望同志們加以考慮。（熱烈的鼓掌）

〔註釋〕

〔一〕參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註三八。入股文是完全沒有內容，專講形式的文字玩弄。這種文章的每一個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裏面，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制，人們只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黨入股』，是指在革命隊伍中某些人所寫的文章，這種文章對於事物不加分析，只是胡亂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詞和術語，言之無物，空話連篇，也和上述的入股文一樣。

〔二〕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關於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即本書第二卷所載『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文。

〔三〕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三部分。

〔四〕這是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語錄『論語』的開頭一句話。

〔五〕見斯大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第三部分第二節。

〔六〕抵制日貨是中國人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所常常採取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一種鬥爭方法。例如在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時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以及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人民都曾進行過抵制日貨的運動。

反對黨八股*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剛才凱豐同志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我現在想講的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怎樣拿黨八股做它們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以清算，那它們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它們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對於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最後地『將一軍』^(一)，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給自己看，那倒還不要緊。如果送給第二個人看，人數多了一倍，已屬害人不淺。如果還要貼在牆上，或付油印，或登上報紙，或印成一本書，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響許多的人。而寫黨八股的人們，却總是想寫給許多人看的。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早就反對過的^(二)。我們為什麼又叫它做黨八股呢？這是因為它除了洋氣之外，還有一點土氣。也算一個創作吧！誰說我們的人一點創作也沒有呢？這就是一個！（大笑）

黨八股在我們黨內已經有了一個長久的歷史；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時期，有時竟鬧得很嚴重。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於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

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閒者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醜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五四運動還有和這相聯繫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功績；這個反對老八股、老教條的鬥爭，也是它的大功績之一。但到後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我們黨內的一些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則發展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爲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條，在我們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這樣看來，『五四』時期的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主義的老八股、老教條的運動，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產生了新八股、新教條。它們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了；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後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

東西了。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是五四運動本來性質的反動。但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但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發生偏向，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是形式主義向『左』的發展。這樣看來，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並不是偶然的東西。我們懂得這一點是有好處的。如果『五四』時期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們用馬克思主義來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脫離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氣力，還是今後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

受另一個形式主義的束縛。至於我們黨內一部分（當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啓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而對於老八股和老教條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進行有力的鬥爭，也就達不到加以摧毀廓清的目的。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而是剝削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份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於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狂熱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它的一種表現形式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

要做對於這些東西的肅清工作和打掃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來必須得當，就是說，要好好地說理。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力的。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爲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

現在來分析一下黨八股的壞處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筆法，『來一個『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狀吧。』

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我們有些同志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什麼內容，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爲什麼一定要寫得那麼長，又那麼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羣衆看。因爲長而且空，羣衆見了就搖頭，那裏還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負幼稚的人，在他們中間散佈壞影響，造成壞習慣。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進行那麼大的反侵略戰爭，斯大林在七月三日發表了一篇演說，還只有我們『解放日報』一篇社論那麼長。要是我們的老爺寫起來，那就不得了，起碼得有幾萬字。現在是在戰爭的時期，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延安雖然還沒有戰爭，但軍隊天天在前方打仗，後方也喚工作忙，文章太長了，有誰來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歡寫長報告。他們辛辛苦苦地寫了，送來了，其目的是要我們看的。可是怎麼敢看呢？長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麼？也不好。我們應當禁絕一切空話。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務，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垃圾桶裏去。或者有人要說：『資本論』不是很長的麼，那又怎麼辦？這是好辦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話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又說：『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看情形辦理，文章和演說也是這樣。我們反對的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八股調，不是說任何東西都以短爲好。戰爭時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內容的文章。最不應該、最要反對的是言之無物的文章。演說也是一樣，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演說，是必須停止的。

黨八股的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有些黨八股，不只是空話連篇，而且裝樣子故意嚇人，這裏面包含着很壞的毒素。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則

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魯迅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裏面，却生怕人家駁，非常胆怯，於是就靠裝樣子嚇人；以為這一嚇，人家就會閉口，自己就可以『得勝回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從前許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說裏面，常常有兩個名詞：一個叫做『殘酷鬥爭』，一個叫做『無情打擊』。這種手段，用了對付敵人或敵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對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黨內也常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如『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結束語第四條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人，毫無疑義地是應該採用殘酷鬥爭或無情打擊的手段，因為那些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我們如果還對他們寬容，那就會正中壞人的奸計。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對付偶然犯錯誤的同志；對於這類同志，就須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這就是『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結束語第五條所說的方法。從前我們那些同志之所以向這些同志也大講其『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一方面是沒有分析對象，一方面就是爲着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無論對什麼人，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為這種嚇人戰術，對敵人是毫無用處，對同志只有損害。這種嚇人戰術，是剝削階級以及流氓無產者所慣用的手段，無產階級不需要這類手段。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至於以裝腔

作勢來達到名譽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頭，不待說的了。總之，任何機關做決定，發指示，任何同志寫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這個才能爭取革命勝利，其他都是無益的。

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早幾年，在延安城牆上，曾經看見過這樣一個標語：『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日勝利。』這個標語的意思並不壞，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筆不是寫的一直，而是轉了兩個彎子，寫成了『互』字。人字呢？在右邊一筆加了三撇，寫成了『及』字。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寫在抗日時期延安這地方的牆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許多人常常以爲自己寫的講的人家都看得懂，聽得很懂，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爲他寫的和講的是黨八股，人家那裏會懂呢？『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爲什麼不看對象亂彈一頓呢？何況這是黨八股，簡直是老鴉聲調，却偏要向人民羣衆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衆，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衆麼？我們和無論什麼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裏面想些什麼東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麼？做宣傳工作的人，對於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像個癰三〔三〕。上海人叫小癰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們的黨八股，乾癟得很，樣子十分難看。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癰三麼？一個人七歲入小學，十幾歲入中學，二十多歲在大學畢業，沒有和人民羣衆接觸過，語言不豐富，單純得很，那是難怪的。但我們是革命黨，是爲羣衆辦事的，如果也不學羣衆的語言，那就辦不好。現在我們有許多做宣傳工作的同志，也不學語言。他們的宣傳，乏味得很；他們的文章，就沒有多少人歡喜看；他們的演說，也沒有多少人歡喜聽。爲什麼語言要學，並且要用很大的氣力去學呢？因爲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羣衆學習語言。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好語言，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癰三一様，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第二，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份。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適用的東西。因爲中國原有語彙不够用，現在我們的語彙中就有很多是從外國吸收來的。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會，這『幹部』兩個字，就是從外國學來的。我們還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第三，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由於我們沒有努力學習語言，古人語言中的許多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沒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語彙和典故，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東西還是應該繼承。現在中黨八股毒

太深的人，對於民間的、外國的、古人的語言中有用的東西，不肯下苦功去學，因此，羣衆就不歡迎他們枯燥無味的宣傳，我們也不需要這樣蹩腳的不中用的宣傳家。什麼是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藝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也都是宣傳家。比如軍事指揮員，他們並不對外發宣言，但是他們要和士兵講話，要和人民接洽，這不是宣傳是什麼？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總有幾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

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舖。你們去看一看中藥舖，那裏的藥櫃子上有許多抽屜格子，每個格子上面貼着藥名，當歸、熟地、大黃、芒硝，應有盡有。這個方法，也被我們的同志學到了。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壹貳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還有大A B C D，小a b c d，還有阿刺伯數字，多得很！幸虧古人和外國人替我們造好了這許多符號，使我們開起中藥舖來毫不費力。一篇文章充滿了這些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析问题，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舖，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我不是說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說那種對待問題的方法不對。現在許多同志津津有味於這個開中藥舖的方法，實在是一種最低級、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標誌來分類，不是按照事物的內部聯繫來分類的。單單按照事物的外部標誌，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內部聯繫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說或一個報告，這種辦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遊戲。

戲，也會引導人家都做這類遊戲，使人不用腦筋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那裏有沒有解決的矛盾，那裏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於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麼，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着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裏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繫，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決問題。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說，如果是重要的帶指導性質的，總得要提出一個什麼問題，接着加以分析，然後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這樣，就不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能濟事。因為這種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形式主義的方法，在我們黨內很流行，所以必須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我們所辦的事才能辦好，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勝利。

黨八股的第六條罪狀是：不負責任，到處害人。上面所說的那些，一方面是由於幼稚而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責任心不足而來的。拿洗臉作比方，我們每天都要洗臉，許多人並且不止洗一次，洗完

之後還要拿鏡子照一照，要調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你們看，這是何等地有責任心呀！我們寫文章，做演說，只要像洗臉這樣負責，就差不多了。拿不出來的東西就不要拿出來。須知這是要去影響別人的思想和行動的啊！一個人偶然一天兩天不洗臉，固然也不好，洗後臉上還留着一個兩個黑點，固然也不雅觀，但倒並沒有什麼大危險。寫文章做演說就不同了，這是專為影響人的，我們的同志反而隨隨便便，這就叫做輕重倒置。許多人寫文章，做演說，可以不要預先研究，不要預先準備，文章寫好之後，也不多看幾遍，像洗臉之後再照照鏡子一樣，就馬馬虎虎地發表出去。其結果，往往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彷彿像個才子，實則到處害人。這種責任心薄弱的壞習慣，必須改正才好。

第七條罪狀是：流毒全黨，妨害革命。第八條罪狀是：傳播出去，禍國殃民。這兩條意義自明，無須多說。這就是說，黨八股如不改革，如果聽其發展下去，其結果之嚴重，可以鬧到很壞的地步。黨八股裏面藏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毒物，這個毒物傳播出去，是要害黨害國的。

上面這八條，就是我們申討黨八股的檄文。

黨八股這個形式，不但不便於表現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採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這種文風，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實，尚未得到普遍的發展。我們破壞了洋八股和黨八股之後，新的文風就可以獲得充實，獲得普遍的發展，黨的革命事業，也就可以向前推進了。

不但文章裏演說裏有黨八股，開會也有的。『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假使每處每回無大無小都要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黨八股嗎？在會場上做起『報告』來，則常常就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講好像對人不起。總之，不看實際情形，死守着呆板的舊形式、舊習慣，這種現象，不是也應該加以改革嗎？

現在許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學化、大衆化了，這很好。但是『化』者，澈頭澈尾澈裏澈外之謂也；有些人則連『少許』還沒有實行，却在那裏提倡『化』呢！所以我勸這些同志先辦『少許』，再去辦『化』，不然，仍舊脫離不了教條主義和黨八股，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沒有結果的。例如那些口講大衆化而實是小衆化的人，就更要當心，如果有一天大衆中間有一個什麼人在路上碰到他，對他說：『先生，請你化一下給我看。』就會將起軍的。如果是不但口頭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實行大衆化的人，那就要實地跟老百姓去學，否則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衆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衆化。

今天會場上散發了一個題名『宣傳指南』的小冊子，裏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勸同志們多看幾遍。

第一篇，是從『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上摘下來的，講的是列寧怎樣做宣傳。其中講到列寧寫傳單的情形：『在列寧領導下，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第一次在俄國開始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當某一個工廠裏爆發罷工時，「鬥爭協會」因為經過自己小組中的參加者而

很熟悉各企業中的情形，立刻就印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宣言來響應。在這些傳單裏，揭露出廠主虐待工人的事實，說明工人應如何爲自身的利益而奮鬥，載明工人羣衆的要求。這些傳單把資本主義機體上的癰疽，工人的窮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的過度沉重的勞動，工人之毫無權利等等真情實況，都揭露無餘。同時，在這些傳單裏，又提出了相當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無餘」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寧在工人巴布石金參加下，寫了第一個這樣的鼓動傳單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廠罷工工人書。」

寫一個傳單要和熟悉情況的同志商量。列寧就是根據這樣的調查和研究來寫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個這樣的傳單，都大大提高了工人們的精神。工人們看見了，社會主義者是幫助他們、保護他們的。」⁽²⁾

「我們是贊成列寧的麼？如果是的話，就得依照列寧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不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也不是自以爲是，誇誇其談；而是要照着列寧那樣地去做。」

第二篇，是從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報告中摘下來的。季米特洛夫說了些什麼呢？他說：「應當學會不用書本上的公式而用爲羣衆事業而奮鬥的戰士們的語言來和羣衆講話，這些戰士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思想，都反映出千百萬羣衆的思想和情緒。」

「如果我們沒有學會說羣衆懂得的話，那末廣大羣衆是不能領會我們的決議的。我們遠不是隨時

都善於簡單地、具體地、用羣衆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來講話。我們還沒有能够拋棄背得爛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實上，你們只要瞧一瞧我們的傳單、報紙、決議和提綱，就可以看到：這些東西常常是用這樣的語言寫成的，寫得這樣地艱深，甚至於我們黨的幹部都難於懂得，更用不着說普通工人了。」

怎麼樣？這不是把我們的毛病講得一針見血麼？不錯，黨八股中國有，外國也有，可見是通病。（笑）但是我們總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們自己的毛病趕快治好才行。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切實領會下面這條起碼的規則，把它當作定律，當作布爾塞維克的定律：當你寫東西或講話的時候，始終要想到使每個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號召，都決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爲什麼人寫東西，向什麼人講話。』〔七〕

這就是共產國際給我們治病的藥方，是必須遵守的。這是『規則』啊！

第三篇，是從『魯迅全集』裏選出的，是魯迅覆『北斗雜誌社』公討論怎樣寫文章的一封信。他說些什麼呢？他一共列舉了八條寫文章的規則，我現在抽出幾條來說一說。

第一條：『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講的是『留心各樣的事情』，不是一樣半樣的事情。講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們怎麼樣？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點就寫嗎？

第二條：『寫不出時候不硬寫。』

我們怎麼樣？不是明明腦子裏沒有什麼東西硬要大寫特寫麼？不調查，不研究，提起筆來『硬

寫』，這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第四條：『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決不將速寫材料拉成小說。』

孔夫子提倡『再思』⁽²⁾，韓愈也說『行成於思』⁽³⁾，那是古代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够。魯迅說『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說，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地加以刪改，然後發表。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複雜的，必須反覆研究，才能反映恰當；在這裏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碼知識。

第六條：『不生產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我們『生產』的東西太多了，總之是『誰也不懂』。句法有長到四五十個字一句的，其中堆滿了『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許多口口聲聲擁護魯迅的人們，却正是違背魯迅的啊！

最後一篇文章，是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論宣傳的民族化。六屆六中全會是一九三八年開的，我們那時曾說：『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必須反對空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活的共產黨員，必須聯繫中國的革命實際來研究馬克思主義。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着的一

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

這裏叫洋八股廢止，有些同志却實際上還在提倡。這裏叫空洞抽象的調頭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這裏叫教條主義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牀。總之，有許多人把六中全會通過的報告當做耳邊風，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對似的。

中央現在做了決定，一定要把黨八股和教條主義等類，徹底拋棄，所以我來講了許多。希望同志們把我所講的加以考慮，加以分析，同時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況。每個人應該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並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們商量一下，跟周圍的同志們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實改掉。

〔註釋〕

〔一〕「將一軍」是象棋中的術語。象棋是中國棋的一種，採取兩軍對戰的形式，而以一方攻入對方堡壘捉住「將軍」（主帥）作為贏棋。凡是一方給了對方一個死局，使其將軍有立即被捉的危險時，就叫做向對方「將軍」。

〔二〕反對新舊八股是魯迅作品裏一貫的精神。魯迅曾在「偽自由書」「透底」一文中說：「八股原是蠶桑的產物。一來是考官嫌麻煩——他們的頭腦大半是陰沉木做的，——甚麼代聖賢立言，甚麼起承轉合，文章氣韻，都沒有一定的標準，難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來，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這格式來「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輕重。二來，連應試的人也覺得又省力，又不費事了。這樣的八股，無論新舊，都應當掃蕩。」洋八股是五四運動以後一些淺薄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展起來的東西，並經過他們的傳播，長時期地在革命的文化隊伍中存在着。魯迅曾在許多文章裏反對過革命文化隊伍中的洋八股，他批判這種洋八股說：「八股無論新舊，都在掃蕩之列，……例如只會「辱罵」「恐嚇」甚至於「判決」，而不肯具體地切實地運用科學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釋每天的新的事實，新的現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實上亂湊，這

也是一種入股。」（「透底」附錄「回祝秀俠信」）

〔三〕參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註三八。

〔四〕這是魯迅『南腔北調集』中一篇文章的題名，一九三二年作，載『魯迅全集』第五卷。

〔五〕上海人稱城市中無正當職業而以乞討或偷竊爲生的游民爲癯三，他們通常是極瘦的。

〔六〕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第一章第三節。

〔七〕見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上所作的結論『爲工人階級的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綫而鬥爭』的第六部分『僅僅只有正確的路綫還是不夠的』。

〔八〕『北斗雜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出版的月刊。『答北斗雜誌社問』載『魯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中。

〔九〕見『論語』『公冶長第五』。

〔一〇〕韓愈是公元八世紀至九世紀時人，中國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他在『進學解』一文中說：「行成於思，毀於隨。」意思就是：作事成功由於思考，失敗由於不思考。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一九四二年五月)

引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藉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

在我們爲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綫，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綫，這就是文化戰綫和軍事戰綫。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裏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够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到了現在，中國反動派只能提出所謂『以數量對質量』的辦法來和新文化對抗，就是說，反動派有的是錢，雖然拿不出好東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綫上，文學

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革命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却沒有互相結合起來，這是因為當時的反動派把這兩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的緣故。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據地，並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羣衆完全結合了。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爲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爲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爲了這個目的，有些什麼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我以爲有這樣一些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衆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의 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是否還有認識不正確或者認識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的立場。

態度問題。隨着立場，就發生我們對於各種具體事物所採取的具體態度。比如說，歌頌呢，還是暴露呢？這就是態度問題。究竟那種態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兩種都需要，問題是在對什麼人。有三種人，一種是敵人，一種是統一戰綫中的同盟者，一種是自己人，這第三種人就是人民羣衆及其先鋒隊。對於這三種人需要有三種態度。對於敵人，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人民的敵人，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並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

決地打倒他們。對於統一戰綫中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他們的抗戰，我們是贊成的；如果有成績，我們也是讚揚的。但是如果抗戰不積極，我們就應該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道路，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至於對人民羣衆，對人民的勞動和鬥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讚揚。人民也有缺點的。無產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着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鬥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點錯誤作鬥爭，使他們能够大踏步地前進。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只要不是堅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鬥，去掉落後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工作對象問題，就是文藝作品給誰看的問題。在陝甘寧邊區，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這個問題和在國民黨統治區不同，和在抗戰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時期，革命文藝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學生、職員、店員爲主。在抗戰以後的國民黨統治區，範圍曾有過一些擴大，但基本上也還是以這些人爲主，因爲那裏的政府把工農兵和革命文藝互相隔絕了。在我們的根據地就完全不同。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幹部。根據地也有學生，但這些學生和舊式學生也不相同，他們不是過去的幹部，就是未來的幹部。各種幹部，部隊的戰士，工廠的工人，農村的農民，他們

識了字，就要看書、看報，不識字的，也要看戲、看畫、唱歌、聽音樂，他們就是我們文藝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幹部說，你們不要以為這部分人數目少，這比在國民黨統治區出一本書的讀者多得多。在那裏，一本書一版平常只有兩千冊，三版也才六千冊；但是根據地的幹部，單是在延安能看書的就有一萬多。而且這些幹部許多都是久經鍛鍊的革命家，他們是從全國各地來的，他們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對於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向他們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而為要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為要在黨政機關，在農村，在工廠，在八路軍新四軍裏面，了解各種人，熟悉各種人，了解各種事情，熟悉各種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藝工作，但是這個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於這些，以前是一種什麼情形呢？我說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什麼是不熟？人不熟。文藝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寫對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簡直生疏得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幹部。什麼是不懂？語言不懂，就是說，對於人民羣衆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許多文藝工作者由於自己脫離羣衆、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裏面常常夾着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三不四的詞句。許多同志愛說『大衆化』，但是什麼叫做大衆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衆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羣衆的語言。如果連羣衆的語言都有許

多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羣衆不賞識。在羣衆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羣衆就越不買你的帳。你要羣衆了解你，你要和羣衆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裏，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爲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爲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爲羣衆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後一個問題是學習，我的意思是說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一個自命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但是現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比如說，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存在決定意識，就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

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却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麼一切應該從『愛』出發。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裏，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麼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志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很深的影響。應該很澈底地清算這種影響，很虛心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文藝創作，這是對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藝工作者要學習社會，這就是說，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研究它們的相互關係和各自狀況，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藝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他有關的問題上發表意見。

結

論（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們！我們這個會在一個月裏開了三次。大家爲了追求真理，進行了熱烈的爭論，有黨的和非黨的同志幾十個人講了話，把問題展開了，並且具體化了。我認爲這是對整個文學藝術運動很有益處的。

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

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工作，也應該這樣做。

現在的事實是什麼呢？事實就是：中國的已經進行了五年的抗日戰爭，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動搖和對於人民的高壓政策，『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於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缺點，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裏面大批文藝工作者和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工人農民的結合，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任務的區別，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中已經發生的爭論問題。——這些就是實際存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就要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考慮我們的問題。

那末，什麼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爲羣衆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爲羣衆的問題。不解決這兩個問題，或這兩個問題解決得不適當，就會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和自己的環境、任務不協調，就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從外部從內部碰到一連串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兩個問題爲中心，同時也講到一些與此有關的其他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爲什麼人的？

這個問題，本來是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所早已解決了的。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過，我們的文藝應當『爲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¹⁾。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志中，這個問題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羣衆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於偉大解放鬥爭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藝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分子，但是絕大多數却都是在爲着共同事業努力工作着。依靠這些同志，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藝工作者，有許多是抗戰以後開始工作的；有許多在抗戰以前就做了多時的革命工作，經歷過許多辛苦，並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響了廣大羣衆的。但是爲什麼還說即使這些同志中也對於文藝是爲什麼人的問題沒有明確解決的呢？難道他們還有主張革命文藝不是爲着人民大眾而是爲着剝削者壓迫者的嗎？

誠然，爲着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文藝是爲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主義的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文藝是爲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爲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二〕}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在我們，文藝不是爲上述種種人，而是爲人民的。我們曾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對於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爲了人民大眾。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裏，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爲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那末，什麼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爲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爲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爲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爲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羣衆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够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

人民大眾。

我們的文藝，應該爲着上面說的四種人。我們要爲這四種人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在今天，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爲革命的工農兵羣衆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面。而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同志對於文藝爲什麼人的問題不能正確解決的關鍵，正在這裏。我這樣說，不是說在理論上。在理論上，或者說在口頭上，我們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把工農兵羣衆看得比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不重要的。我是說在實際上，在行動上。在實際上，在行動上，他們是否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比對工農兵還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爲是這樣。有許多同志比較地注重研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分析他們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並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是引導他們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農兵羣衆，去參加工農兵羣衆的實際鬥爭，去表現工農兵羣衆，去教育工農兵羣衆。有許多同志，因爲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於是就只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面。這種研究和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我們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寄予滿腔的同情，連他們的缺點也給以同情甚至鼓吹。對於工農兵羣衆，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

却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在某些方面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牆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爲着獵奇，爲着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爲着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有時就公開地鄙棄它們，而偏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些同志的立足點還是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面，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這樣，爲什麼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明確地解決。這不光是講初來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過前方，在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做過幾年工作的人，也有許多是沒有澈底解決的。要澈底地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却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澈底地解決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羣衆、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爲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

爲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於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麼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羣衆的傾向。我說某種程度，因爲一般地說，這些同志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羣衆，和國民黨的輕視工農兵、

脫離羣衆，是不同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傾向是有的。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比如說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只有把爲工農，爲八路軍、新四軍，到羣衆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魯迅曾說：『聯合戰綫是以有共同目的爲必要條件的。……我們戰綫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爲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爲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衆，那當然戰綫也就統一了。』^{〔四〕}這個問題那時上海有，現在重慶也有。在那些地方，這個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因爲那些地方的統治者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羣衆中去的自由。在我們這裏，情形就完全兩樣。我們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羣衆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裏，是接近於解決的了。接近於解決不等於完全的徹底的解決；我們說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就是爲着完全地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的馬克思主義，是要在羣衆生活羣衆鬥爭裏實際發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把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變成爲實際生活裏的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不但宗派主義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也都可以解決了。

爲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解決了，接着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服務。用同志們的話來說，就是：努力於提高呢，還是努力於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過去，是相當地或是嚴重地輕視了和忽視了普及，他們不適當地太強調了提高。提高是應該強調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強調提高，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那就錯了。我在前面說的沒有明確地解決爲什麼人的問題的事實，在這一點上也表現出來了。並且，因爲沒有弄清楚爲什麼人，他們所說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沒有正確的標準，當然更找不到兩者的正確關係。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爲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麼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都不行，只有用工農兵自己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個基礎。比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麼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基礎嗎？都不是，只能是從工農兵羣衆的基礎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農兵提到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沿着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高。而這裏也就提出了學習工農兵的任務。只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確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係。

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作爲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着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绌，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爲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作品，不也是源泉嗎？實際上，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爲我們從此時此地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文學藝術中對於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羣衆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羣衆，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

裏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爲什麼呢？因爲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却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羣衆推動歷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面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面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着，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羣衆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羣衆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麼是文藝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這兩種任務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普及的東西比較簡單淺顯，因此也比較容易爲目前廣大人民羣衆所迅速接受。高級的作品比較細緻，因此也比較難於生產，並且往往比較難於在目前廣大人民羣衆中迅速流傳。現在工農兵面前的問題，是他們正在和敵人作殘酷的流血鬥爭，而他們由於長時期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識字，無文化，所以他們迫切要求一個普遍的啓蒙運動，迫切要求得到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去提高他們的鬥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便於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鬥爭。對於他們，第一步需要還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爲迫切。輕

視和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錯誤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但一部分優秀的作品現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廣大羣衆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斷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一樣的『小放牛』，一樣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這種普及工作還有什麼意義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這裏，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這種提高，不是從空中提高，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爲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就中國範圍來說，革命和革命文化的發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漸推廣的。一處普及了，並且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了，別處還沒有開始普及。因此一處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經驗可以應用於別處，使別處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導，少走許多彎路。就國際範圍來說，外國的好經驗，尤其是蘇聯的經驗，也有指導我們的作用。所以，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正因爲這樣，我們所說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礙提高，而且是給目前的範圍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礎，也是給將來的範圍大爲廣闊的提高工作準備必要的條件。

除了直接爲羣衆所需要的提高以外，還有一種間接爲羣衆所需要的提高，這就是幹部所需要的提高。幹部是羣衆中的先進分子，他們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羣衆所受的多些；比較高級的文學藝術，對於他們是完全必要的，忽視這一點是錯誤的。爲幹部，也完全是爲羣衆，因爲只有經過幹部才能去

教育羣衆、指導羣衆。如果違背了這個目的，如果我們給予幹部的並不能幫助幹部去教育羣衆、指導羣衆，那末，我們的提高工作就是無的放矢，就是離開了爲人民大眾的根本原則。

總起來說，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的原料，經過革命作家的創造性的勞動而形成觀念形態上的爲人民大眾的文學藝術。在這中間，既有從初級的文藝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爲被提高了的羣衆所需要、或首先爲羣衆中的幹部所需要的高級的文藝，又有反轉來在這種高級的文藝指導之下的、往往爲今日最廣大羣衆所最先需要的初級的文藝。無論高級的或初級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爲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爲工農兵的，爲工農兵而創作，爲工農兵所利用的。

我們既然解決了提高和普及的關係問題，則專門家和普及工作者的關係問題也就可以隨着解決了。我們的專門家不但是爲了幹部，主要地還是爲了羣衆。我們的文學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牆報，注意軍隊和農村中的通訊文學。我們的戲劇專門家應該注意軍隊和農村中的小劇團。我們的音樂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歌唱。我們的美術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美術。一切這些同志都應該和在羣衆中做文藝普及工作的同志們發生密切的聯繫，一方面幫助他們，指導他們，一方面又向他們學習，從他們吸收由羣衆中來的養料，把自己充實起來，豐富起來，使自己的專門不致成爲脫離羣衆、脫離實際、毫無內容、毫無生氣的空中樓閣。我們應該尊重專門家，專門家對於我們的事業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我們應該告訴他們說，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繫羣衆，表現羣衆，把自己當作羣衆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只有代表羣衆才能教育羣衆，只有做羣衆的學生才能做羣衆的先

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羣衆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羣衆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的這種態度是不是功利主義的？唯物主義者並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裏，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羣衆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爲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爲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例如，某種作品，只爲少數人所偏愛，而爲多數人所不需要，甚至對多數人有害，硬要拿來上市，拿來向羣衆宣傳，以求其個人的或狹隘集團的功利，還要責備羣衆的功利主義，這就不但侮辱羣衆，也太無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羣衆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就算你的是『陽春白雪』吧，這暫時既然是少數人享用的東西，羣衆還是在那裏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顧罵人，那就怎樣罵也是空的。現在是『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統一的問題，是提高和普及統一的問題。不統一，任何專門家的最高級的藝術也不免成爲最狹隘的功利主義；要說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爲清高，羣衆是不會批准的。在爲工農兵和怎樣爲工農兵的基本方針問題解決之後，其他的問題，例如，寫光明和寫黑暗的問題，團結問題等，便都一齊解決了。如果大家同意這個基本方針，則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我們的

文學藝術學校，文學藝術刊物，文學藝術團體和一切文學藝術活動，就應該依照這個方針去做。離開這個方針就是錯誤的；和這個方針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須加以適當的修正。

三

我們的文藝既然是爲人民大眾的，那末，我們就可以進而討論一個黨內關係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問題，和另一個黨外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係問題——文藝界統一戰綫問題。

先說第一個問題。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綫的。爲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九。因此，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反對這種擺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或多元論，而其實質就像托洛茨基那樣：『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產階級的。』我們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過分強調到錯誤的程度，但也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和別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較起來，

自然有輕重緩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對於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對於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連最廣義最普通的文學藝術也沒有，那革命運動就不能進行，就不能勝利。不認識這一點，是不對的。還有，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羣衆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爲。革命的思想鬥爭和藝術鬥爭，必須服從於政治的鬥爭，因爲只有經過政治，階級和羣衆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萬萬的羣衆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於把羣衆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羣衆中去，爲羣衆所接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正因爲這樣，我們的文藝的政治性和真實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認識這一點，把無產階級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對的。

再說文藝界的統一戰綫問題。文藝服從於政治，今天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因此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和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從黨的同情分子、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到一切贊成抗日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文藝家）團結起來。其次，應該在民主一點上團結起來；在這一點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藝家就不贊成，因此團結的範圍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應該在文藝界的特殊問題——藝術方法藝術作風一點上團結起來；我們是主張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

又有一部分人不贊成，這個團結的範圍會更小些。在一個問題上有團結，在另一個問題上就有鬥爭，有批評。各個問題是彼此分開而又聯繫着的，因而在產生團結的問題比如抗日的問題上也同時有鬥爭，有批評。在一個統一戰綫裏面，只有團結而無鬥爭，或者只有鬥爭而無團結，實行如過去某些同志所實行過的右傾的投降主義、尾巴主義，或者『左』傾的排外主義、宗派主義，都是錯誤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是如此。

在文藝界統一戰綫的各種力量裏面，小資產階級文藝家在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力量。他們的作品都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比較地傾向於革命，比較地接近於勞動人民。因此，幫助他們克服缺點，爭取他們到爲勞動人民服務的戰綫上來，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

四

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應該發展，過去在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們指出這一點是對的。文藝批評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許多專門的研究。我這裏只着重談一個基本的批評標準問題。此外，對於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個別的問題和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也來略爲說一說我的意見。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利於抗日和

團結的，鼓勵羣衆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羣衆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着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這裏所說的好壞，究竟是看動機（主觀願望），還是看效果（社會實踐）呢？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爲大衆的動機和被大衆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爲個人的和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有爲大衆的動機但無被大衆歡迎、對大衆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爲（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衆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我們的文藝批評是不要宗派主義的，在團結抗日的大原則下，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的存在。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對於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衆和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和駁斥；因爲這些所謂文藝，其動機，其效果，都是破壞團結抗日的。按着藝術標準來說，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這種分別，當然也要看社會效果。文藝家幾乎沒有不以爲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們的批評，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但是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給以正確的批判，使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成爲較高級的藝術，使不適合廣大羣衆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羣衆鬥爭要求的藝術，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標準，又是藝術標準，這兩者的關係怎麼樣呢？政治並不等於藝術，一般的宇宙觀也並

不等於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政治標準，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藝術標準，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個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和不同的藝術標準。但是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管其藝術成就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動的東西，也可能有某種藝術性。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處於沒落時期的一切剝削階級的文藝的共同特點，就是其反動的政治內容和其藝術的形式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綫鬥爭。

這兩種傾向，在我們的許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許多同志有忽視藝術的傾向，因此應該注意藝術的提高。但是現在更成爲問題的，我以為還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所以發生了各種糊塗觀念。讓我舉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

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却說成爲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於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爲所謂文藝理論基礎的『人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愛可以是出發點，但是還有一個基本出發點。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產階級，是社會使他們感覺到和無產階級有共同的命運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爲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爲它在階級社會裏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後。階級使社會分化爲許多對立體，階級消滅後，那時就有了整個的人類之愛，但是現在還沒有。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麼？

『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和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這裏包含着許多糊塗觀念。文藝作品並不是從來都這樣。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並沒有找到過光明，他們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稱爲

『暴露文學』，還有簡直是專門宣傳悲觀厭世的。相反地，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爲主。他們也寫工作中的缺點，也寫反面的人物，但是這種描寫只能成爲整個光明的陪襯，並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反動時期的資產階級文藝家把革命羣衆寫成暴徒，把他們自己寫成神聖，所謂光明和黑暗是顛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和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羣衆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羣衆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這種講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知識的見解。從來的文藝並不單在於暴露，前面已經講過。對於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這些缺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而進行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是文藝的最重要任務之一。但這不應該說是什麼『暴露人民』。對於人民，基本上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除非是反革命文藝家，才有所謂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羣衆是『專制暴徒』之類的描寫。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中國的反動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對於人民的敵人，而是對於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

也不會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對於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於人民的事業並無熱情，對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着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裏的幾個角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

關於動機和效果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要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作上就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共產黨人的自我批評方法，就是這樣採取的。只有這種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同時也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確的立場。如果不在實踐中向這個方向前進，只是自以爲是，說是『懂得』，其實並沒有懂得。

『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空洞乾燥的教條公式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但是它不但破壞創作情緒，而且首先破壞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那末，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

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爲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爲是應該的，應該澈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

五

我們延安文藝界中存在着上述種種問題，這是說明一個什麼事實呢？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着作風不正的東西，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羣衆等等的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

我們有許多同志還不大清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區別。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頭腦裏還裝着許多剝削階級的觀念，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他們想：什麼無產階級思想，還不是那一套？他們那裏知道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只有離開黨完事。因此我們的黨，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純潔的，但是爲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爲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

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延安文藝界現在已經展開了思想鬥爭，這是很必要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是不能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只能依誰呢？只能依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我們希望文藝界的同志們認識這一場大論戰的嚴重性，積極起來參加這個鬥爭，使每個同志都健全起來，使我們的整個隊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真正統一起來，鞏固起來。

因為思想上有許多問題，我們有許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區別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並由此弄出許多錯誤。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二）來的；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一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到了革命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羣衆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如果同志們在新的羣衆中間，還是像我上次說的『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鄉要發生困難，不下鄉，就在延安，也要發生困難的。有的同志想：我還是爲『大後方』（三）的讀者寫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國意義』。這個

想法，是完全不正確的。「大後方」也是要變的，「大後方」的讀者，不需要從革命根據地的作家聽那些早已聽厭了的老故事，他們希望革命根據地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爲革命根據地的羣衆而寫的作品，才愈有全國意義。法捷耶夫的『毀滅』^(二)，只寫了一支很小的游擊隊，它並沒有想去投合舊世界讀者的口味，但是却產生了全世界的影響，至少在中國，像大家所知道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中國是向前的，不是向後的，領導中國前進的是革命的根據地，不是任何落後倒退的地方。同志們在整風中間，首先要認識這一個根本問題。

既然必須和新的羣衆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徹底解決個人和羣衆的關係問題。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三)，應該成爲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裏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裏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知識分子要和羣衆結合，要爲羣衆服務，需要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

今天我所講的，只是我們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還有許多具體問題需要今後繼續研究。我相信，同志們是有決心走這個方向的。我相信，同志們在整風過程中間，在今後長期的學習和工作中間，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創造出許多爲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和全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

〔註釋〕

〔一〕見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列寧在這篇論文中描寫無產階級文學的特徵說：『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為不是貪慾也不是野心，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將招集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到它的隊伍裏來。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為它將不是替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替百無聊賴和胖得發愁的「幾萬上等人」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這些勞動人民是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它要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經驗和活生生的工作去豐富人類革命思想的最高成就，它要創造過去的經驗（完成了社會主義從原始空想形式的發展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現在的經驗（工人同志們當前的鬥爭）之間經常的相互作用。』

〔二〕梁實秋是反革命的國家社會黨的黨員。他在長時期中宣傳美國反動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堅持反對革命，咒罵革命文藝。

〔三〕周作人、張資平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佔領北京、上海後，先後投降日寇。

〔四〕見『魯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五〕見『魯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雜文末編』『附集』：『死』。

〔六〕『小放牛』，一齣流行的中國小歌舞劇，全劇只有兩個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鄉村小姑娘，以互相對答的方式表現劇的內容。抗日戰爭初期，有人利用這個歌舞劇的形式，變動其原來的詞句，宣傳抗日，一時頗為流行。

〔七〕『人、手、口、刀、牛、羊』，這是筆畫比較簡單的漢字，舊時小學國語課本都把這些字編在第一冊的最初幾課裏。

〔八〕『陽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紀楚國的歌曲。『陽春白雪』屬於較高級的音樂，『下里巴人』屬於較低級的音樂。『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記載一個故事，說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陽春白雪』時，『國中屬而和者（跟着唱的），不過數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時，『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九〕見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他說：『文學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成為一個統一的、偉大的、由整個工人階級全體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

〔十〕亭子間是上海樓房中的一種小房間，位置在房子後部的樓梯中側，狹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較低廉。貧苦的文藝作

家、知識分子和機關小職員，多半租這種房間居住。

〔二〕指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戰爭時期，人們習慣稱未被日寇佔領而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廣大土地爲「大後方」，以別於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小後方」。

〔三〕法捷耶夫，蘇聯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說『毀滅』於一九二七年出版，內容是描寫蘇聯內戰時期由西伯利亞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所組成的一支游擊隊和反革命匪幫進行鬥爭的故事，曾由魯迅譯爲漢文。

〔三〕見『魯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自嘲」。

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

自從黨中央提出精兵簡政這個政策以來，許多抗日根據地的黨，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籌劃和進行了這項工作。晉冀魯豫邊區的領導同志，對這項工作抓得很緊，做出了精兵簡政的模範例子。但是還有若干根據地的同志們因為認識不夠，沒有認真地進行。這些地方的同志們還不理解精兵簡政同當前形勢和黨的各項政策的關係，還沒有把精兵簡政當作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看待。關於這件事，『解放日報』曾多次討論，今願更有所說明。

黨的一切政策，都是爲着戰勝日寇。而第五年以後的抗戰形勢，實處於爭取勝利的最後階段。這個階段，不但和抗日的第一第二年不相同，也和抗日的第三第四年不相同。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這樣的情況，即接近着勝利，但又有極端的困難，也就是所謂『黎明前的黑暗』的情況。這種情況，整個反法西斯各國在目前階段上都是有的，整個中國也是有的，不獨八路軍新四軍的各個根據地爲然，但是尤以我軍的各個根據地表現得特別尖銳。我們要爭取兩年打敗日寇。這兩年將是極端困難的兩年，它同抗日的開頭兩年中間兩年都有很大的不同。這種特點，革命政黨和革命軍隊的領導人

員必須事先看到。如果他們不能事先看到，那他們就只會跟着時間遷流，雖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勝利，反而有使革命事業受到損害的危險。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形勢，截至今天爲止，雖然已比過去增加了幾倍的困難，但還不是極端的困難。如果現在沒有正確的政策，那末極端的困難還在後頭。普通的人，容易爲過去和當前的情況所迷惑，以爲今後也不過如此。他們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將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頭腦把握船舵，繞過暗礁。什麼是抗日航船今後的暗礁呢？就是抗戰最後階段中的物質方面的極端嚴重的困難。黨中央指出了這個困難，叫我們提起注意繞過這個暗礁。我們的許多同志已經懂得了，但是還有若干同志不懂得，這就是必須首先克服的障礙。抗戰要有一個團結，在團結中有各種的困難。這個困難是政治上的困難，過去有，今後還可能有。五年以來，我黨用了極大的力量逐步地克服着這個困難，我們的口號是增強團結，今後還要增強它。但是還有一個困難，就是物質方面的困難。這個困難，今後必然愈來愈厲害。目前還有若干同志處之泰然，不大覺得，我們就有喚起這些同志提起注意之必要。各抗日根據地的全體同志必須認識，今後的物質困難必然更甚於目前，我們必須克服這個困難，我們的重要的辦法之一就是精兵簡政。

精兵簡政何以是克服物質困難的一個重要的政策呢？很顯然，目前的尤其是今後的根據地的戰爭情況，不容許我們停留在過去的觀點上。我們的龐大的戰爭機構，是適應過去的情況的。那時的情

況容許我們如此，也應該如此。但是現在不同了，根據地已經縮小，在今後的一個時期內還可能再縮小，我們便決然不能還像過去那樣地維持着龐大的機構。在目前，戰爭的機構和戰爭的情況之間已經發生了矛盾，我們必須克服這個矛盾。敵人的方針是擴大我們這個矛盾，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一〕。假若我們還要維持龐大的機構，那就會正中敵人的奸計。假若我們縮小自己的機構，使兵精政簡，我們的戰爭機構雖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矛盾，使我們的戰爭的機構適合戰爭的情況，我們就將顯得越發有力量，我們就不會被敵人戰勝，而要最後地戰勝敵人。所以我們說，黨中央提出的精兵簡政的政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但是，現狀和習慣往往容易把人們的頭腦束縛得緊緊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時也不能免。龐大的機構是由自己親手創造出來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將它縮小，實行縮小時就感到很勉強，很困難。敵人以龐大的機構向我們壓迫，難道我們還可以縮小嗎？實行縮小就感到兵少不足以應敵。這些就是所謂爲現狀和習慣所束縛。氣候變化了，衣服必須隨着變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變換一次衣服。但是人們往往在那『之交』不會變換衣服，要鬧出些毛病來，這就是由於習慣的力量。目前根據地的情況已經要求我們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輕輕快地同敵人作鬥爭，我們却還是一身臃腫，頭重腳輕，很不適於作戰。若說：何以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呢？那就有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爲例。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却化爲一個小蟲鑽進鐵扇公主的心臟裏去把她戰敗了〔二〕。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三〕，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龐然

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後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扎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

〔註釋〕

〔一〕「三光政策」，指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解放區實施的燒光、殺光、搶光三項政策。

〔二〕鐵扇公主亦名羅刹。孫行者變為小蟲戰敗鐵扇公主的故事，見中國神話小說「西遊記」第五十九回。

〔三〕柳宗元（公元七七三年至八一九年），中國唐代的大作家之一。他寫過一篇「三戒」，包括三段寓言，其中一段題為「黔之驢」，說：「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按止此耳！』因跳踉大嚙，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斯大林格勒之戰，英美報紙比之爲凡爾登戰役，「紅色凡爾登」之名已傳遍於世界。這個比擬並不適當。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戰，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凡爾登來，有性質的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有許多人在這種時候還被德國的攻勢所迷惑，以爲德國還有獲勝的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於一九一八年冬，在一九一六年，德軍曾向法國要塞凡爾登舉行數度的進攻。當時德軍的戰役統帥是德國皇太子，投入戰鬥的力量是德軍的最精銳部分。當時的戰鬥是帶決戰性的。德軍猛攻不克，整個德奧土保障綫再也找不到出路，從此日益困難，衆叛親離，土崩瓦解，走到了最後的崩潰。然而當時英、美、法陣綫方面，還沒有看出這種情況，以爲德軍仍極強大，不知道自己的勝利已經快到面前。在人類歷史上，凡屬將要滅亡的反動勢力，總是要向革命勢力進行最後掙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們也往往在一個期間內被這種外強中乾的現象所迷惑，看不出敵人快要消滅，自己快要勝利的實質。整個法西斯勢力的興起及其進行了幾年的侵略戰爭，正是這種最後掙扎的表現；而在戰爭中，又以攻擊斯大林格勒表現它自己的最後掙扎。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點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綫內的人們也有許多

被法西斯的兇惡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實質。自從八月二十三日德軍全部渡過頓河河曲，全面地開始攻擊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軍一部打入該城西北部工業區，至十月九日蘇聯情報局宣佈紅軍突破該區德軍包圍綫爲止，共計進行了四十八天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空前苦戰。這一戰終於勝利了。在這四十八天中，這個城市每天的勝負消息，緊緊着無數千萬、萬萬人民的呼吸，使他們憂愁，使他們歡樂。這一戰，不但是蘇德戰爭的轉折點，甚至也不但是這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點，而且是整個人類歷史的轉折點。在這四十八天中，世界人民的注視斯大林格勒，和去年十月間世界人民的注視莫斯科，其關心程度，是有過之無不及的。

希特勒在西綫勝利以前，他似乎是謹慎的。攻波蘭，攻挪威，攻荷、比、法，攻巴爾幹，都是注全力於一處，不敢旁騖。西綫勝利後，他就衝昏了頭腦，企圖在三個月內打敗蘇聯。北起摩爾曼斯克，南至克里米亞，向這個龐大堅強的社會主義國家舉行了全面的進攻，這樣就分散了他的兵力。去年十月向莫斯科進攻的失敗，結束了蘇德戰爭的第一階段；希特勒第一個戰略計劃破產了。紅軍制止了德軍去年的進攻，並在冬季舉行了全綫的反攻，是爲蘇德戰爭的第二階段；希特勒轉到了退却和防禦的地位。在此期間，希特勒撤消了他的前綫總司令勃魯齊區，自己充任總司令，決定放棄全面的進攻計劃，搜索歐洲全力，準備向南綫作局部的但被認爲是打擊蘇聯要害的最後進攻。因爲這一進攻帶着最

後一次的性質，關係法西斯的存亡，希特勒就集中了極大的兵力，連在北非作戰中的一部分飛機坦克都抽調過來了。從今年五月進攻刻赤和悉瓦斯托波爾起，進入戰爭的第三階段。希特勒調動了一百五十萬以上的兵力，附以飛機坦克的主力，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作空前劇烈的進攻。他企圖迅速攻下兩處，達到切斷伏爾加和奪取巴庫兩個目的，然後北攻莫斯科，南出波斯灣，並令日本法西斯集中兵力於滿洲，準備在斯大林格勒攻下後進攻西伯利亞。希特勒妄想把蘇聯力量削弱到足以使德軍主力從蘇聯戰場上解脫出來，以便移到西綫對付英美的進攻，並可掠取近東資源，打通德日聯繫，同時，日軍主力也可從北面解脫出來，以便西進南進對付我國和英美，而無後顧之憂，這樣來爭取法西斯陣綫的勝利。但是這個階段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希特勒遇到了蘇聯制其死命的策略。蘇聯採取了先則誘敵深入，繼則頑強抵抗的方針。五個月的戰爭，使德軍既沒有打進高加索油田，也沒有打下斯大林格勒，迫使希特勒頓兵於高山與堅城之下，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損失甚大，陷於僵局。現在已是十月，冬季就要到來，戰爭的第三階段快要結束，第四階段快要開始了。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戰略企圖沒有一個不是失敗的。在此期間，希特勒鑒於去夏分兵的失敗，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綫。然而他尚欲東斷伏爾加，南取高加索，一舉達成兩個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計算到他的實力和他的企圖之間的不相稱，以致『扁担沒扎，兩頭打場』，陷入目前的絕路。在相反方面，蘇聯則是越戰越強。斯大林的英明戰略指揮，完全站在主動的地位，處處把希特勒引向滅亡。今年冬季開始的第四個階段，將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階段。

拿希特勒在第一階段上的情況和第三階段作比較，就可知希特勒是處在最後失敗的門口了。目前紅軍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兩方面，實際上均已停止了德軍的進攻，希特勒已到再衰三竭之時，他對斯大林格勒、高加索兩處的進攻已經失敗。他在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整個冬季中所整備的一點兵力，已經耗竭了。在蘇德戰綫，距冬季不到一個月了，他須趕快轉入防禦。整個頓河的以西以南是他的最危險的地帶，紅軍將在這一帶轉入反攻。今年冬季，希特勒因被死亡所驅迫，將再一次整備他的軍隊。他或者還可能搜索他的一點殘餘力量裝備出幾個新的師團，此外則乞援於意、羅、匈三國法西斯夥伴，向他們勒索一些砲灰，以應付東西兩綫的危局。但是，他在東綫須應付冬季戰爭的極大消耗，他在西綫須準備對付第二條戰綫，而意、羅、匈等國則將在希特勒大勢已去的這種悲觀情緒中，一天一天變成離心離德。總之，十月九日以後的希特勒，將只有死路一條好走了。

四十八天中，紅軍的保衛斯大林城，和去年保衛莫斯科市有某種相同。這就是說，它使得希特勒今年的計劃也像他的去年計劃一樣，歸於失敗。其不同點，則在莫斯科保衛戰之後，雖然接着舉行了冬季反攻，可是還要遭到今年德軍的一個夏季進攻，這是因爲一則德國及其歐洲夥伴尚有餘勇可賈，二則英美拖延開闢第二條戰綫的緣故。而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之後，則形勢將和去年完全兩樣。一方面蘇聯將舉行極大規模的第二個冬季反攻，英美對第二條戰綫的開闢將無可拖延（雖然具體時間仍不能計算），歐洲人民也將準備着起義響應。另一方面，德國及其歐洲夥伴再也無力舉行大規模的攻勢了，希特勒只好把整個方針轉入戰略防禦。只要迫使希特勒轉入了戰略防禦，法西斯的命運就算完

結了。因為像希特勒這樣法西斯國家的政治生命和軍事生命，從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進攻上面的，進攻一完結，它的生命也就完結了。斯大林格勒一戰將停止法西斯的進攻，這一戰是帶着決定性的。這種決定性，是關係於整個世界戰爭的。

希特勒面前遇着的，是三個強大敵人：蘇聯、英美及在其佔領區的老百姓。在東綫，是屹立不動的紅軍壁壘和整個第二冬季以及連續下去的紅軍反攻，這是整個戰爭和人類命運的決定的力量。在西綫，即使英美還採取着觀望和拖延的政策，但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時候，第二條戰綫總是要建立的。希特勒還有一個內部戰綫，就是德國、法國及歐洲其他部分正在醞釀着的一個偉大的人民起義，只待蘇聯舉行全面反攻和第二條戰綫砲響，他們將以第三條戰綫出來響應。這樣，三條戰綫夾擊希特勒，就將是斯大林格勒戰役以後的偉大歷史過程。

拿破崙的政治生命，終結於滑鐵盧，而其決定點，則是在莫斯科的失敗〔1〕。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崙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滅亡的決定點。

這一形勢，將直接影響到遠東。明年也將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頭。它將一天一天感到頭痛，直至向它的墓門跨進。

一切對世界形勢作悲觀觀察的人們，應將自己的觀點改變過來。

〔註 釋〕

〔一〕一八一五年六月，拿破崙與英普聯軍激戰於比利時南部的滑鐵盧。拿破崙戰敗，被流放於大西洋南部的聖海倫島，至一八二二年死於該島。拿破崙一生征服過歐洲的許多國家，但在一八二二年進攻俄國的戰爭中，在莫斯科遭到極大的失敗，其精銳部隊幾全被消滅。拿破崙受了這次打擊，從此便一蹶不振。關於拿破崙在莫斯科的失敗，參看本書第二卷「論持久戰」註三。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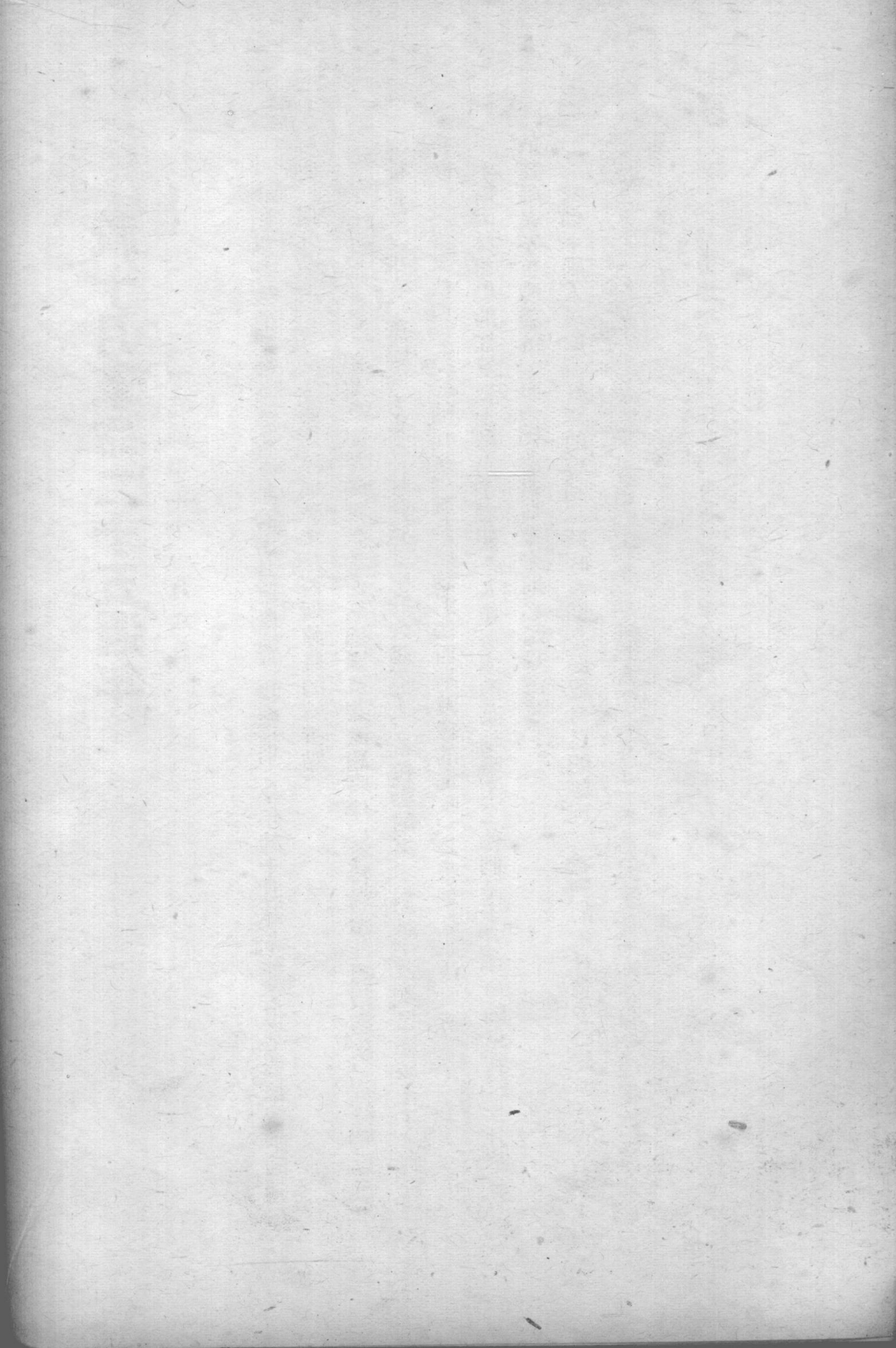
我們以最大的樂觀來慶祝今年的十月革命節。我堅信，今年的十月革命節不但是蘇德戰爭的轉折點，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綫戰勝法西斯陣綫的轉折點。

在過去時期內，因為紅軍單獨抵抗法西斯德國及其歐洲夥伴，希特勒還能繼續進攻，希特勒還沒有被打敗。現在，蘇聯的力量已經在戰爭中壯大起來了，希特勒的第二個夏季攻勢已經破產了。從此以後，世界反法西斯陣綫的任務，就是發動對法西斯陣綫的進攻，最後地打敗法西斯。

斯大林格勒的紅軍戰士做出了有關全人類命運的英雄事業。他們是十月革命的兒女。十月革命的旗幟是不可戰勝的，而一切法西斯勢力則必歸於消滅。

我們中國人民慶祝紅軍的勝利，同時也即是慶祝自己的勝利。我們的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五年多了，我們的前途雖然還有艱苦，但是勝利的曙光已經看得見了。戰勝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確定的，而且是不遠的了。

一切努力集中於打擊日本法西斯，這就是中國人民的任務。



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但是有許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財政，不懂得整個經濟的重要性；他們的腦子終日只在單純的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打來打去，還是不能解決問題。這是一種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在這些同志的頭腦中作怪的緣故。他們不知道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却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陝甘寧邊區的財政問題，就是幾萬軍隊和工作人員的生活費和事業費的供給問題，也就是抗日經費的供給問題。這些經費，都是由人民的賦稅及幾萬軍隊和工作人員自己的生產來解決的。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闢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

五年以來，我們經過了幾個階段。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

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但是我們渡過了困難。這不但是由於邊區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尤其是由於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邊區政府辦了許多的自給工業，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發展了以自給爲目標的農工商業，幾萬機關學校人員，也發展了同樣的自給經濟。軍隊和機關學校所發展的這種自給經濟是目前這種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物，它在其他歷史條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並且完全必要的。我們就用這些辦法戰勝了困難。只有發展經濟才能保障供給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無疑的歷史事實給我們證明了嗎？到了現在，我們雖則還有很多的困難，但是我們的公營經濟的基礎，已經打下了。一九四三年再來一年，我們的基礎就更加穩固了。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第一章，原題爲「關於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戰爭期間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由於日寇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解放區的財政發生了極大的困難。毛澤東同志指出黨必須努力領導人民發展農業生產和其他生產事業，並號召解放區的機關、學校、部隊盡可能地實行生產自給，以便克服財政和經濟的困難。毛澤東同志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書，以及「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組織起來」等文，就是當時黨領導解放區生產運動的基本綱領。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書裏，毛澤東同志着重地批判了那種離開發展經濟而單純在財政收支問題上打主意的錯誤思想，和那種不注意動員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渡過困難而只注意向人民要東西的錯誤作風，提出了黨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正確方針。在這個方針之下發展起來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各解放區的生產運動，得到了巨大的成績，不但使解放區軍民勝利地渡過了抗日戰爭的最困難時期，而且給黨在後來對於經濟建設工作的領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發展經濟的路綫是正確的路綫，但發展不是冒險的無根據的發展。有些同志不顧此時此地的具體條件，空嚷發展，例如要求建設重工業，提出大鹽業計劃、大軍工計劃等，都是不切實際的，不能採用的。黨的路綫是正確的發展路綫，一方面要反對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這就是黨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的兩條戰綫上的鬥爭。

我們要發展公營經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人民給我們幫助的重要性。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一九四〇年的九萬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萬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萬担⁽¹⁾，保證了軍隊和工作人員的食糧。截至一九四一年，我們公營農業中的糧食生產一項，還是很微弱的，我們在糧食方面還是依靠老百姓。今後雖然一定要加重軍隊的糧食生產，但是暫時也還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陝甘寧邊區雖然沒有直接遭受戰爭破壞的後方環境，但是地廣人稀，只有一百五十萬人口，供給這樣多的糧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爲我們運公鹽和出公鹽代金，一九四一年還買了五百萬元公債，也是不小的負擔。爲了抗日和建國的需要，人民是應該負擔的，人民很知道這種必要性。在公家極端困難時，要人民多負擔一點，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諒解。但是我們一方面取之於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這就是對人民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鹽業和商業，採取幫助其發展的適當步驟和辦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並且使所得大於所失，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

有些同志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應施『仁政』，這是錯誤的觀點。因爲抗日戰爭如果不勝利，所謂『仁政』不過是施在日本帝國主義身上，於人民是不相干的。反過來，人民負擔雖然一

時有些重，但是戰勝了政府和軍隊的難關，支持了抗日戰爭，打敗了敵人，人民就有好日子過，這個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另外的錯誤觀點，就是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這是國民黨的思想，我們決不能承襲。我們一時候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但是我們立即動手建設了公營經濟。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兩年中，軍隊和機關學校因自己動手而獲得解決的部分，佔了整個需要的大部分。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蹟，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我們的自給經濟愈發展，我們加在人民身上的賦稅就可以愈減輕。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個階段中，我們取之於民是很少的，在這一階段內，大大地休養了民力。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為第二階段，人民負擔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後，可以走上第三階段。如果我們的公營經濟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兩年內是繼續發展的，如果我們在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在這兩年內獲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機會，那末，在兩年以後，人民負擔又可減輕了，民力又可得到休養了。這個趨勢是可能實現的，我們應該準備這樣做。

我們要批駁這樣那樣的偏見，而提出我們黨的正確的口號，這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在公私關係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口號，才是正確的口號。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雖在困難時期，我們仍要注意賦稅的限度，使負擔雖重而民不傷。而一經有了辦法，就要減輕人民負擔，藉以休養民力。

國民黨的頑固分子覺得邊區的建設是無希望的，邊區的困難是不可克服的困難，他們每天都在

等待着邊區『場合』。對於這種人，我們用不着和他們辯論，他們是永遠也看不到我們『場合』的日子，我們只會興盛起來。他們不知道在共產黨和邊區革命政府的領導下，人民羣衆總是擁護黨和政府的。黨和政府在經濟和財政方面也一定有辦法，足以渡過任何嚴重的困難。我們現在的困難，有的已經渡過，有的快要渡過。我們曾經歷過比現在還要困難到多少倍的時候，那樣的困難我們也渡過了。現在華北華中各根據地的困難，比陝甘寧邊區要大得多，那裏天天有嚴重的戰爭，那裏已經支持了五年半，那裏也一定能够繼續支持，直到勝利。在我們面前是沒有悲觀的，我們能够戰勝任何的困難。

這次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以後，我們就要實行『精兵簡政』^(三)。這一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澈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局部的。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這五項，對於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關係極大。精簡之後，減少了消費性的支出，增加了生產的收入，不但直接給予財政以好影響，而且可以減少人民的負擔，影響人民的經濟。經濟和財政工作機構中的不統一、鬧獨立性、各自爲政等惡劣現象，必須克服，而建立統一的、指揮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貫徹到底的工作系統。這種統一的系統建立後，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節約是一切工作機關都要注意的，經濟和財政工作機關尤其要注意。實行節約的結果，可以節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費性的支出，其數目可以達到幾千萬元。從事經濟和財政業務的工作人員，還必須克服存在着的有些還是很嚴重的官僚主義，例如貪污現象，擺空架子，無益的『正規化』，文牘主義等等。如果我們把這五項要求在黨的、政府的、軍隊的各個系統中完全實行起

來，那我們的這次精兵簡政，就算達到了目的，我們的困難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們會要『場台』的人們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們封住了。

〔註 釋〕

- 〔一〕毛澤東同志在這裏所舉的糧食數字，是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陝甘寧邊區農民所繳納的農業稅（即公糧）的總數。
- 〔二〕參看本書「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一文。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一) 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羣衆相結合。

(二) 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羣衆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於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於落空的危險。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績者，都是採用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採用此種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全年整風計劃）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和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選擇二、三單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詳細了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發展過程，詳細了解這些單位中若干個（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員的政治經歷、思想特點、學習勤惰和工作優劣，並親自指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具體地解決各該單位的實際問題，藉以取得經驗。一

機關、一學校、一部隊內部也有若干單位，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領導人員也須這樣去做。這又是領導人員指導和學習相結合的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地提倡，使各級領導幹部都能學會使用。

(三) 一九四二年的整風經驗又證明：每一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的首要負責人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幹，並使這一領導骨幹和參加學習的廣大羣衆密切結合，才能使整風完成任務。只有領導骨幹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羣衆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羣衆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幹去恰當地組織羣衆的積極性，則羣衆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任何有羣衆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後的三部分人。故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幹，並憑藉這批骨幹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後分子。凡屬真正團結一致、聯繫羣衆的領導骨幹，必須是從羣衆鬥爭中逐漸形成，而不是脫離羣衆鬥爭所能形成的。在多數情形下，一個偉大的鬥爭過程，其開始階段、中間階段和最後階段的領導骨幹，不應該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須不斷地提拔在鬥爭中產生的積極分子，來替換原有骨幹中相形見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許多地方和許多機關工

作推不動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缺乏這樣一個團結一致、聯繫羣衆的經常健全的領導骨幹。一個百人的學校，如果沒有一個從教員中、職員中、學生中按照實際形成的（不是勉強湊集的）最積極最正派的最機敏的幾個人乃至十幾個人的領導骨幹，這個學校就一定辦不好。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十二個條件的第九條中所說建立領導核心問題^(二)，我們應該應用到一切大小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和農村中去。這種領導骨幹的標準，應當是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中所舉的四條幹部標準（無限忠心，聯繫羣衆，有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三)。無論是執行戰爭、生產、教育（包括整風）等中心任務，或是執行檢查工作、審查幹部和其他工作，除採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以外，都須採取領導骨幹和廣大羣衆相結合的方法。

（四）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將羣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爲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羣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爲羣衆的意見，使羣衆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羣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再到羣衆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五）領導骨幹和廣大羣衆在組織中在鬥爭行動中發生正確關係的思想，正確的領導意見只能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又到羣衆中堅持下去的思想，在領導意見見之實行時，要將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互相結合的思想，都必須在這次整風中普遍地加以宣傳，藉以糾正幹部中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觀點。

許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於團結積極分子組成領導核心，不注重和不善於使這種領導核心同廣大羣衆密切地結合起來，因而使自己的領導變成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的領導。許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於總結羣衆鬥爭的經驗，而歡喜主觀主義地自作聰明地發表許多意見，因而使自己的意見變成不切實際的空論。許多同志，滿足於工作任務的一般號召，不注重和不善於在作了一般號召之後，緊緊地接着從事於個別的具體的指導，因而使自己的號召停止在嘴上，紙上或會議上，而變爲官僚主義的領導。這次整風，必須糾正這些缺點，在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中學會領導和羣衆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方法，並在以後應用此種方法於一切工作。

(六)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又到羣衆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在集中和堅持過程中，必須採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這是前一個方法的組成部分。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告訴別人也這樣做），然後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羣衆。同志們在這次整風中應該這樣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應該這樣去做。比較好的領導，就是從比較善於這樣去做而得到的。

(七)對於任何工作任務（革命戰爭、生產、教育，或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或宣傳工作、組織工作、鋤奸工作等等）的向下傳達，上級領導機關及其個別部門都應當通過有關該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們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一元化）。不應當只是由上

級的個別部門去找下級的個別部門（例如上級組織部只找下級的組織部，上級宣傳部只找下級的宣傳部，上級鋤奸部只找下級的鋤奸部），而使下級機關的總負責人（例如書記、主席、主任、校長等）不知道，或不負責。應當使總負責人和分負責人都知道，都負責。這樣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幹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做，可以克服各單個部門幹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為積極參加該項工作的幹部。這也是領導和羣衆相結合的一種形式。例如審查幹部，如果僅僅由組織部這個領導機關的少數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過某一機關或某一學校的行政負責人，推動該機關該學校的許多人員、許多學生，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全體學生都參加審查，而上級組織部的領導人員則正確地指導這種審查，實行領導和羣衆相結合的原則，審查幹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滿地達到。

（八）在任何一個地區內，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中心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個地區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鬥爭歷史和鬥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無計劃，只按上級指示來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亂無秩序的狀態。上級機關也不要不分輕重緩急地沒有中心地同時指定下級機關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級在工作步驟上的凌亂，而得不到確定的結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並把這種決定堅持地貫徹下去，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這也是在運用領導和羣衆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

合這些原則時，必須注意解決的領導方法問題。

(九) 領導方法問題上的各個細節問題，這裏不一一說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據這裏所說的原則方針自己去用心思索，發揚自己的創造力。鬥爭愈是艱苦，就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領導和廣大羣衆的要求密切地相結合，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密切地相結合，而徹底粉碎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同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後者。主觀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不知道領導和羣衆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原則，極大地妨礙黨的工作的發展。爲了反對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

〔註釋〕

〔一〕 見斯大林『論德國共產黨前途並論布爾塞維克化』一文。

〔二〕 見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上所作的結論『爲工人階級的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綫而鬥爭』的第七部分『幹部問題』。

質問國民黨*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近月以來，中國抗日陣營內部，發生了一個很不經常很可駭怪的事實，這就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許多黨政軍機關發動了一個破壞團結抗戰的運動。這個運動是以反對共產黨的姿態出現，而其實際，則是反對中華民族和反對中國人民的。

首先看國民黨的軍隊。國民黨領導的全國軍隊中，位置在西北方面的主力就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等三個集團軍，都受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指揮。其中有兩個集團軍用於包圍陝甘寧邊區，只有一個用於防守從宜川至潼關一段黃河沿岸，對付日寇。這種事實，已經是四年多了，只要不發生軍事衝突，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不料近日却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即担任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個軍中，開動了兩個軍，第一軍開到邢州、淳化一帶，第九十軍開到洛川一帶，並積極準備進攻邊區，而使對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虛起來。

這不能不使人們發生這樣的疑問，這些國民黨人同日本人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

許多國民黨人肆無忌憚地天天宣傳共產黨『破壞抗戰』、『破壞團結』，難道盡撤河防主力，倒叫

做增強抗戰麼？難道進攻邊區，倒叫做增強團結麼？

請問幹這些事的國民黨人：你們拿背對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對着你們，如果日本人向你們的背前進，那時你們怎麼辦呢？

如果你們將大段的河防丟棄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靜悄悄地在對岸望着不動，只是拿着望遠鏡興高采烈地注視着你們愈走愈遠的背影，那末，這其中又是一種什麼緣故呢？爲什麼日本人這樣歡喜你們的背，而你們丟了河防不管，讓它大段地空着，你們的心就那麼放得下去呢？

在私有財產社會裏，夜間睡覺總是要關門的。大家知道，這不是爲了多事，而是爲了防賊。現在你們將大門敞開，不怕賊來麼？假使敞開大門而賊竟不來，却是什麼緣故呢？

照你們的說法，中國境內只有共產黨是『破壞抗戰』的，你們則是如何如何的『民族至上』，那末，背向敵人，却是什麼至上呢？

照你們的說法，『破壞團結』的也是共產黨，你們則是如何如何的『精誠團結』主義者，那末，你們以三個集團軍（缺一個軍）的大兵，手持刺刀，配以重砲，向着邊區人民前進，這也可以算作『精誠團結』麼？

或者照你們的另一種說法，你們並不愛好什麼團結，而却十分愛好『統一』，因此就要蕩平邊區，

消滅你們所說的『封建割據』，殺盡共產黨。那末，好吧，爲什麼你們不怕日本人把中華民族『統一』了去，並且也把你們混在一起『統一』了去呢？

如果事變的結果，只是你們旗開得勝地『統一』了邊區，削平了共產黨，而日本人却被你們的什麼『蒙汗藥』蒙住了，或被什麼『定身法』定住了，動彈不得，因此民族以及你們都不曾被他們『統一』了去，那末，我們的親愛的國民黨先生們，可否把你們的這種什麼『蒙汗藥』或『定身法』給我們宣示一二呢？

假如你們也沒有什麼對付日本人的『蒙汗藥』、『定身法』，又沒有和日本人訂立默契，那就讓我們正式告訴你們吧：你們不應該打邊區，你們不可以打邊區。『鵲蚌相持，漁人得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兩個故事，是有道理的。你們應該和我們一道去把日本佔領的地方統一起來，把鬼子趕出去才是正經，何必急急忙忙地要來『統一』這塊巴掌大的邊區呢？大好河山，淪於敵手，你們不急，你們不忙，而却急於進攻邊區，忙於打倒共產黨，可痛也夫！可恥也夫！

其次看國民黨的黨務。國民黨爲了反對共產黨，辦了幾百個特務大隊，其中什麼烏龜忘八也收了進去。即如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亦即公曆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抗戰六週年紀念的前夕，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發出了這樣一個消息，說是陝西省的西安地方，有些什麼『文化團體』開了一個會，決定打電報給毛澤東，叫他趁着第三國際解散的時機，將中國共產黨也『解散』，還有一條是『取消邊區割據』。讀者定會覺得這是一條『新聞』吧，其實却是一條舊聞。

原來這件事出於幾百個特務大隊中的一個大隊。它受了特務總隊部（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指令，叫一個以在國民黨出錢的漢奸刊物『抗戰與文化』上寫反共文章出名、現充西安勞動營訓導處長的托派漢奸張滌非，於六月十二日那天，就是說還在中央社發表消息這天以前二十五天，就召集了九個人開了十分鐘的會，『通過』了一紙所謂電文。

這個電文，延安到今天還沒有收到，但其內容已經明白，據說是第三國際既已解散，中國共產黨也應『解散』，還有『馬列主義已經破產』云云。

這也是國民黨人說的話兒呢！我們常常覺得，這一類（物以類聚）國民黨人的嘴裏，是什麼東西也放得出來的，果不其然，於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傢伙！

現在中國境內黨派甚多，單單國民黨就有兩個。其中有一個叫汪記國民黨的，立在南京以及各地，打的也是青天白日旗，也有一個什麼中央執行委員會，也有一批特務大隊。此外，還有日本法西斯黨遍於淪陷區。

我們的親愛的國民黨先生們，你們在第三國際解散之後所忙得不可開交的，單單就在於圖謀『解散』共產黨，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漢奸黨和日本黨，這是什麼緣故呢？當你們指使張滌非寫電文時，何以不於要求解散共產黨之外，附帶說一句還有漢奸黨和日本黨也值得解散呢？

難道你們以為共產黨太多了嗎？全中國境內共產黨只有一個，國民黨却有兩個，究竟誰是多了

國民黨先生們，你們也會想一想這件事麼？爲什麼除了你們之外，還有日本人和汪精衛，一致下死勁地要打倒共產黨，一致地宣稱只有共產黨是太多了，因此要打倒；而國民黨呢，却總是不覺得多，只覺得少，到處扶植養育着汪記國民黨，這是什麼緣故呢？

國民黨先生們，讓我們不厭麻煩地告訴你們吧：日本人和汪精衛之所以特別愛好國民黨和三民主義者，就是因爲這個黨這個主義當中有可以給他們利用的地方。這個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只有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時期，孫中山先生把它改組了，把共產黨人接受進去，形成了國共合作式的民族聯盟，才被一切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們所痛恨，所不敢愛好，所極力圖謀打倒。這個主義，也只有在同一時期，經過孫中山的手加以改造，成爲載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三民主義，即革命的三民主義，才被一切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們所痛恨，所不敢愛好，所極力圖謀打倒。除此而外，這個黨，這個主義，在排除了共產黨、排除了孫中山革命精神的條件下，就受到一切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們的愛好，因此日本法西斯和漢奸汪精衛也愛好起來，如獲至寶地加以養育，加以扶植。從前汪記國民黨的旗子左角上還有一塊黃色符號，以示區別，於今索性不要這個區別了，一切改成一樣，以免礙眼。其愛好之程度爲何如？

不但在淪陷區，而且在大後方，汪記國民黨也是林立的。有些是秘密的，這就是敵人的第五縱隊。有些是公開的，這就是那些吃黨飯，吃特務飯，但是毫不抗日，專門反共的人們。這些人，表皮上沒

有標出汪記，實際上是汪記。這些人也是敵人的第五縱隊，不過比前一種稍具形式上的區別，藉以偽裝自己，迷人眼目而已。

至此，問題就完全明白了。當你們指示張滌非寫電文時，所以絕對不肯在要求『解散』共產黨之外附帶說一句還有日本黨和漢奸黨也值得解散者，是由於不論在思想上，在政策上，在組織上，你們和他們之間，都有許多共同的地方，其中最基本的共同思想，就是反共反人民。

還有一條要質問國民黨人的，世界上以及中國境內，『破產』的只有一種馬克思列寧主義，別的都是好傢伙麼？汪精衛的三民主義前面已經說過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的法西斯主義怎麼樣呢？張滌非的托洛茨基主義又怎麼樣呢？中國境內不論張記李記的反革命特務機關的反革命主義又怎麼樣呢？

我們的親愛的國民黨先生們，你們指示張滌非寫電文時，何以對於這樣許多像瘟疫一樣、像臭蟲一樣、像狗屎一樣的所謂『主義』，連一個附筆或一個但書也沒有呢？難道在你們看來，一切這些反革命的東西，都是完好無缺，十全十美，惟獨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破產』乾淨了的麼？

老實說吧，我們很疑心你們同那些日本黨、漢奸黨互相勾結，所以如此和他們一個鼻孔出氣，所以說出的一些話，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敵人漢奸一模一樣，毫無二致，毫無區別。敵人漢奸要解散新四軍，你們就解散新四軍；敵人漢奸要解散共產黨，你們也要解散共產黨；敵人漢奸要取消邊區，你們也要取消邊區；敵人漢奸不希望你們保衛河防，你們就丟棄河防；敵人漢奸攻打邊區（六年以

來，綏德、米脂、葭縣、吳堡、清澗一綫對岸的敵軍，砲擊八路軍所守河防陣地沒有斷過），你們也想攻打邊區，敵人漢奸反共，你們也反共；敵人漢奸痛罵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你們也痛罵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敵人漢奸捉了共產黨員強迫他們登報自首，你們也是捉了共產黨員強迫他們登報自首；敵人漢奸派遣反革命特務分子偷偷摸摸地鑽入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內施行破壞工作，你們也派遣反革命特務分子偷偷摸摸地鑽入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內施行破壞工作。何其一模一樣，毫無二致，毫無區別至於此極呢？你們的這樣許多言論行動，既然和敵人漢奸的所有這些言論行動一模一樣，毫無二致，毫無區別，怎麼能够不使人們疑心你們和敵人漢奸互相勾結，或訂立了某種默契呢？

我們正式向中國國民黨中央提出抗議：撤退河防大軍，準備進攻邊區，發動內戰，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行爲，是不能容許的。中央社於七月六日發出破壞團結、侮辱共產黨的消息，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言論，也是不能容許的。這兩種錯誤，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質，都是和敵人漢奸毫無區別的，你們必須糾正這些錯誤。

我們正式向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請你下令把胡宗南的軍隊撤回河防，請你取締中央社，並懲辦漢奸張滌非。

我們向一切不願撤離河防進攻邊區和不願要求解散共產黨的真正的愛國的國民黨人呼籲：請你們行動起來，制止這個內戰危機。我們願意和你們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於危亡。

我們認爲這些要求是完全正當的。

〔註釋〕

〔一〕毛澤東同志這裏是指蔣介石所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該書中，蔣介石公開提出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狂妄主張。

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一) 秋收已到，各根據地的領導機關必須責成各級黨政機關檢查減租政策的實行情況。凡未認真實行減租的，必須於今年一律減租。減而不澈底的，必須於今年澈底減租。黨委應即根據中央土地政策和當地情況發出指示，並親手檢查幾個鄉村，發現模範，推動他處。同時，應在報紙上發表關於減租的社論和關於減租的模範經驗的報道。減租是農民的羣衆鬥爭，黨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領導和幫助這個羣衆鬥爭，而不是給羣衆以恩賜。凡不發動羣衆積極性的恩賜減租，是不正確的，其結果是不鞏固的。在減租鬥爭中應當成立農民團體，或改造農民團體。政府應當站在執行減租法令和調節束佃利益的立場上。現在根據地已經縮小，我黨在根據地內細心地認真地澈底地爭取羣衆、和羣衆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務，較之過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義。今秋如能檢查減租政策的實施程度，並實行澈底減租，就能發揚農民羣衆的積極性，加強明年的對敵鬥爭，推動明年的生產運動。

(二) 敵後各根據地的大多數幹部，還沒有學會推動黨政機關人員、軍隊人員和人民羣衆（一切公私軍民男女老少，絕無例外）實行大規模的生產。黨委、政府和軍隊，必須於今年秋冬準備好明年

在全根據地內實行自己動手、克服困難（除陝甘寧邊區外，暫不提豐衣足食口號）的大規模生產運動，包括公私農業、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而以農業為主體。實行按家計劃，勞動互助（陝北稱變工隊），過去江西紅色區域稱耕田隊或勞動互助社），獎勵勞動英雄，舉行生產競賽，發展為羣衆服務的合作社。縣區黨政工作人員在財政經濟問題上，應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然後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從農民取得稅收。對前者用了苦功，對後者便輕而易舉。一切機關學校部隊，必須於戰爭條件下厲行種菜、養豬、打柴、燒炭、發展手工業和部分種糧。除各大小單位應一律發展集體生產外，同時獎勵一切個人（軍隊除外）從事小部分農業和手工業的個人業餘生產（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歸個人所有。各地應開辦七天至十天為期的種菜訓練班、養豬訓練班和爲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員訓練班。在一切黨政軍機關中講究節省，反對浪費，禁止貪污。各級黨政軍機關學校一切領導人員都須學會領導羣衆生產的一全套本領。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一切軍民人等凡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一切未脫離生產的農村黨員，應以發展生產爲自己充當羣衆模範的條件之一。在生產運動中，不注重發展經濟，只片面地在開支問題上打算盤的保守的單純的財政觀點，是錯誤的。不注重組織黨政軍羣衆和人民羣衆的廣大勞動力，以開展羣衆生產運動，只片面地注意少數政府人員忙於收糧收稅弄錢弄飯的觀點，是錯誤的。不知用全力

幫助羣衆發展生產，只知向羣衆要糧要款的觀點（國民黨觀點），是錯誤的。不注意全面地發動羣衆生產運動，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數經濟機關組織少數人從事生產的觀點，是錯誤的。把共產黨員爲着供給家庭生活（農村黨員）和改善自己生活（機關學校黨員）以利革命事業，而從事家庭生產和個人業餘生產，認爲不光榮不道德的觀點，是錯誤的。在有根據地的條件下，不提倡發展生產並在發展生產的條件下爲改善物質生活而鬥爭，只是片面地提倡艱苦奮鬥的觀點，是錯誤的。不把合作社看作爲羣衆服務的經濟團體，而把合作社看作爲少數工作人員賺錢牟利，或看作政府公營商店的觀點，是錯誤的。不把陝甘寧邊區一些農業勞動英雄的模範勞動方法（勞動互助，多犁多鋤多上糞）推行於各地，而說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據地推行的觀點，是錯誤的。不在生產運動中實行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和廣大羣衆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別緩急輕重，爭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參加生產，培養幹部，教育羣衆，只知把生產任務推給建設廳長、供給部長、總務處長的觀點，是錯誤的。在目前條件下，發展生產的中心關節是組織勞動力。每一根據地，組織幾萬黨政軍的勞動力和幾十萬人民的勞動力（取按家計劃、變工隊、運輸隊、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願和等價的原則下，把勞動力和半勞動力組織起來）以從事生產，即在現時戰爭情況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勞動力的全部方針和方法。今年全部根據地的一律徹底減租，將是明年大規模發展生產的一個刺激。而明年不論黨政軍民男女老幼全體一律進行偉大的生產運動，增加糧食和日用品，準備同災荒作鬥爭，將是繼續堅持抗日根據地的物質基礎。否則便將遇到極

大的困難。

(三)爲了使黨政軍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於開展明年的對敵鬥爭和生產運動，各根據地黨委和軍政領導機關，應準備於明年陰曆正月普遍地、無例外地舉行一次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三)的廣大規模的羣衆運動。軍隊方面，重新宣佈擁政愛民公約，自己開檢討會，召集居民開聯歡會（當地黨政參加），有損害羣衆利益者，實行賠償、道歉。羣衆方面，由當地黨政和羣衆團體領導，重新宣佈擁軍優抗公約，舉行熱烈的勞軍運動。在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的運動中，澈底檢查軍隊方面和黨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點錯誤，而於一九四四年堅決改正之。以後應於每年正月普遍舉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讀擁政愛民公約和擁軍優抗公約，再三再四地將各根據地曾經發生的軍隊欺壓黨政民和黨政民關心軍隊不足的缺點錯誤，實行公開的羣衆性的自我批評（各方面只批評自己，不批評對方），而澈底改正之。

〔註 釋〕

〔一〕見本書「組織起來」註四。

〔三〕「擁政愛民」，是根據地的軍隊人員「擁護政府、愛護人民」的口號的簡稱。「擁軍優抗」，是根據地的黨和政府機關、羣衆團體的工作人員和人民羣衆「擁護軍隊、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口號的簡稱。

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 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國民黨召集了十一中全會，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國民黨政府召集了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兩個會議的全部材料現已收齊，我們可以作一總評。

國際局勢已到了大變化的前夜，現在無論何方均已感到了這一變化。歐洲軸心國是感到了這一變化的；希特勒採取了最後掙扎的政策。這一變化主要地是蘇聯造成的。蘇聯正在利用這一變化：紅軍已經用席捲之勢打到了德涅泊河；再一個冬季攻勢，不打到新國界，也要打到舊國界。英美也正在利用這個變化：羅斯福、邱吉爾正在等待希特勒搖搖欲墜時打進法國去。總之，德國法西斯戰爭機構快要土崩瓦解了，歐洲反法西斯戰爭的問題已處在總解決的前夜，而消滅法西斯的主力軍是蘇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問題的樞紐在歐洲；歐洲問題解決，就決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兩大陣綫的命運。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感到走頭無路，它的政策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準備作最後掙扎。它對於中國，則是對共產黨『掃蕩』，對國民黨誘降。

國民黨人亦感到了這個變化。他們在這一形勢面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他們以爲歐洲解決，英美可以騰出手來替他們打日本，他們可以不費氣力地搬回南京。懼的是三個法西斯國家一齊垮台，世界成了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偉大解放時代，國民黨的買辦封建法西斯獨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個渺小的孤島，他們懼怕自己『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主義有滅頂之災。

本來，國民黨人的主意是叫蘇聯獨力去拚希特勒，並挑起日寇去攻蘇聯，把個社會主義國家拚死或拚壞，叫英美不要在歐洲鬧什麼第二第三戰場，而把全力搬到東方先把日本打垮，再把中國共產黨打掉，然後再說其他。國民黨人起初大嚷『先亞後歐論』，後來又嚷『歐亞平分論』，就是爲了這個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年八月魁北克會議的末尾，羅斯福和邱吉爾叫了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去，講了幾句話，國民黨人又嚷『羅邱視綫移到東方了，先歐後亞計劃改變了』，以及『魁北克會議是英美中三強會議』之類，還要自賣自誇地樂一陣。但這已是國民黨人的最後一樂。自此以後，他們的情緒就有些變化了，『先亞後歐』或『歐亞平分』從此送入歷史博物館，他們可能要另打主意了。國民黨的十中全會和國民黨操縱的這次參政會，可能就是這種另打主意的起點。

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污蔑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同時又聲言『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

政』。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在大多數國民黨員把持操縱之下，通過了和十一中全會大體相同的對共決議案。此外，十一中全會還『選舉』了蔣介石作國民黨政府的主席，加強獨裁機構。

十一中全會後國民黨人可能打什麼主意呢？不外三種：（一）投降日本帝國主義；（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變政治方針。

國民黨內的失敗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適應日本帝國主義『對共產黨打，對國民黨拉』的要求，是一路來主張投降的。他們時刻企圖策動反共內戰，只要內戰一開，抗日自然就不可能，只有投降一條路走。國民黨在西北集中了四十至五十萬大軍，現在還在由其他戰場把軍隊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據說將軍們的胆氣是很豪的，他們說：『打下延安是不成問題的問題。』這是他們在國民黨十一中全會上聽了蔣介石先生所謂共產黨問題『爲一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的演說，和全會作了與蔣所說大體相同的決議之後說的話。去年國民黨十中全會亦作了與此相同的決議，可是墨汁未乾，將軍們即奉命作成消滅邊區的軍事計劃；今年六、七兩月實行調兵遣將，準備對邊區發動閃擊戰，僅因國內輿論的反對，才把這一陰謀暫時擱下。現在十一中全會決議的墨汁剛剛灑在白紙上，將軍們的豪語和兵力的調動又見告了。『打下延安是不成問題的問題』，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決定投降日本帝國主義。一切贊成『打延安』的國民黨人，不一定都是主觀上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義者。他們中間有些人也許是這樣想：我們一面反共，一面還是要抗日的。許多黃埔系軍人（二）可能就是這樣想。但是我們共產黨人要向這些先生們發出一些問題：你們忘了十年內戰的經驗嗎？內戰一開，那些打定了

主意的投降主義者們容許你們再抗日麼？日本人和汪精衛容許你們再抗日麼？你們自己究有多大本領，能够對內對外兩面作戰麼？你們現在名曰有三百萬兵，實際上士氣頹喪已極，有人比做一担雞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中條山戰役，太行山戰役，浙贛戰役，鄂西戰役，大別山戰役，無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為你們實行『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兩個要命的政策而來的。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你們越是積極反共和消極抗日，你們的士氣就越發頹喪。你們對外敵如此，難道你們對共產黨對人民就能忽然兇起來麼？不能的。只要你們內戰一開，你們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內戰，什麼『一面抗戰』必然拋到九霄雲外，結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國主義訂立無條件投降的條約，只能有一個『降』字方針。國民黨中一切不願意真正投降的人們，只要你們積極地發動了或參加了內戰，你們就不可避免地要變為投降主義者。如果你們聽信投降派的策動，把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參政會的決議當作動員輿論、準備發動反共內戰的工具，其結果必然要走到此種地步。即使自己本來不願意投降，但若聽信了投降派的策動，採取了錯誤的步驟，結果就只好跟着投降派投降。這是十一中全會後國民黨的第一種可能的方向，這個危機極端嚴重地存在着。在投降派看來，『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正是準備內戰亦即準備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產黨人、愛國的國民黨人、各個抗日黨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睜起眼睛注視這個極端嚴重的時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頭腦。須知正是在國民黨十一中全會之後，內戰危機是空前未有的。

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參政會的決議可以向另一個方向發展，這就是『暫時拖，將來打』。

這個方向和投降派的方向有多少的差別，這是在表面上還要維持抗日的局面，但又絕對不願放棄反共和獨裁的人們的方向。這些人們是可能採取此種方向的，那是因為他們看見國際大變化不可避免，看見日本帝國主義必然要失敗，看見內戰就是投降，看見國內人心擁護抗日、反對內戰，看見國民黨脫離羣衆、喪失人心，自己已處於從來未有的孤立地位這種嚴重的危機，看見美國、英國、蘇聯一致反對中國政府發動內戰，因此迫得他們把內戰陰謀推遲下去，而以『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的空話，作爲拖下去的工具。這些人們歷來的手段就是善於『騙』和『拖』。這些人們之想『打下延安』和『消滅共產黨』是做夢也不會忘記的。在這一點上，他們和投降派毫無二致。只是他們還想打着抗日的招牌，還不願喪失國民黨的國際地位，有時也還顧慮到國際國內的輿論指摘，所以他們可能暫時地拖一下，而以『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作爲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將來的有利條件。他們並無真正『政治解決』和『實行憲政』的誠意，至少現時他們絕無此種誠意。去年國民黨十中全會前後，共產黨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慶會見蔣介石先生，在重慶等候了十個月之久，但是蔣先生和國民黨中央連一個具體問題也不願意談。今年三月，蔣先生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強調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把十年內戰的責任推在共產黨身上，污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爲『新式軍閥』，『新式割據』，暗示兩年內一定要解決共產黨。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蔣先生允許周恩來、林彪等同志回延安，但他就在這時下令調動河防兵力向邊區前進，下令叫全國各地以『民衆團體』之名，乘第三國際解散機會，要求解散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共產黨人乃不得不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呼籲制止內

戰，不得不將國民黨各種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陰謀黑幕加以揭發。我們已忍耐到了極點，有歷史事實爲證。武漢失守以來，華北華中的大小反共戰鬥沒有斷過。太平洋戰爭爆發亦已兩年，國民黨即在華中、華北打了共產黨兩年，除原有國民黨軍隊外，又復派遣王仲廉、李仙洲兩個集團軍到江蘇、山東打共產黨。太行山龐炳勳集團軍是受命專門反共的，安徽和湖北的國民黨軍隊亦是受命反共的。所有這些，我們過去長期內連事實都沒有公佈。國民黨一切大小報紙刊物無時無刻不在辱罵共產黨，我們在長期內一個字也沒有回答。國民黨毫無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軍，殲滅新四軍皖南部隊九千餘人，逮捕葉挺，打死項英，囚繫新四軍幹部數百人，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們除向國民黨提出抗議和善後條件外，仍然相忍爲國。陝甘寧邊區是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間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同志和蔣介石先生在廬山會見時，經蔣先生允許發佈命令、委任官吏、作爲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行政區域的，蔣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萬軍隊包圍邊區，實行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必欲置邊區人民和八路軍後方留守機關於死地而後快。至於斷絕八路軍接濟，稱共產黨爲『奸黨』，稱新四軍爲『叛軍』，稱八路軍爲『奸軍』等等事實，更是盡人皆知。總之，凡幹這些事的國民黨人，是把共產黨當作敵人看待的。在國民黨看來，共產黨是比日本人更加十倍百倍地可恨的。國民黨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產黨；對於日本人，如果說還有仇恨，也只剩下極小的一部分。這和日本法西斯對待國共兩黨的不同態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則一天一天地心平氣和了，『反共』、『滅黨』兩個口號，於今只剩下一個『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衛的報紙刊物，

再也不提『打倒國民黨』、『推翻蔣介石』這類口號了。日本把其在華兵力百分之五十八壓在共產黨身上，只把百分之四十二監視國民黨；近來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許多軍隊，減少監視兵力，以利誘降。日本帝國主義不敢向共產黨說出半句誘降的話，對於國民黨則敢於連篇累牘，嗚嗚不休，勸其降順。國民黨只在共產黨和人民面前還有一股兇氣，在日本面前則一點兒也兇不起來了。不但在行動上早已由抗戰改爲觀戰，就是在言論上也不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和各種侮辱言論做出一點兩點稍爲尖銳的駁斥。日本人說：『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的論述方向是沒有錯誤的。』蔣先生及其黨人曾經對這話提出過任何駁斥嗎？沒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國主義看見蔣先生和國民黨只對共產黨提出所謂『軍令政令』和『紀律』，但對二十個投敵的國民黨中委，五十八個投敵的國民黨將領，却不願也不敢提出軍令政令和紀律問題，這叫日本帝國主義如何不輕視國民黨呢！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見蔣先生和國民黨解散新四軍，進攻八路軍，包圍邊區，誣之爲『奸黨』、『奸軍』、『新式軍閥』、『新式割據』，誣之爲『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經常不斷地提出所謂『軍令政令』和『紀律』，而對於二十個投敵的國民黨中委，五十八個投敵的國民黨將領，却不執行任何的軍令政令，不執行任何的紀律處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會和國民參政會，也是依然只有對付共產黨的決議，沒有任何一件對付國民黨自己大批叛國投敵的中央委員和大批叛國投敵的軍事將領的決議，這叫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國民黨呢！十一中全會果然又有『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的話頭了，好得很，我們是歡迎這些話頭的。但據國民黨多年來一貫的政治路綫看來，我們認爲這不過是一堆騙人的空

話，而其實是爲着準備打內戰和永不放棄反人民的獨裁政治這一目的，爭取其所必要的時間。

時局的發展是否還可以有第三種方向呢？可以有的，這在一部分國民黨員、全國人民和我們共產黨人，都是希望如此的。什麼是第三種方向？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決國共關係問題，誠意實行真正民主自由的憲政，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政治，並在抗戰期內召集真正民意選舉的國民大會。我們共產黨人是自始至終主張這個方針的。一部分國民黨人也會同意這個方針。就連蔣介石先生及其嫡系國民黨，我們過去長期地也總是希望他們實行這個方針。但是依據幾年的實際情形看來，依據目前事實看來，蔣先生和大部分當權的國民黨人都沒有任何事實表示他們願意實行這種方針。

實行這種方針，要有國際國內許多條件。目前國際條件（歐洲法西斯總崩潰的前夜）是有利於中國抗日的，但投降派却更想在這時策動內戰以便投降，日本人和汪精衛却更想在這時策動內戰以利投降。汪精衛說：『最親善的兄弟終久還是兄弟，重慶將來一定和我們走同一道路，但我們希望這一日期愈快愈好。』（十月一日同盟社消息）何其親暱、肯定和迫切乃爾！所以，目前的時局，最佳不過是拖一下，而突然惡化的危險是很嚴重的。第三個方向的條件還不具備，需要各黨各派的愛國分子和全國人民進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爭取到。

蔣介石先生在國民黨十一中全會上宣稱：『應宣明中央對於共產黨並無其他任何要求，只望其放棄武裝割據及停止其過去各地襲擊國軍破壞抗戰之行爲，並望其實踐二十六年共赴國難之宣言，履

行諾言中所舉之四點。』

蔣先生所謂『襲擊國軍破壞抗戰之行爲』，應該是講的國民黨，可惜他偏心地和忍心地污蔑了共產黨。因爲自武漢失守以來，國民黨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在這三次反共高潮中都有國民黨軍隊襲擊共產黨軍隊的事實。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〇年春季，那時國民黨軍隊襲佔了陝甘寧邊區八路軍駐防的淳化、枸邑、正寧、寧縣、鎮原五城，並且使用了飛機。在華北，派遣朱懷冰襲擊太行區域的八路軍，而八路軍僅僅爲自衛而作戰。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先是何應欽白崇禧以『皓電』（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送達朱、彭、葉、項，強迫命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限期一個月一律開赴黃河以北。我們答應將皖南部隊北移，其他部隊則事實上無法移動，但仍答應在抗戰勝利後移向指定的地點。不料正當皖南部隊九千餘人於一月五日遵命移動之時，蔣先生早已下了『一網打盡』的命令。自六日起十四日止，所有皖南國民黨軍隊果然將該部新四軍實行『一網打盡』，蔣先生並於十七日下令解散新四軍全軍，審判葉挺。自此以後，華中華北一切有國民黨軍隊存在的抗日根據地內，所有那裏的八路軍新四軍無不遭受國民黨軍隊的襲擊，而八路軍新四軍則只是自衛。第三次，是從本年三月至現在。除國民黨軍隊在華中華北繼續襲擊八路軍新四軍外，蔣先生又發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國之命運』一書，調動了大量河防部隊準備閃擊邊區；發動了全國各地所謂『民衆團體』要求解散共產黨；動員了在國民參政會內佔大多數的國民黨員，接受何應欽污蔑八路軍的軍事報告，通過反共決議案，把一個表示團結抗日的國民參政會，變成了製造反共輿論準備國內戰爭的國民黨御

用機關，以至共產黨參政員董必武同志不得不聲明退席，以示抗議。總此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國民黨有計劃有準備地發動的。請問這不是『破壞抗戰之行爲』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中央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該宣言稱：『爲着取消敵人陰謀之藉口，爲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之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披瀝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鄭重向全國宣言：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實現而奮鬥；二、停止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和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改組現在的紅色政府爲特區民主政府，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改變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担任抗日前綫之職責。』

所有這四條諾言，我們是完全實踐了的，蔣介石先生和任何國民黨人也不能舉出任何一條是我們沒有實踐的。第一，所有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內共產黨所施行的政策都符合於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政策，絕對沒有任何一項政策是違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第二，在國民黨不投降民族敵人、不破裂國共合作、不發動反共內戰的條件之下，我們始終遵守不以暴力政策推翻國民黨政權和沒收地主土地的諾言。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亦準備如此。這就是說，僅僅在國民黨投降敵人、破裂合作、舉行內戰的條件下，我們才被迫着無法繼續實踐自己的諾言，因而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才失去繼續實踐諾言的可能性。第三，原來的紅色政權還在抗戰第一年就改組了，『三三制』的民主

政治也早已實現了，只是國民黨至今沒有實踐他們承認陝甘寧邊區的諾言，並且還罵我們做『封建割據』。蔣介石先生及國民黨人須知，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這種不被國民政府承認的狀態，這種你們所謂『割據』，不是我們所願意的，完全是你們迫得我們這樣做的。你們食言而肥，不承認這個原來答應承認了的區域，不承認這個民主政治，反而罵我們做『割據』，請問這是一種什麼道理？我們天天請求你們承認，你們却老是不承認，這個責任究竟應該誰負呢？蔣介石先生以國民黨總裁和國民政府負責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也是這樣亂罵『割據』，自己不負一點責任，這有什麼道理呢？現在乘着蔣先生又在十一中全會上要求我們實踐諾言的機會，我們就要求蔣先生實踐這個諾言：採取法令手續，承認早已實現民權主義的陝甘寧邊區，並承認敵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若是你們依然採取不承認主義，那就是你們叫我們繼續『割據』下去，其責任和過去一樣，完全在你們而不在我們。第四，『紅軍名義及番號』早已改變了，早已『改編爲國民革命軍』了，早已『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了，這條諾言早已實踐了。只有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現在是直接受共產黨中央統轄，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這是因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發表了一個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反革命命令，宣佈該軍爲『叛軍』而『解散』之，並使該軍天天挨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但是該軍不但始終在華中抗日，而且始終實踐四條諾言中第一至第三條諾言，並且願意復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要求蔣先生取消解散命令，恢復該軍番號，使該軍獲得實踐第四條諾言之可能性。

國民黨十一中全會關於共產黨問題的文件除上述各點外，又稱：『至於其他問題，本會議已決議於戰爭結束後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制頒憲法，盡可於國民大會中提出討論解決。』所謂『其他問題』，就是取消國民黨的獨裁政治，取消法西斯特務機關，實行全國範圍內的民主政治，取消妨礙民生的經濟統制和苛捐雜稅，實行全國範圍內的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和扶助中小工業、改善工人生活的經濟政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我黨共赴國難宣言中曾稱：『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制訂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首先須切實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蔣介石先生既於這個宣言發表之第二日（九月二十三日）發表談話，承認這個宣言的全部，就應該不但要求共產黨實踐這個宣言中的四條諾言，也應該要求蔣先生自己及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實踐上述條文。蔣先生現在不但是國民黨的總裁，又當了國民黨政府（這個政府以『國民政府』為表面名稱）的主席，應該把上述民主民生的條文和一切蔣先生自己許給我們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的無數諾言，認真地實踐起來，不要還是把任何諾言都拋到九霄雲外，只是一味高壓。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們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要看事實，不願再聽騙人的空話。如有事實，我們是歡迎的，如無事實，則空話是不能長久騙人的。抗戰到底，制止投降危險，繼續合作，制止內戰危機，承認邊區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治，恢復新四軍，制止反共運動，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四五十萬軍隊，不要再把國民黨參政會當作國民黨製造反共輿論的御用機關，開放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減租減息，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業，取消特務機關，取

消特務教育，實行民主教育，這就是我們對蔣先生和國民黨的要求。其中大多數，正是你們自己的諾言。你們如能實行這些要求和諾言，則我們向你們保證繼續實踐我們自己的諾言。在蔣先生和國民黨願意的條件之下，我們願意隨時恢復兩黨的談判。

總之，在國民黨可能採取的三個方向中，第一個，投降和內戰的方向，對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是死路。第二個，以空言騙人，把時間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獨裁和積極準備內戰的方向，對蔣先生和國民黨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個方向，根本放棄法西斯獨裁和內戰的錯誤道路，實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確道路，才是蔣先生和國民黨的生路。但是走這個方向，在蔣先生和國民黨今天尚無任何的事實表示，還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國人民仍然要警戒極端嚴重的投降危險和內戰危險。

一切愛國的國民黨人應該團結起來，不許國民黨當局走第一個方向，不讓它繼續走第二個方向，要求它走第三個方向。

一切愛國的抗日黨派、抗日人民應該團結起來，不許國民黨當局走第一個方向，不讓它繼續走第二個方向，要求它走第三個方向。

前所未有的世界大變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來了，我們希望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人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關節有以善處，我們希望一切愛國黨派和愛國人民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關節有以善處。

〔註 釋〕

〔一〕黃埔系軍人是指國民黨中曾在黃埔軍官學校作過教官和學生的將領和軍官。黃埔系是國民黨軍隊中蔣介石的嫡系。

組織起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今天共產黨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從農民羣衆中、工廠中、部隊中、機關學校中選舉出來的男女勞動英雄，以及在生產中的模範工作者，我代表中央來講幾句話。我想講的意思，拿幾個字來概括，就是『組織起來』。邊區的農民羣衆和部隊、機關、學校、工廠中的羣衆，根據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級幹部會議的決議，今年進行了一年的生產運動。這一年的生產，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和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爲之一新。事實已經完全證明：高級幹部會議的方針是正確的。高級幹部會議方針的主要點，就是把羣衆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爲一支勞動大軍。我們有打仗的軍隊，又有勞動的軍隊。打仗的軍隊，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這支軍隊也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有了這兩支軍隊，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羣衆工作一項本領，那末，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垮。如果邊區去年以前的生產運動的成績還不够大，還不够顯著，還不足以完全證明這一點，那末今年的成績，就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這是大家親眼看見了的。

邊區的軍隊，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個戰士平均種地十八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窑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每個戰士，一年中只需花三個月工夫從事生產，其餘九個月時間都可以從事訓練和作戰。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黨政府發餉，也不要邊區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這一個創造，對於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該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啊！抗日戰爭六年半中，敵人在各抗日根據地內實行燒、殺、搶的『三光』政策，陝甘寧邊區則遭受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財政上經濟上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我們的軍隊如果只會打仗，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現在我們邊區的軍隊已經學會了生產，前方的軍隊，一部分也學會了，其他部分正在開始學習。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作羣衆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一)我們的機關學校，今年也大進了一步，向政府領款只佔經費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產解決的佔了絕大部分；去年還只自給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給了百分之一百；餵豬養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開設了許多作坊生產日用品。部隊機關學校既然自己解決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質問題，用稅收方法從老百姓手中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

取給的部分就減少了，老百姓生產的結果歸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軍民兩方大家都發展生產，大家都做到豐衣足食，大家都歡喜。還有我們的工廠，發展了生產，清查了特務，生產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個邊區，產生了許多農業勞動英雄、工業勞動英雄、機關學校勞動英雄，軍隊中也出了許多勞動英雄，邊區的生產，可以說是走上了軌道。凡此，都是實行把羣衆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

把羣衆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還有什麼與此相反的方針沒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羣衆觀點，不依靠羣衆，不組織羣衆，不注意把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工廠的廣大羣衆組織起來，而只注意組織財政機關、供給機關、貿易機關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經濟工作看作是一個廣大的運動，一個廣大的戰綫，而只看作是一個用以補救財政不足的臨時手段。這就是另外一種方針，這就是錯誤的方針。陝甘寧邊區過去是存在過這種方針的，經過歷年的指正，特別是經過去年的高級幹部會議和今年的羣衆運動，大概現在還作這樣錯誤想法的人是少了。華北華中各個根據地，因為戰爭緊張，也因為領導機關注意不夠，羣衆的生產運動還沒有廣大的開展。但是在中央今年十月一號的指示^{（三）}以後，各個地方也都在準備發動明年的生產運動了。前方的條件，比陝甘寧邊區更困難，不但有嚴重的戰爭，有些地方還有嚴重的災荒。但是爲了支持戰爭，爲了對付敵人的『三光』政策，爲了救濟災荒，就不能不動員全體黨政軍民，一面打擊敵人，一面實行生產。前方的生產，過去幾年已經有了一些經驗，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物質準備，明年可能造成廣大的運動，並且必須造成廣大的運動。前方處於戰爭環境，還不能做到『豐衣足食』，但是『自己動手，克服困難』，則是完全可以做到，

並且必須做到的。

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羣衆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們部隊機關學校的羣衆生產，雖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這種在集中領導下用互相幫助共同勞動的方法來解決各部門各單位各個物質需要的羣衆的生產活動，是帶有合作社性質的。這是一種合作社。

在農民羣衆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三〕}。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這些在目前還是一種初級形式的合作社，還要經過若干發展階段，才會在將來發展爲蘇聯式的被稱爲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目前還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組織。這又有幾種樣式。一種是『變工隊』、『扎工隊』這一類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四〕}，從前江西紅色區域叫做勞動互助社，又叫耕田隊^{〔五〕}，現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無論叫什麼名稱，無論每一單位的人數是幾個人的，幾十個人的，幾百個人的，又無論單是由全勞動力組成的，或有半勞動力參加的，又無論實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農忙時竟至集體吃飯住宿，也無論是臨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總之，只要是羣衆自願參加（決不能強迫）的集體互助組織，就是好的。這種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羣衆自己發明出來的。從前我們在江西綜合了羣衆的經驗，這次我們在陝北又綜合了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高級幹部會議的提

倡，今年一年的實行，邊區的勞動互助就大爲條理化和更加發展了。今年邊區有許多變工隊，實行集體耕種、鋤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羣衆看見了這樣大的實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實行這個辦法。我們現在不希望在今年一年就把全邊區的幾十萬個全勞動力和半勞動力都組織到合作社裏去，但是在幾年之內是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婦女羣衆也要全部動員參加一定分量的生產。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參加生產，變成好人。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內，都應該在羣衆自願的基礎上，廣泛組織這種集體互助的生產合作社。

除了這種集體互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外，還有三種形式的合作社，這就是延安南區合作社式的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運鹽）、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運輸合作社（運鹽隊）以及手工業合作社。

我們有了人民羣衆的這四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羣衆的力量組織成爲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羣衆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羣衆的勞動。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也必須學會；只要有決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學好的。他們可以幫助羣衆組織生產，幫助羣衆總結經驗。我們的同志學會了組織羣衆的勞動，學會了幫助農民做按家生產計劃，組織變工隊，組織運鹽隊，組織綜合性合作社，組織軍隊的生產，組織機關學校的生產，組織工廠的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組織生產展覽會，發動羣衆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加上旁的各項本領，我們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

國主義打出去，一定可以協同全國人民，把一個新國家建立起來。

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够同羣衆相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裏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於中國人民究竟有什麼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羣衆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羣衆鬥爭的大世面。『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羣衆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裏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羣衆中間去，向羣衆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爲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羣衆（宣傳），並號召羣衆實行起來，解決羣衆的問題，使羣衆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羣衆，不了解羣衆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羣衆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羣衆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後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末，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國民黨就是只問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麼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末，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的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乾淨。我覺得，在無論那一個抗日根據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都有一部分缺乏羣衆觀點因而脫離羣衆的工作同志。我們必須堅決地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羣衆親密地結合起來。

此外，在我們的軍隊工作中，還存在有一種軍閥主義作風，這也是一種國民黨的作風，因為國民黨軍隊是脫離羣衆的。我們的軍隊必須在軍民關係上、軍政關係上、軍黨關係上、官兵關係上、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關係上、幹部相互關係上，遵守正確的原則，決不可犯軍閥主義的毛病。官長必須愛護士兵，不能漠不關心，不能採取肉刑；軍隊必須愛護人民，不能損害人民利益；軍隊必須尊重政府，尊重黨，不能鬧獨立性。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歷來是好的，現在也是好的，是全國軍隊中一支最好的軍隊。但是近年來確實生長了一種軍閥主義的毛病，一部分軍隊工作同志養成了一種驕氣，對士兵，對人民，對政府，對黨，橫蠻不講理，只責備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責備自己，只看見成績，不看見缺點，只愛聽恭維話，不愛聽批評話。例如陝甘寧邊區，就有這種現象。經過去年的高級幹部會議和軍政幹部會，又經過今年春節的擁政愛民運動和擁軍運動，這個傾向是根本地克服下去了，還有一些殘餘，還必須繼續去克服。華北華中各根據地內，這種毛病都是有的，那裏的黨和軍隊必須注意克服這種毛病。

無論在地方工作中，在軍隊工作中，無論是官僚主義傾向或軍閥主義傾向，其毛病的性質都是一樣，就是脫離羣衆。我們的同志，絕大多數都是好同志。對於有了毛病的人，一經展開批評，揭發錯誤，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須開展自我批評，正視錯誤傾向，認真實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評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不批評軍閥主義傾向，那就是願意保存國民黨作風，願意保存官僚主義灰塵和軍閥主義灰塵在自己清潔的臉上，那就不是一個好黨員。如果我們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

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去掉軍閥主義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會順利地開展，生產運動當然也是這樣。

我們邊區的生產，無論在農民羣衆方面、機關學校方面、軍隊方面、工廠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績，在軍民關係上也有了很大進步，邊區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同志的羣衆觀點已經加強，同羣衆的結合大進一步的表現。但是我們不應該自滿，我們還要繼續作自我批評，還要繼續求進步。我們的生產也要繼續求進步。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儘管我們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傾向，已經根本上克服了，但是這些惡劣傾向又可以生長起來的。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勢力的層層包圍之中，我們是處在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極端惡濁的官僚主義灰塵和軍閥主義灰塵天天都向我們的臉上大批地撲來。因此，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評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爲了清潔，爲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

各位勞動英雄和模範生產工作者，你們是人民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我希望你們也不要自滿。我希望你們回到關中去，回到隴東去，回到三邊去，回到綏德去，回到延屬各縣去，回到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去，領導人民，領導羣衆，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願的原則把羣衆組織到合作社裏來，組織得更多，更好。希望你們回去實行這一條，宣傳這一條，使明年再開勞動英雄大會的時候，我們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績。

〔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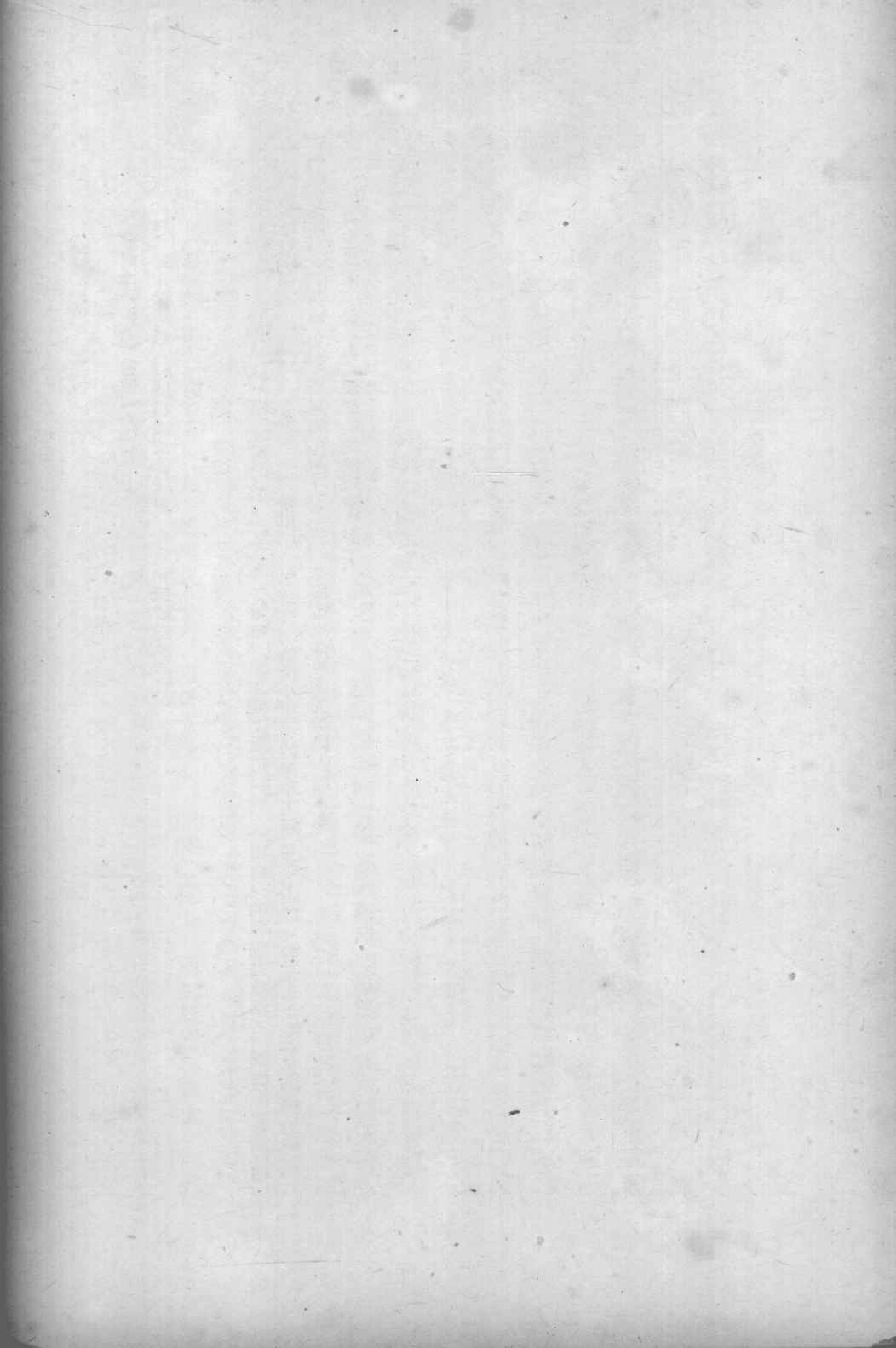
〔一〕引自『孟子』卷三『公孫丑上』。

〔二〕即本書所載『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一文。

〔三〕見列寧『論合作制』。

〔四〕『變工隊』、『扎工隊』，都是陝甘寧邊區農業生產中集體互助的勞動組織。『變工』即換工，是農民相互間調劑勞動力的方法，有人工換人工，牛工換牛工，人工換牛工等等。參加變工隊的農民，各以自己的勞動力或畜力，輪流地並集體地替本隊各家耕種，結算時，一工抵一工，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補給工錢。『扎工隊』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農民組成，參加扎工隊的農民，除相互變工互助外，主要的是集體出僱於需要勞動力的人家。

〔五〕見本書第一卷『我們的經濟政策』註二。



學習和時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一

去年冬季開始，我黨高級幹部學習了黨史中的兩條路綫問題。這次學習使廣大高級幹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這次學習中，同志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中央政治局曾對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作了結論。這些結論是：

(一)關於研究歷史經驗應取何種態度問題。中央認為應使幹部對於黨內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時對於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在作結論時應取寬大的方針，以便一方面，澈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又一方面，能够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綫和李立三錯誤路綫的大鬥爭，這些鬥爭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澈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着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

引爲鑑戒。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着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着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

(二)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對於四中全會(二)至遵義會議(三)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中央領導機關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

*

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間，對於黨的歷史特別是黨在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時期的歷史所進行的討論，大大地幫助了黨內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在貴州省遵義城所召集的擴大的政治局會議雖然糾正了從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傾錯誤路線，改變了黨中央的領導機關的成份，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但是在黨的很多幹部中間，對於過去的錯誤路線的性質却沒有作過徹底的清算。爲着進一步地提高黨的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黨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這個時間內，曾經幾次進行了關於黨的歷史的討論，隨後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這個時期內，領導全黨高級幹部進行同樣的討論。這個討論爲一九四五年召集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重要的準備，使那次大會達到了中國共產黨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學習和時局』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對於這個討論所作的講演。關於黨中央對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所作的詳細結論，參看本篇附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進行分析。例如在土地問題上，當時的錯誤是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但在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這一點上，則是和我們一致的。列寧說，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三〕}。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於複雜事物，不願作反覆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黨內分析習慣的還沒有完全養成，都表示這個毛病的存在。今後應該改善這種狀況。

（二）關於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的討論。應該指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綫是基本上正確的，因為它確定了現時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確定了當時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發佈了十大綱領^{〔四〕}等，這些都是正確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亦有缺點，例如沒有指出中國革命的極大的長期性和農村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極大的重要性，以及還有其他若干缺點或錯誤。但無論如何，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我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四）關於一九三一年上海臨時中央及在其後由此臨時中央召開的五中全會^{〔五〕}是否合法的問題。中央認為是合法的，但應指出其選舉手續不完備，並以此作為歷史教訓。

（五）關於黨內歷史上的宗派問題。應該指出，我黨歷史上存在過並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經過遵義會議以來的幾次變化，現在已經不存在了。這次黨內兩條路綫的學習，指出這種宗派曾經在歷史上存在過並起了不良作用，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為經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九

三八年十月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①，一九四二年的全黨整風和一九四三年冬季開始的對於黨內歷史上兩條路綫鬥爭的學習，這樣許多次黨內鬥爭的變化之後，還有具備原來的錯誤的政治綱領和組織形態的那種宗派存在，則是不對的。過去的宗派現在已經沒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思想形態的殘餘，我們繼續深入地進行整風學習，就可以將它們克服過來。目前在我們黨內嚴重地存在和幾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帶着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②。例如由於鬥爭歷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這一根據地和那一根據地的不同，敵佔區、國民黨統治區和革命根據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門不同（這一部分軍隊和那一部分軍隊的不同，這一種工作和那一種工作的不同）而產生的各部分同志間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團結的現象，看來好似平常，實則嚴重地妨礙着黨的統一和妨礙着黨的戰鬥力的增強。山頭主義的社會歷史根源，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特別廣大和長期被敵人分割的農村根據地，而黨內教育不足則是其主觀原因。指出這些原因，說服同志們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打通同志間的思想，提倡同志間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實現全黨大團結，是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

以上所說的問題，如能在全黨獲得明確的理解，則不但可以保證這次黨內學習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將保證中國革命一定得到勝利。

目前時局有兩個特點，一是反法西斯陣綫的增強和法西斯陣綫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陣綫內部人民勢力的增強和反人民勢力的衰落。前一個特點是很明顯的，容易被人們看見。希特勒不久就會被打敗，日寇也已處在衰敗過程中。後一個特點，比較地還不明顯，還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見，但是它已在歐洲、在英美、在中國一天一天顯露出來。

中國人民勢力的增強，要以我黨爲中心來說明。

我黨在抗日時期的發展，可分爲三個階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爲第一個階段。在此階段的頭兩年內，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軍閥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產黨，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國民黨戰綫進攻，對它採取以軍事打擊爲主，以政治誘降爲輔的政策，而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則不重視，以爲不過是少數共產黨人在那裏打些游擊仗罷了。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武漢以後，他們即已開始改變這個政策，改爲重視共產黨，輕視國民黨，改爲以政治誘降爲主，以軍事打擊爲輔的政策去對付國民黨，而逐漸轉移其主力來對付共產黨。因爲這時日本帝國主義者感覺國民黨已不可怕，共產黨則是可怕的了。國民黨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同我黨的關係也比較好，對於人民抗日運動雖有許多限制，但也允許有較多的自由。自從武漢

失守以後，由於戰爭失敗和仇視共產黨這種情緒的發展，國民黨就逐漸反動，反共活動逐漸積極，對日抗戰逐漸消極。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因為在內戰時期受了挫折的結果，僅有四萬左右有組織的黨員和三萬多人的軍隊，因此爲日本軍閥所輕視。但到一九四〇年，黨員已發展到八十萬，軍隊已發展到近五十萬，根據地人口包括一面負擔糧稅和兩面負擔糧稅的，約達一萬萬。幾年內，我黨開闢了一個廣大的解放區戰場，以至於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國民黨戰場作戰略進攻至五年半之久，將日軍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圍，挽救了國民黨戰場的危機，支持了長期的抗戰。但在此階段內，我黨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種錯誤，這種錯誤就是輕視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不注意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主張以大兵團的運動戰爲主，而輕視游擊戰爭），依賴國民黨，缺乏清醒的頭腦和缺乏獨立的政策（因此產生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對於放手發動羣衆建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大量擴大我黨領導的軍隊等項政策，發生了動搖）。同時，我黨吸收了廣大數目的新黨員，他們還沒有經驗；一切敵後根據地也都是新創的，還沒有鞏固起來。這一階段內，由於時局開展和黨與軍隊的發展，黨內又生長了一種驕氣，許多人以爲自己了不得了。在這一階段內，我們曾經克服了黨內的右傾偏向，執行了獨立政策，不但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創立了根據地，發展了八路軍新四軍，而且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爲第二階段。日本帝國主義者爲準備和執行反英美的戰爭，將他們在武漢失守以後已經改變了的方針，即由對國民黨爲主的方針改爲對共產黨爲主的方針，更加強調起來，更加集中其主力於共產黨領導的一切根據地的周圍，進行連續的『掃蕩』戰爭，殘酷的『三光』政

策，着重地打擊我黨，致使我黨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這兩年內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這一階段內，我黨根據地縮小了，人口降到五十萬以下，八路軍也縮小到三十多萬，幹部損失很多，財政經濟極端困難。同時，國民黨又認為他們已經閒出手來，千方百計地反對我黨，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國主義配合着進攻我們。但是這種困難地位教育了共產黨人，使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學會了如何反對敵人的『掃蕩』戰爭、『蠶食』政策⁽²⁾、『治安強化』運動⁽³⁾、『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們學會了或開始學會了統一戰綫政權的『三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等項工作，克服了許多缺點，並且把第一階段內許多人自以爲了不得的那股驕氣也克服下去了。這一階段內，我們雖然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是我們站住腳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進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爲國民黨的反共和我們不得不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自衛鬥爭的這些情況，黨內又生長了一種過左的偏向，例如以爲國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過分地打擊地主，不注意團結黨外人士等。但是這些過左偏向，也被我們克服過來了。我們指出了在反磨擦鬥爭中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指出了在統一戰綫中又團結又鬥爭和以鬥爭求團結的必要，保持了國內和根據地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

一九四三年到現在爲第三階段。我們的各項政策更爲見效，特別是整頓三風和發展生產這樣兩項工作，發生了根本性質的效果，使我黨在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兩方面，立於不敗之地。此外，我們又在去年學會了或開始學會了審查幹部和反對特務的政策。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根據地的面積又擴

大了，根據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負担和兩面負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餘萬，軍隊又有了四十七萬，民兵二百二十七萬，黨員發展到了九十多萬。

一九四三年，日本軍閥對中國的政策沒有什麼變化，還是以打擊共產黨為主。從一九四一年至今這三年多以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華日軍是壓在我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身上。三年多以來，國民黨留在敵後的數十萬軍隊經不起日本帝國主義的打擊，約有一半投降了敵人，約有一半被敵人消滅，殘存的和撤走的爲數極少。這些投降敵人的國民黨軍隊反過來進攻我黨，我黨又要担负抗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僞軍。國民黨只担负抗擊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軍和不到百分之十的僞軍。從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時間，日本軍閥沒有舉行過對國民黨戰場的戰略進攻，只有幾次較大的戰役行動（浙贛、長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歸，而集中其注意力於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在此情況下，國民黨採取上山政策和觀戰政策，敵人來了招架一下，敵人退了袖手旁觀。一九四三年國民黨的國內政策更加反動，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又被我們打退了。

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戰綫逐漸失利，美國的反攻增強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蘇聯紅軍嚴重打擊之下有搖搖欲倒之勢。爲救死計，日本帝國主義想到要打通平漢、粵漢兩條鐵路，又以其對重慶國民黨的誘降政策還沒有得到結果，有給它以再一次打擊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舉進攻國民黨戰綫的計劃。河南戰役（二）已打了一個多月。敵人不過幾個師團，國民黨幾十萬軍隊不戰而潰，只有雜牌軍還能打一下。湯恩伯部官脫離兵，軍脫離民，混亂不堪，損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

派到河南的幾個師，也是一觸即潰。這種情況，完全是幾年來國民黨厲行反動政策的結果。自武漢失守以來的五年半中，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担负了抗擊日僞主力的重担，這在今後雖然可能發生某些變化，但這種變化也只能是暫時的，因為國民黨在五年半以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下所養成的極端腐化狀態，今後必將遭到嚴重的挫敗，到了那時，我黨抗擊敵僞的任務又將加重了。國民黨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觀，得到了喪失戰鬥力的結果。共產黨以五年半的苦戰奮鬥，得到了增強戰鬥力的結果。這一種情況，將決定今後中國的命運。

同志們可以看見，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現在止，這七年時間內，在我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經歷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種情況。我黨抗擊了日寇的殘酷進攻，建立了廣大的革命根據地，大大地發展了黨和軍隊，打退了國民黨的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黨內發生的右的和『左』的錯誤思想，全黨學得了許多可寶貴的經驗。這些就是我們七年工作的總結。

現在的任務是要準備担负比較過去更為重大的責任。我們要準備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為使我黨能够担负這種責任，就要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起來，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據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關於根據地工作，第一階段內有大的發展，但是不鞏固，因此在第二階段內一受到敵人的嚴重打擊，就縮小了。在第二階段內，一切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都受到了嚴格的鍛鍊，比起第一階段來好得多了；幹部和黨員的思想和政策的水平，大進一步，沒有學會的東西，學會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

打通和政策的學習還需要時間，我們還有許多沒有學會的東西。我黨力量還不够強大，黨內還不够統一，還不够鞏固，因此還不能擔負比較目前更爲巨大的責任。今後的問題就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這就是爲着將來擔負巨大工作的第一個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沒有這種準備，我們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國。

關於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們一向是做得很差的。如果現在我們還不爭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千百萬勞動羣衆和市民羣衆圍繞在我黨的周圍，並準備羣衆的武裝起義，我們的軍隊和農村根據地就會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種種困難。我們十多年來是處在農村中，提倡熟悉農村和建設農村根據地，這是必要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的準備城市起義的任務，沒有也不可能在這十多年中間去實行。但是現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要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實行了。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不久就可能開會，這次代表大會將要討論加強城市工作和爭取全國勝利的問題。

這幾天陝甘寧邊區召開工業會議，是有重大意義的。一九三七年邊區還只有七百個工廠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七千人，現在有了一萬二千人。切不可輕視這樣的數目字。我們要在根據地內學習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業和交通機關，否則到了那時將無所措手足。準備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裝起義，並且學習管理工商業，這是第二個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沒有這種準備，我們也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國。

要沒有自覺性，
對人對己之錯誤，
不能自覺。

爲了爭取新的勝利，要在黨的幹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開動機器。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說，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擔應該加以解除。有許多的東西，只要我們對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可能成爲我們的包袱，成爲我們的負擔。例如：犯過錯誤，可以使人覺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錯誤的，從此萎靡不振；未犯錯誤，也可以使人覺得自己是未犯過錯誤的，從此驕傲起來。工作無成績，可以使人悲觀喪氣；工作有成績，又可以使人趾高氣揚。鬥爭歷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負責任；鬥爭歷史長的，可以因其長而自以爲是。工農分子，可以自己的光榮出身傲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識傲視工農分子。各種業務專長，都可以成爲高傲自大輕視旁人的資本。甚至年齡也可以成爲驕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爲自己聰明能幹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爲自己富有經驗而看不起青年人。對於諸如此類的東西，如果沒有自覺性，那它們就會成爲負擔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脫離羣衆，屢犯錯誤，措上了這類包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所以，檢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來，使自己的精神獲得解放，實在是聯繫羣衆和少犯錯誤的必要前提之一。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爲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綫的錯誤，使這次革命歸

於失敗。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戰^(一)的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爲了不得。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綫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接着全國人民在日本進攻面前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爲了不得。結果犯了更嚴重的路綫錯誤，使辛苦地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戰起來了，統一戰綫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爲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陳獨秀路綫有某些相似的錯誤。這一次，又使得受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響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全黨同志對於這幾大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爲鑑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二)，也是叫同志們引爲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所謂開動機器，就是說，要善於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雖然沒有包袱，有聯繫羣衆的長處，但是不善於思索，不願用腦筋多想苦想，結果仍然做不成事業。再有一些人則因爲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腦筋，他們的聰明被包袱壓縮了。列寧斯大林經常勸人要善於思索，我們也要這樣勸人。腦筋這個機器的作用，是專門思想的。孟子說：「心之官則思。」^(三)他對腦筋的作用下了正確的定義。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俗話說：「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是說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這種習慣，在我們黨內是太不夠了。如果我們既放下了包袱，又開動了機器，既是輕裝，又會思索，那我們就會勝利。

〔註釋〕

〔一〕四中全會是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見本篇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三部分。

〔二〕見本篇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三部分。

〔三〕見列寧「共產主義」一文。參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註一〇。

〔四〕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二九。

〔五〕五中全會是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參看本篇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三部分。

〔六〕這個會議曾經檢討了黨在歷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

〔七〕山頭主義的傾向是一種小團體主義的傾向，主要是在長期的游擊戰爭中，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分散和彼此間不相接觸的情況下產生的。這些根據地開始多半是建立在山岳地區，一個集團好像一個山頭，所以這種錯誤傾向被稱為山頭主義。

〔八〕這裏所說的一面負擔糧稅的地區，是指根據地的比較鞏固的地區，那裏的人民只向抗日民主政府負擔糧稅，兩面負擔糧稅的地區，是指根據地的邊緣地區和游擊區，在那些地區因為敵人可以經常來騷擾，人民除向抗日民主政府負擔糧稅外，還經常被迫向敵偽政權繳納一些糧稅。

〔九〕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抗日根據地大規模進攻失敗以後所實施的一種方法，即由迅速「鯨吞」的方法，改為長期的逐漸的「蠶食」方法。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用穩紮穩打、逐步分割的步驟，縮小抗日根據地，擴大它的佔領區。

〔一〇〕一九四一年三月間，華北的日寇和漢奸提出所謂「治安強化運動」的口號。所謂「治安強化」，就是實行搜查，舉辦保甲制度，調查戶口，組織偽軍，以鎮壓抗日力量。

〔一一〕一九四四年三月，日寇發動河南戰役，使用兵力五、六萬人。國民黨軍蔣鼎文、湯恩伯、胡宗南部四十萬人，在日寇面前望風崩潰，鄭州、洛陽等三十八縣相繼陷落，湯恩伯部損失兵員二十萬人。

〔一二〕蔣馮閻大戰，指發生在隴海、津浦兩路沿綫的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的大規模軍閥戰爭。戰爭於一九三〇年五月

開始，至十月結束，歷時半年，雙方死傷三十萬人。

〔三〕一九四四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紀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勝利的三百週年。文中說明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以後，因為若干首領們生活腐化，發生宗派鬥爭，以致在一六四五年陷於失敗。這篇文章先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後來在延安和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

〔四〕引自「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

（一）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我們黨一成立，就展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在爲實現新民主主義而進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奮鬥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的三個歷史時期中，我們黨始終一貫地領導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向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和豐富的經驗。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於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爲主要羣衆、以反帝反封建爲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衆、情況極複雜、鬥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光輝地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

題的學說。由於堅持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並向一切與之相反的錯誤思想作了勝利的鬥爭，黨才在三個時期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達到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的鞏固和統一，發展爲今天這樣強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餘萬黨員，領導了擁有近一萬萬人民、近一百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爲全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解放事業的偉大的重心。

(11)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确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全體同志，在這次大革命中，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發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進並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形成了東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幹，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但是，由於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於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強大，特別是由於在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爲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爲投降主義路綫，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於當國民黨

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

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的十年間，中國共產黨，並且只有中國共產黨，在反革命的極端恐怖的統治下，全黨團結一致地繼續高舉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羣衆，作了政治上、軍事上和思想上的偉大戰門。在這個戰鬥中，中國共產黨創造了紅軍，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分配了土地給貧苦的農民，抗擊了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進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事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全黨對於企圖分裂黨和實行叛黨的托洛茨基、陳獨秀派〔一〕和羅章龍〔二〕、張國燾〔三〕等的反革命行爲，也同樣團結一致地進行了鬥爭，使黨保證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總原則下的統一。在這十年內，黨的這個總方針和爲實行這個總方針的英勇奮鬥，完全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無數黨員、無數人民和很多黨外革命家，當時在各個戰綫上轟轟烈烈地進行革命鬥爭，他們的奮鬥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後繼的精神和功績，在民族的歷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沒有這一切，則抗日戰爭即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亦將因爲沒有一個積蓄了人民戰爭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作爲骨幹，而不能堅持和取得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

尤其值得我們慶幸的是，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應用於中國條件的工作，在這十年內有了很大的發展。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

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這十年內，我黨不僅有了偉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時期中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以從黨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六屆四中全會）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這個時期內所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爲嚴重。這個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的損失。

爲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爲『後車之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爲着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爲：對於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在黨內曾經發生了『左』右傾的偏向。

以陳獨秀爲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

一九三五年一月
中央政治局會議
決議

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採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認為一九二七年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於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佔優勢並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他們武斷地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反對黨所進行的各種革命鬥爭，並污蔑當時的紅軍運動為所謂『流寇運動』。他們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意見，放棄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不得不被驅逐出黨，接着並墮落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黨內，使黨內的『左』傾情緒也很快地發展起來了。這種『左』傾情緒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已經開端。『八七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羣衆繼續革命的戰鬥，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却為『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藉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

（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鬥爭，過分地或不適當地強調了領導幹部的單純的工人成份的意義，並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後繼續生長，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爲『左』傾的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並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的盲動主義者認爲：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否認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顧敵人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後的羣衆情況，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羣衆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和這種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同時，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打擊政策也發展了起來。但是由於這個錯誤路線一開始就引起了毛澤東同志和在白色區域工作的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非難，並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這個『左』傾路線的執行在許多地方已經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傾路線的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在全國範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間召開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綫，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正確地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指出了引起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因此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發佈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它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指出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黨在當

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羣衆。它進行了兩條戰綫的鬥爭，批判了右的陳獨秀主義和『左』的盲動主義，特別指出了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羣衆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會也有其缺點和錯誤。它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對於大革命失敗後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對於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這些缺點和錯誤，雖然使得『八七會議』以來的『左』傾思想未能根本肅清，並被後來的『左』傾思想所片面發展和極端擴大，但仍然不足以掩蓋第六次大會的主要方面的正確性。黨在這次大會以後一個時期內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時期內，不但在實踐上發展了第六次大會路綫的正確方面，並正確地解決了許多爲這次大會所不曾解決或不會正確地解決的問題，而且在理論上更具體地和更完滿地給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根據。在他的指導和影響之下，紅軍運動已經逐漸發展成爲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黨在白色區域的組織和工作，也有了相當的恢復。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間，還在黨內存在着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又有了某些發展。在這個基礎上，遇着時局的對革命有利的變動，便發展成爲第二次的『左』傾路綫。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蔣馮閻戰爭爆發後的國內形勢的刺激下，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領導，在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

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產生這次錯誤路線（李立三路綫）的原因，是由於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組織力量的充分準備，認為『羣衆只要大幹，不要小幹』，因而認為當時不斷的軍閥戰爭，加上紅軍運動的初步發展和白區工作的初步恢復，就已經是具備了可以在全國『大幹』（武裝起義）的條件；由於他們不承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革命危機在全國各地都有同樣的生長，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並污蔑毛澤東同志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以農村來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由於他們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中才能成功；由於他們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並因此規定了若干不適時宜的『左』傾政策。在這些錯誤認識下，立三路綫的領導者定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後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於停頓。在這些錯誤決定的形成和執行過程中，立三同志拒絕了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建議，並在黨內強調地反對所謂『右傾』，在反『右傾』的口號下錯誤地打擊了黨內不同意他的主張的幹部，因而又發展了黨內的宗派主義。這樣，立三路綫的形態，就比第一次『左』傾路線更為完備。

但是立三路綫在黨內的統治時間也很短（不到四個月時間）。因為凡實行立三路綫的地方都使黨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損失，廣大的幹部和黨員都要求糾正這一路綫。特別是毛澤東同志，他不但始終沒有贊成立三路綫，而且以極大的忍耐心糾正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左』傾錯誤⁽²⁾，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這個時期內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利用了當時蔣馮閻戰爭的有利形勢而得到了發展，並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除個別地區外，也得到了大體相同的結果。在白區，也有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經過黨的組織起來反對立三路綫。

一九三〇年九月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六屆三中全会）及其後的中央，對於立三路綫的停止執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雖然六屆三中全会的文件還表現了對立三路綫調和妥協的精神（如否認它是路綫錯誤，說它只是『策略上的錯誤』等），雖然六屆三中全会在組織上還繼續着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六屆三中全会既然糾正了立三路綫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因而它就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綫主要特徵的那些錯誤。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屆三全會上也承認了被指出的錯誤，接着就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地位。六屆三全會後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補充決議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號通告中，進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綫錯誤和六屆三全會的調和錯誤。當然，無論六屆三全會或其後的中央，對於立三路綫的思想實質，

都沒有加以清算和糾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一直存在於黨內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六屆三中全會上和六屆三中全會後還是濃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既然對於停止立三路綫作了上述有積極作用的措施，當時全黨同志就應該在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以求反『左』傾錯誤的貫徹。

但在這時，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在陳紹禹（王明）同志的領導之下，却又在『反對立三路綫』、『反對調和路綫』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綫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了。他們的鬥爭，並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澈底清算立三路綫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着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當時發表的陳紹禹同志的『兩條路綫』即『爲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綫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爲新的『左』傾路綫。

陳紹禹同志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綫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綫的『左』傾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綫的『右』，是它指責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綫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新的『左』傾路綫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的問

題上，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誇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鬥爭、反富農鬥爭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份』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認為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並從『左』的觀點污蔑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員中號召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這一路線的『鬥爭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內的嚴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路線並沒有主張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在一個時期內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但是整個地說來，它却比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也更完備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黨在這些以陳紹禹同志為首的『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從各方面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對於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六屆四中全會直接實現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兩項互相聯繫的錯誤綱領：反

對所謂『目前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儘管六屆四中全會在形式上還是打着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的旗幟，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實質上却是『反右傾』。六屆四中全會雖然在它自己的決議上沒有作出關於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黨的具體政治任務的規定，而只是籠統地反對所謂『右傾』和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它是批准了那個代表着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即在當時及其以後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陳紹禹同志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即『爲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而這個小冊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反右傾』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總綱領。在這個綱領下面，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同志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志爲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並在六屆四中全會後接着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其實，當時的所謂『右派』，主要地是六屆四中全會宗派主義的『反右傾』鬥爭的產物。這些人中間也有後來成爲真正右派並墮落爲反革命而被永遠驅逐出黨的以羅章龍爲首的極少數的分裂主義者，對於他們，無疑地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他們之成立並堅持第二黨的組織，是黨的紀律所絕不容許的。至於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爲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羣衆有很好的聯繫，並且接着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同志，

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六屆四中全會這種對於中央機關的『改造』，同樣被推廣於各個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地方組織。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比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幹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鬥爭。

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接着，中國連續發生了許多重大事變。江西中央區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和全體同志的積極努力之下，在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還沒有來得及貫徹其錯誤路線的情況之下，取得了粉碎敵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圍剿』的巨大勝利；其他多數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在同一時期和同一情況下，也得到了很多的勝利和發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開始的進攻，又激起了全國民族民主運動的新的高漲。新的中央對於這些事變所造成的新形勢，一開始就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它過分地誇大了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忽視了『九一八』以後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強調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是要一致地進攻蘇聯的，各帝國主義和中國各反革命派別甚至中間派別是要一致地進攻中國革命的，並斷定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的最危

險的敵人。因此它繼續主張打倒一切，認為當時『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它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地實行武裝工農、各企業總罷工等許多冒險的主張。這些錯誤，最先表現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決議』，並在後來臨時中央的或在臨時中央領導下作出的『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區中央局關於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週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繼續和發揮。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以秦邦憲（博古）同志為首的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繼續發展的時期。其間，臨時中央因為白區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重損失，在一九三三年初遷入江西南部根據地，更使他們的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據地和鄰近各根據地進一步地貫徹執行。在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據地黨代表大會和一九三二年八月黨中央的寧都會議，雖然已經根據六屆四中全會的『反右傾』和『改造各級領導機關』的錯誤綱領，污蔑過去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根據地的正確路線為

『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改變了正確的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但是因爲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在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仍然得到了勝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極端錯誤的戰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在其他許多政策上，特別是對於福建事變的政策上，『左』傾路線的錯誤也得到了完全的貫徹。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六屆五中全會不顧『左』傾路線所造成的中國革命運動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挫折，盲目地判斷『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着』；判斷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說這一鬥爭將決定中國的『革命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它又重複立三路線的觀點，宣稱『在我們已將工農民主革命推廣到中國重要部分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成爲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才會統一，中國民衆才會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和反對『用兩面派的態度在實際工作中對黨的路線怠工』等口號之下，它繼續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和打擊政策。

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

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左』傾路線在退出江西和長征的軍事行動中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繼續受到損失。黨在其他絕大多數革命根據地（閩浙贛區、鄂豫皖區、湘鄂贛區、湘贛區、湘鄂西區、川陝區）和廣大白區的工作，也同樣由於『左』傾路線的統治而陷於失敗。統治過鄂豫皖區和川陝區的張國燾路線，則除了一般的『左』傾路線之外，還表現為特別嚴重的軍閥主義和在敵人進攻面前的逃跑主義。

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分子陳紹禹秦邦憲二同志為首的、錯誤的『左』傾路線的主要內容。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們披着『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着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路線錯誤的同志，在很長時期內，却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塞維克』等武斷詞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

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他們不贊成並要求糾正這條『左』傾路線，因而他們在各地的正確領導，也就被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組織或人員所推翻了。但是『左』傾路線在實

際工作中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幹部和黨員羣衆面前暴露了這一路綫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區紅軍長征開始後，這種懷疑和不满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這時也開始覺悟，站在反對「左」傾錯誤的立場上來了。於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綫的幹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綫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够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並鍛鍊了黨和紅軍的基幹，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却逃跑並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綫，挽救了「左」傾路綫所造成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¹⁰⁾，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推動了神聖的抗日戰爭的爆發。

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綫，是完全正確的。「左」傾路綫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被逐漸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來，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全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和黨史學習，更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黨的歷史上歷次「左」傾

以及右傾的錯誤。過去犯過『左』右傾錯誤的同志，在長期體驗中，絕大多數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做過了許多有益於黨和人民的工作。這些同志和其他廣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認識上互相團結起來了。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欣幸地指出：我黨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於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這是快要勝利了的黨，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戰勝了的黨。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為：關於抗日時期黨內的若干歷史問題，因為抗日階段尚未結束，留待將來做結論是適當的。

(四)

爲了使同志們進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以利於『懲前毖後』，不在今後工作上重犯這類錯誤起見，特分別指出它們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同正確路線相違抗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 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二)和毛澤東同志所詳細分析過的，現階段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九一八』以後部分地變爲殖民地)，這個國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是國際無產階級已在蘇聯勝利，中國無產階級已有政治覺悟時代的民族民主革命。這就規定了

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人農民為主體而有其他廣大社會階層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區別於舊民主主義又區別於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由於現階段的中國是在強大而又內部互相矛盾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和中國封建勢力統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統一性，這就規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之極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不能不經歷長期的曲折的鬥爭；同時又使這一鬥爭能廣泛地利用敵人的矛盾，在敵人的統治比較薄弱的廣大地區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裝的革命根據地。爲中國革命實踐所證明的中國革命的上述基本特點和基本規律，既爲一切右傾路線所不了解和違抗，也爲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所不了解和違抗。『左』傾路線因在此政治上犯了三個主要方面的錯誤：

第一，各次『左』傾路線首先在革命任務和階級關係的問題上犯了錯誤。和斯大林同志一樣，毛澤東同志還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不但指出中國現階段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別指出農民的土地鬥爭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內容，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因此對於農民鬥爭的領導是中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務^{〔一〕}。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他又指出中國所需要的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才談得上社會主義的前途^{〔二〕}；指出土地革命因爲革命在城市的失敗有了更大的意義，『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鬥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的發展超過工人

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四)，指出大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之後，自由資產階級仍然和買辦資產階級有區別，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國主義的階層還是很廣泛的，因此必須正確地對待和盡可能地聯合或中立各種不同的中間階級，而在鄉村中則必須正確地對待中農和富農（『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同時堅決地團結中農，保護富裕中農，給富農以經濟的出路，也給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五)。凡此都是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而『左』傾路線是不了解和反對這些思想的。雖然各次『左』傾路線所規定的革命任務，許多也還是民主主義的，但是它們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定界限，並主觀地急於要超過民主革命，都低估農民反封建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決定作用；都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上層小資產階級。第三次『左』傾路線更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強調反對富農。特別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階級關係有了一個明顯的巨大的變化，但是當時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則不但不認識這個變化，反而把同國民黨反動統治有矛盾而在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爲所謂『最危險的敵人』。應當指出，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也領導了農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反抗當時國民黨政府的進攻，這些任務都是正確的；但是由於上述的『左』傾認識，他們就錯誤地害怕承認當時的紅軍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運動，錯誤地反對所謂『農民特殊革命性』、『農民的資本主義』和所謂『富農路線』，而實行了許多超民主主義的所謂『階級路線』的政策，例如消滅富農經濟及其他過左的經濟政策、勞動政策，一切剝削者均無參政權的政權政

策，強調以共產主義爲內容的國民教育政策，對知識分子的過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運工作和過左的肅反政策等，而使當前的革命任務被歪曲，使革命勢力被孤立，使紅軍運動受挫折。同樣，應當指出，我黨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的國民黨統治區中，一貫堅持地領導了人民的民族民主運動，領導了工人及其他羣衆的經濟鬥爭和革命的文化運動，反對了當時國民黨政府出賣民族利益和壓迫人民的政策；特別是『九一八』以後，我黨領導了東北抗日聯軍，援助了『一二八』戰爭和察北抗日同盟軍，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個條件下紅軍願同國民黨軍隊聯合抗日^(二)，在六個條件下願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三)，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了『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這些也都是正確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由於指導政策的錯誤，不能在實際上正確地解決問題，以致當時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也都沒有得到應有的結果，或歸於失敗。當然，在抗日問題上，在當時還不能預料到代表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主要部分的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在一九三五年的華北事變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以後所起的變化，但是中間階層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地方集團已經發生了成爲抗日同盟者的變化，這個變化是廣大黨員和人民都已經認識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傾路線所忽視或否認，形成了自己的嚴重的關門主義，使自己遠落於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後。這個關門主義錯誤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後的狀況，在遵義會議以前，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

第二，各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上，也犯了錯誤。斯大林同志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二六)和斯大林同志一樣，毛澤東同志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即已正確指出，由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缺乏民主和工業的不統一的大國，武裝鬥爭和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毛澤東同志又指出：廣大農民所在的廣大鄉村，是中國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陣地（革命的鄉村可以包圍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脫離鄉村）；中國可以而且必須建立武裝的革命根據地，以爲全國勝利（全國的民主統一）的出發點^(二七)。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由於國共合作建立了聯合政府，當時的根據地是以某些大城市爲中心的，但是即在那個時期，也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軍隊，並解決鄉村土地問題，以鞏固根據地的基礎。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於強大的反革命勢力佔據了全國的城市，這時的根據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農民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在反革命統治薄弱的鄉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發展和鞏固起來。毛澤東同志指出這種武裝的鄉村革命根據地在中國存在的歷史條件，是中國的『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是由此而來的『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二八)。他又指出這種根據地對於中國革命的歷史意義，是『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羣衆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

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爲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11)。至於這個時期的城市羣衆工作，則應如正確路綫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劉少奇同志所主張的，採取以防禦爲主（不是以進攻爲主），盡量利用合法的機會去工作（而不是拒絕利用合法），以便使黨的組織深入羣衆，長期蔭蔽，積蓄力量，並隨時輸送自己的力量到鄉村去發展鄉村武裝鬥爭力量，藉此以配合鄉村鬥爭，推進革命形勢，爲其主要方針。因此，直至整個形勢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條件時爲止，中國革命運動應該以鄉村工作爲主，城市工作爲輔，革命在鄉村的勝利和在城市的暫時不能勝利，在鄉村的進攻和在城市的一般處於防禦，以至在這一鄉村的勝利及進攻和在另一鄉村的失敗、退却和防禦，就組織成了在這一時期中全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錯的圖畫，也就鋪成了在這一形勢下革命由失敗到勝利的必經道路。但是各次『左』傾路綫的代表者，因爲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的特點，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不了解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長期性，就從而低估了軍事鬥爭特別是農民游擊戰爭和鄉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就從而反對所謂『槍桿子主義』和所謂『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而總是夢想這時城市的工人鬥爭和其他羣衆鬥爭能突然衝破敵人的高壓而勃興，而發動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而達到所謂『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而形成所謂全國革命高潮和全國勝利，並以這種夢想作爲一切工作佈置的中心。但是實際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階級力量對比的整個形勢下，這種夢想的結果不是別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

失敗。第一次『左』傾路線這樣失敗了，第二次『左』傾路線仍然繼續同樣的錯誤，所不同的，是要求紅軍的配合，因為這時紅軍已經逐漸長大了。第二次失敗了，第三次『左』傾路線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準備武裝起義，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紅軍的佔領，因為這時紅軍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這樣不以當時的城市工作服從鄉村工作，而以當時的鄉村工作服從城市工作的結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敗以後，鄉村工作的絕大部分也遭到失敗。應當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後，由於紅軍對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別是由於國民黨的大舉進攻，實際上已經停止了奪取中心城市的行動；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後，又由於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壞，臨時中央也離開了城市而遷入了鄉村根據地，實行了一個轉變。但是這種轉變，對於當時的『左』傾路線的同志們說來，不是自覺的，不是從研究中國革命特點得出正確結論的結果，因此，他們依然是以他們錯誤的城市觀點，來指導紅軍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並使這些工作受到破壞。例如，他們主張陣地戰，而反對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他們錯誤地強調所謂『正規化』，而反對紅軍的所謂『游擊主義』；他們不知道適應分散的鄉村和長期的被敵人分割的游擊戰爭，以節省使用根據地的人力物力，和採取其他必要的對策；他們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提出所謂『中國兩條道路的決戰』和所謂『不放棄根據地一寸土地』的錯誤口號等等，就是明證。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着重指出：我們上面所說的這一時期內鄉村工作所應推進、城市工作所應等待的形勢變化，現時已經迫近了。只有在現時，在抗日戰爭的最後階段，在我黨領導的軍

隊已經壯大，並還將更加壯大的時候，將敵佔區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區工作並重的地位，積極地準備一切條件，以便應外合地從中心城市消滅日本侵略者，然後把工作重心轉到這些城市去，才是正確的。這一點，對於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來艱難地將工作重心轉入鄉村的我黨，將是一個新的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全黨同志都應充分自覺地準備這一轉變，而不再重複『左』傾路線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城市轉入鄉村問題上所表現的初則反對、違抗，繼則勉強、被迫和不自覺的那種錯誤。至於國民黨統治區域，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在那裏，我們現時的任務是無論在鄉村或城市，都應放手動員羣衆，堅決反對內戰分裂，力爭和平團結，要求加強對日作戰，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全國統一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當敵佔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國統一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真正地實現了和鞏固了的時候，就將是鄉村根據地的歷史任務完成的時候。

第三，各次『左』傾路線在進攻和防禦的策略指導上，也犯了錯誤。正確的策略指導，必須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確的形勢分析（正確地估計階級力量的對比，判斷運動的來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來的正確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需要正確的『利用敵人陣營裏的每一縫隙，善於給自己找尋同盟者』^{〔三〕}；而毛澤東同志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指導，正是一個最好的模範。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正確地指出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國範圍內敵強於我，冒險的進攻必然要招致失敗；但在反動政權內部不斷分裂和戰爭，人民革命要求逐漸恢復和上升的一般條件下，和在羣衆經過第一次大革命鬥爭，並有相當力量的紅軍和有正確政策的共

產黨的特殊條件下，就可以『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三三〕}。他又指出：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紅色政權的發展『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若在統治階級比較穩定時期，則這種發展『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三四〕}。即在同一時期，由於敵人的強弱不同，我們的策略也應當不同，所以湘贛邊的割據地區就『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三五〕}。湘贛邊紅軍以後進入閩贛邊，又提出『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三六〕}的計劃。不同的敵人對革命的不同利害關係，是決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據。所以毛澤東同志始終主張『利用反革命內部的每一衝突，從積極方面擴大他們內部的裂痕』^{〔三七〕}，『反對孤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三八〕}。這些『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三九〕}的策略原則的運用，在他所領導的歷次反『圍剿』戰爭中，尤其在遵義會議後的長征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工作中，得到了光輝的發展。劉少奇同志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範。劉少奇同志正確地估計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白區特別是城市敵我力量的懸殊，所以主張有系統地組織退却和防禦，『在形勢與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暫時避免和敵人決鬥』，以『準備將來革命的進攻和決鬥』^{〔四〇〕}；主張有計劃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的黨的公開組織嚴格地轉變為秘密組織，而在羣衆工作中則『盡可能利用公開合法手段』，以便黨的秘

密組織能够在這種羣衆工作中長期地隱蔽力量，深入羣衆，『聚積與加強羣衆的力量，提高羣衆的覺悟』^(三)。對於羣衆鬥爭的領導，劉少奇同志認為應當『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和條件，根據羣衆覺悟的程度，提出羣衆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號，要求和鬥爭的方式，去發動羣衆的鬥爭，並根據鬥爭過程中各種條件的變化，把羣衆的鬥爭逐漸提高到更高的階段，或者「適可而止」地暫時結束戰鬥，以準備下一次更高階段和更大範圍的戰鬥』。在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和爭取暫時的同盟者的問題上，他認為應該『推動這些矛盾的爆發，與敵人營壘中可能和我們合作的成份，或者與今天還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應該『向那些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吸引他們同我們聯合，參加共同的行動，再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下層的羣衆』^(三)。一二九運動的成功，證明了白區工作中這些策略原則的正確性。和這種正確的策略指導相反，各次『左』傾路綫的同志們因為不知道客觀地考察敵我力量的對比，不知道採取與此相當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不承認或不重視敵人內部的矛盾，這樣，他們在應當防禦的時候，固然因為盲目地實行所謂『進攻路綫』而失敗，就在真正應當進攻的時候，也因為不會組織勝利的進攻而失敗。他們『估計形勢』的方法，是把對他們的觀點有利的某些個別的、萌芽的、間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現象，誇大為大量的、嚴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質的東西，而對於不合他們的觀點的一切實際（如敵人的強大和暫時勝利，我們的弱小和暫時失敗，羣衆的覺悟不足，敵人的內部矛盾，中間派的進步方面等），則害怕承認，或熟視無睹。他們從不設想到可能

的最困難和最複雜的情況，而只是夢想着不可能的最順利和最簡單的情況。在紅軍運動方面，他們總是把包圍革命根據地的敵人描寫爲『十分動搖』、『恐慌萬狀』、『最後死亡』、『加速崩潰』、『總崩潰』等等。第三次『左』傾路綫的代表者們甚至認爲紅軍對於超過自己許多倍的整個的國民黨軍隊還佔優勢，因此總是要求紅軍作無條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進。第三次『左』傾路綫的代表者們否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這種情況只是到了抗日戰爭期間才起了一個相反的變化），錯誤地反對所謂『北方落後論』，要求在北方鄉村中普遍地建立紅色政權，在北方白色軍隊中普遍地組織譚變成立紅軍。他們也否認根據地的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的不平衡，錯誤地反對所謂『羅明路綫』^{（三）}。他們拒絕利用進攻紅軍的各個軍閥之間的矛盾，拒絕同願意停止進攻紅軍的軍隊成立妥協。在白區工作方面，他們在革命已轉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統治力量極爲強大的城市，拒絕實行必要的退却和防禦的步驟，拒絕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繼續採取爲當時情況所不允許的進攻的形式，組織龐大的沒有掩護的黨的機關和各種脫離廣大羣衆的第二黨式的所謂赤色羣衆團體，經常地無條件地號召和組織政治罷工、同盟罷工、罷課、罷市、罷操、罷崗、遊行示威、飛行集會以至武裝暴動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羣衆參加和支持的行動，並曲解這一切行動的失敗爲『勝利』。總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綫的同志們只知道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盲目地認爲『鬥爭高於一切，一切爲了鬥爭』，『不斷地擴大和提高鬥爭』，因而不斷地陷於不應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敗。

(一) 在軍事上：

在中國革命的現階段，軍事鬥爭是政治鬥爭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這一問題成爲黨的路綫中的最迫切的問題。毛澤東同志不但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中國革命的正確的政治路綫，而且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來，也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服從於這一政治路綫的正確的軍事路綫。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路綫從兩個基本觀點出發：第一，我們的軍隊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軍隊，它必須是服從於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服務於人民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第二，我們的戰爭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戰爭，它必須在承認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條件下，充分地利用敵之劣點與我之優點，充分地依靠人民羣衆的力量，以求得生存、勝利和發展。從第一個觀點出發，紅軍（現在是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必須全心全意地爲着黨的路綫、綱領和政策，也就是爲着全國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奮鬥，反對一切與此相反的軍閥主義傾向。因此，紅軍必須反對軍事不服從於政治或以軍事來指揮政治的單純軍事觀點和流氓思想；紅軍必須同時負起打仗、做羣衆工作和籌款（現在是生產）的三位一體的任務，而所謂做羣衆工作，就是要成爲黨和人民政權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就是要幫助地方人民羣衆分配土地（現在是減租減息），建立武裝，建立政權以至建立黨的組織，因此，紅軍在軍政關係和軍民關係上，必須要求嚴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權機關和羣衆團體，鞏固它們的威信，嚴格地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四〕}；在軍隊的內部，必須建立正確的官兵關係，必須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權的以自覺

爲基礎的軍事紀律；在對敵軍的工作上，必須具有瓦解敵軍和爭取俘虜的正確政策。從第二個觀點出發，紅軍必須承認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主要戰爭形式，承認只有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和游擊隊、民兵相結合，武裝羣衆和非武裝羣衆相結合的人民戰爭，才能夠戰勝比自己強大許多倍的敵人。因此，紅軍必須反對戰略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堅持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反對戰役戰術的以少勝多，堅持戰役戰術的以多勝少。因此，紅軍必須實行『分兵以發動羣衆，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三〕}；『誘敵深入』^{〔三〕}；『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地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三〕}等項戰略戰術的原則。各次『左』傾路線在軍事上都是同毛澤東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對的方面：第一次『左』傾路線的盲動主義，使紅軍脫離人民羣衆；第二次『左』傾路線，使紅軍實行冒險的進攻。但是這兩次『左』傾路線在軍事上都沒有完整的體系。具有完整體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傾路線，在建軍的問題上，把紅軍的三項任務縮小成爲單純的打仗一項，忽略正確的軍民、軍政、官兵關係的教育；要求不適當的正規化，把當時紅軍的正當的游擊性當作所謂『游擊主義』來反對；又發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在作戰問題上，它否認了敵強我弱的前提，要求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規』戰；要求戰略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要求『全綫出擊』和『兩個拳頭打人』；反對誘敵深入，把必要的轉移當作所

謂『退却逃跑主義』；要求固定的作戰綫和絕對的集中指揮等；總之是否定了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不了解正確的人民戰爭。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他們始則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繼則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主張分兵防禦，『短促突擊』，同敵人『拚消耗』；最後，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時，又變為實行真正的逃跑主義。這些都是企圖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正確的人民戰爭的結果。

在抗日戰爭的戰略退却和戰略相持階段中，因為敵我強弱相差更甚，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正確方針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強求過多的運動戰是錯誤的。但在將要到來的戰略反攻階段，正如全黨的工作重心需要由鄉村轉到城市一樣，在我軍獲得新式裝備的條件下，戰略上也需要由以游擊戰為主變為以運動戰和陣地戰為主。對於這個即將到來的轉變，也需要全黨有充分的自覺來作準備。

(三) 在組織上：

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正確的政治路綫應該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而為使這個路綫真正從羣衆中來，特別是真正能到羣衆中去，就不但需要黨和黨外羣衆（階級和人民）有密切的聯繫，而且首先需要黨的領導機關和黨內羣衆（幹部和黨員）有密切的聯繫，也就是說，需要正確的路綫。因此，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各個時期既然規定了代表人民羣衆利益的政治路綫，同時也就規定了服務於這一政治路綫的聯繫黨內黨外羣衆的組織路綫。這個工作，在土地革命戰爭時

期也得到了重要的發展，其集中的表現，便是一九二九年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三〕。這個決議，一方面把黨的建設提到了思想原則和政治原則的高度，堅持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正確地進行了反對單純軍事觀點、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平均主義、流氓思想、盲動主義等傾向的鬥爭，指出了這些傾向的根源、危害和糾正的辦法；另一方面又堅持嚴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對不正當地限制民主，也反對不正當地限制集中。毛澤東同志又從全黨團結的利益出發，堅持局部服從全體，並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特點，規定了新幹部和老幹部、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以及不同部門、不同地區的幹部間的正確關係。這樣，毛澤東同志就供給了一個堅持真理的原則性和服從組織的紀律性相結合的模範，供給了一個正確地進行黨內鬥爭和正確地保持黨內團結的模範。與此相反，在一切錯誤政治路線統治的同時，也就必然出現了錯誤的組織路線；這條錯誤的政治路線統治得愈久，則其錯誤的組織路線的爲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次『左』傾路線，不但反對了毛澤東同志的政治路線，也反對了毛澤東同志的組織路線；不但形成了脫離黨外羣衆的宗派主義（不把黨當作人民羣衆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羣衆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脫離黨內羣衆的宗派主義（不使黨內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從全黨利益，不把黨的領導機關當作全黨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爲貫徹其意旨起見，在黨內曾經把一切因爲錯誤路線行不通而對它採取懷疑、不同意、不滿意、不積極擁護、不堅決執行的同志，不問其情況如何，一律錯誤地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羅明路

綫」、「調和路綫」、「兩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甚至以對罪犯和敵人作鬥爭的方式來進行這種「黨內鬥爭」。這種錯誤的黨內鬥爭，成了領導或執行「左」傾路綫的同志們提高其威信、實現其要求和嚇唬黨員幹部的一種經常辦法。它破壞了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取消了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民主精神，使黨內紀律成爲機械的紀律，發展了黨內盲目服從隨聲附和的傾向，因而使黨內新鮮活潑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之發展，受到打擊和阻撓。同這種錯誤的黨內鬥爭相結合的，則是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宗派主義者不把老幹部看作黨的寶貴的資本，大批地打擊、處罰和撤換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們氣味不相投的、不願盲目服從隨聲附和的、有工作經驗並聯繫羣衆的老幹部。他們也不給新幹部以正確的教育，不嚴肅地對待提拔新幹部（特別是工人幹部）的工作，而是輕率地提拔一切同他們氣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從隨聲附和的、缺乏工作經驗、不聯繫羣衆的新幹部和外來幹部，來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幹部。這樣，他們既打擊了老幹部，又損害了新幹部。很多地區，更由於錯誤的肅反政策和幹部政策中的宗派主義糾纏在一起，使大批優秀的同志受到了錯誤的處理而被誣害，造成了黨內極可痛心的損失。這種宗派主義的錯誤，使黨內發生了上下脫節和其他許多不正常現象，極大地削弱了黨。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此宣佈：對於一切被錯誤路綫所錯誤地處罰了的同志，應該根據情形，撤消這種處分或其錯誤部分。一切經過調查確係因錯誤處理而被誣害的同志，應該得到昭雪，恢復黨籍，並受到同志的紀念。

(四) 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之正確或錯誤，其思想根源都在於它們是否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出發，是否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和中國人民的客觀需要出發。毛澤東同志從他進入中國革命事業的第一天起，就着重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以從事於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強調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對了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危害。毛澤東同志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所規定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正是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具體地分析了當時國內外黨內外的現實情況及其特點，並具體地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特別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歷史經驗的光輝的成果。在中國生活和奮鬥的中國共產黨人學習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應該是爲了用以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各種實際問題，如同毛澤東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傾錯誤的同志們，在那時，當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澤東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狹隘經驗主義者』，這是因爲他們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在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更特別突出地表現爲教條主義的緣故。教條主義的特點，是不從實際情況出發，而從書本上的個別詞句出發。它不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認真研究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過去和現在，認真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得出結論，作爲中國革命的行動指南，

再在羣衆的實踐中去考驗這些結論是否正確；相反地，它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若干個別詞句搬運到中國來當做教條，毫不研究這些詞句是否合乎中國現時的實際情況。因此，他們的『理論』和實際脫離，他們的領導和羣衆脫離，他們不是實事求是，而是自以爲是，他們自高自大，誇誇其談，害怕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條主義統治時期，同它合作並成爲它的助手的經驗主義的思想，也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經驗主義同教條主義的區別，是在於它不是從書本出發，而是從狹隘的經驗出發。應當着重地指出：最廣大的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他們的一切有益的經驗，是極可寶貴的財產。科學地把這些經驗總結起來，作爲以後行動中的指導，這完全不是經驗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像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原則當做革命行動的指南，而不把它們當做教條，就完全不是教條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樣。但是，在一切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滿足於甚至僅僅滿足於他們的局部經驗，把它們當做到處可以使用的教條，不懂得而且不願意承認『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¹⁾和『爲着領導，必須預見』⁽²⁾的真理，因而輕視從世界革命經驗總結出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並醉心於狹隘的無原則的所謂實際主義和無頭腦無前途的事務主義，却坐在指揮台上，盲目地稱英雄，擺老資格，不肯傾聽同志們的批評和發展自我批評，這樣，他們就成爲經驗主義者了。因此，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出發點雖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質上，兩者却是一致的。他們都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

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分割開來；他們都違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把片面的相對的真理誇大爲普遍的絕對的真理；他們的思想都不符合於客觀的全面的實際情況。因此，他們對於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就有了許多共同的錯誤的認識（如錯誤的城市中心觀點，白區工作中心觀點，脫離實際情況的『正規』戰觀點等）。這就是這兩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雖然因爲經驗主義者的經驗是局部的、狹隘的，他們中的多數對於全面性的問題往往缺乏獨立的明確的完整的意見，因此，他們在和教條主義者相結合時，一般地是作爲後者的附庸而出現，但是黨的歷史證明，教條主義者缺乏經驗主義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黨』，而在教條主義被戰勝以後，經驗主義更成爲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因此，我們不但要克服主觀主義的教條主義，而且也要克服主觀主義的經驗主義。必須徹底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路線和作風，才能普及和深入全黨。

以上所述政治、軍事、組織和思想四方面的錯誤，實爲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基本錯誤。而一切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都是從思想上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而來，都是從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而來。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指出：我們在否定各次『左』傾路線的錯誤時，同時要牢記和實行毛澤東同志『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四）}的指示。應當指出：犯了這些錯誤的同志們的觀點中，並不是一切都錯了，他們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蔣戰爭等問題上的若干觀

點，同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仍然是一致的。還應指出，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間特別長久，所給黨和革命的損失特別重大，但是這個時期的黨，因為有廣大的幹部、黨員羣衆和廣大的軍民羣衆在一起，進行了積極的工作和英勇的鬥爭，因而在許多地區和許多部門的實際工作中，仍然獲得了很大的成績（例如在戰爭中，在軍事建設中，在戰爭動員中，在政權建設中，在白區工作中）。正是由於這種成績，才能够支持反對敵人進攻的戰爭至數年之久，給了敵人以重大的打擊；僅因錯誤路線的統治，這些成績才終於受到了破壞。在每次錯誤路線統治時期，和黨的任何其他歷史時期一樣，一切爲人民利益而壯烈地犧牲了的黨內黨外的領袖、領導者、幹部、黨員和人民羣衆，都將永遠被黨和人民所崇敬。

（五）

『左』傾路線的上述四方面錯誤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會根源。

如同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正確路線反映了中國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思想一樣，『左』傾路線則反映了中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不但從黨外說是處在這個廣大階層的包圍之中；而且在黨內，由於十月革命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世界的偉大勝利，由於中國現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特別是國共兩黨的歷史發展，決定了中國不能有強大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分子向無產階級

隊伍尋出路，使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也佔了大多數。此外，即使工人羣衆和工人黨員，在中國的經濟條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資產階級的色彩。因此，小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黨內常常有各色各樣的反映，這是必然的，不足爲怪的。

黨外的小資產階級羣衆，除了農民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資產階級大多數羣衆在中國也受着重重壓迫，經常迅速大量地陷於貧困破產和失業的境地，其經濟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現階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動力之一。但是小資產階級由於是一個過渡的階級，它是有兩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說來，是其大多數羣衆在政治上、組織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無產階級的影響，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並能爲此而團結奮鬥，在將來也可能和無產階級共同走向社會主義；而就其壞的、落後的一面說來，則不但有其各種區別於無產階級的弱點，而且在失去無產階級的領導時，還往往轉而接受自由資產階級以至大資產階級的影響，成爲他們的俘虜。因此，在現階段上，無產階級及其先進部隊——中國共產黨，對於黨外的小資產階級羣衆，應該在堅決地廣泛地聯合他們的基礎上，一方面給以寬大的待遇，在不妨礙對敵鬥爭和共同的社會生活的條件下，容許其自由主義的思想和作風的存在；另一方面則給以適當的教育，以便鞏固同他們的聯合。

至於由小資產階級出身而自願拋棄其原有立場、加入無產階級政黨的分子，則是完全另一種情形。黨對於他們，和對於黨外的小資產階級羣衆，應該採取原則上不同的政策。由於他們本

來和無產階級相接近，又自願地加入無產階級政黨，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和羣衆革命鬥爭的實際鍛鍊中，他們是可以逐漸在思想上無產階級化，並給無產階級隊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實上，加入我黨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之絕大多數，也都爲黨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奮鬥和犧牲，他們的思想已經進步，很多人並已成爲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了。但是，必須着重指出：任何沒有無產階級化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質上和無產階級革命性不相同，而且這種差別往往可能發展成爲對抗狀態。帶着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黨員，雖然在組織上入了黨，但是在思想上却還沒有入黨，或沒有完全入黨，他們往往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面貌出現的自由主義者、改良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布朗基主義者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但不能引導中國將來的共產主義運動達到勝利，而且也不能引導中國今天的新民主主義運動達到勝利。如果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和這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的舊有思想堅決地分清界限，嚴肅地、但是恰當地和耐心地進行教育和鬥爭，則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圖以他們自己的本來面貌來代替黨的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面貌，實行篡黨，使黨和人民的事業蒙受損失。黨外的小資產階級愈是廣大，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愈是衆多，則黨便愈須嚴格地保持自己的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純潔性，否則小資產階級思想向黨的進攻必然愈是猛烈，而黨所受的損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黨歷史上各次錯誤路線和正確路線之間的鬥爭，實質上即是黨外的階級鬥爭在黨內的表演；而上述「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

和思想上的錯誤，也即是這種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現為觀察問題時的主觀性和片面性，即不從階級力量對比之客觀的全面的情況出發，而把自己主觀的願望、感想和空談當做實際，把片面當成全面，局部當成全體，樹木當做森林。脫離實際生產過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只有書本知識而缺乏感性知識，他們的思想方法就比較容易表現為我們前面所說的教條主義。聯繫生產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雖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識，但是受着小生產的狹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們的思想方法就比較容易表現為我們前面所說的經驗主義。

第二，在政治傾向方面。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傾向，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來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觀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現為左右搖擺。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許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馬上勝利，以求根本改變他們今天所處的地位，因而他們對於革命的長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們對於『左』的革命詞句和口號有很大的興趣，他們容易發生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情緒和行動。小資產階級的這種傾向，在黨內反映出來，就構成了我們前面所說的『左』傾路綫在革命任務問題、革命根據地問題、策略指導問題和軍事路綫問題上的各種錯誤。

但是，這些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在另外一種情況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也可以表現悲觀失望，表現追隨於資產階級之後的右傾情緒和右傾觀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

命後期的陳獨秀主義，土地革命後期的張國燾主義和長征初期的逃跑主義，都是小資產階級這種右傾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抗日時期，又曾發生過投降主義的思想。一般地說，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裂的時期，比較容易發生『左』傾錯誤（例如土地革命時期『左』傾路線統治黨的領導機關至三次之多），而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聯合的時期，則比較容易發生右傾錯誤（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後期和抗日戰爭初期）。而無論是『左』傾或右傾，都是不利於革命而僅僅利於反革命的。由於各種情況的變化而產生的左右搖擺、好走極端、華而不實、投機取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在壞的一面的特點。這是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所處的不穩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組織生活方面。由於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別由於中國的落後的分散的宗法社會和幫口行會的社會環境，小資產階級在組織生活上的傾向，容易表現為脫離羣衆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這種傾向反映到黨內，就造成我們前面所說的『左』傾路線的錯誤的組織路線。黨長期地處在分散的鄉村游擊戰爭中的情況，更有利於這種傾向的發展。這種傾向，不是自我犧牲地爲黨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黨和人民的力量並破壞黨和人民的利益來達到個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黨的聯繫羣衆的原則、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紀律不相容的。這種傾向，常常採取各種各樣的形式，如官僚主義、家長制度、懲辦主義、命令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半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極端民主主義、鬧獨立性、行會主義、山頭主義、同鄉同學觀

念、派別糾紛、要流氓手腕等，破壞着黨同人民羣衆的聯繫和黨內的團結。

這些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三個方面。我們黨內歷次發生的思想上的主觀主義，政治上的『左』右傾，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等項現象，無論其是否形成了路綫，掌握了領導，顯然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之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無產階級的表現。爲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採取教育方法，將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進其無產階級化，是完全必要的。

(六)

由上所述，可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左』傾路綫，不是偶然的產物，而是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因此，要克服錯誤的『左』傾思想或右傾思想，既不能草率從事，也不能操切從事，而必須深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提高全黨對於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鑑別能力，並在黨內發揚民主，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耐心說服和教育的工作，具體地分析錯誤的內容及其危害，說明錯誤之歷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辦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克服黨內錯誤的應有態度。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這次全黨整風和黨史學習中所採取的方針，即『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三〕}的方針，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克服黨內錯誤的正確態度的模範，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提高並團結全黨的偉大成就。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指出：在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主義和李立三主義的鬥爭，這些鬥爭，是完全必要的。這些鬥爭的缺點，是沒有自覺地作爲改造在黨內嚴重存在着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步驟，因而沒有在思想上澈底弄清錯誤的實質及其根源，也沒有恰當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於重犯錯誤；同時，又太着重了個人的責任，以爲對於犯錯誤的人們一經給以簡單的打擊，問題就解決了。黨在檢討了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錯誤以後，認爲今後進行一切黨內思想鬥爭時，應該避免這種缺點，而堅決執行毛澤東同志的方針。任何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只要他已經了解和開始改正自己的錯誤，就應該不存成見地歡迎他，團結他爲黨工作。即使還沒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錯誤，但已不堅持錯誤的同志，也應該以懇切的同志的態度，幫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錯誤。現在全黨對於過去錯誤路線的認識，已經一致了，全黨已經在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周圍團結起來了。因此，全黨今後的任務，就是在弄清思想、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加強團結，正像本決議的第二節上所說的：『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爲着獲得抗日戰爭的澈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我們黨關於黨內歷史問題的一切分析、批判、爭論，是應該從團結出發，而又達到團結的，如果違背了這個原則，那就是不正確的。但是鑒於黨內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社會根源的存在以及黨所處的長期分散的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又鑒於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想殘餘還是存在着，尤其是對於經驗主義還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鑒於黨內嚴重的宗派主義雖然基本上已經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義傾向的山頭主

義則仍然相當普遍地存在着等項事實，全黨應該警覺：要使黨內思想完全統一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還需要一個長時期的繼續克服錯誤思想的鬥爭過程。因此，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決定：全黨必須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並着重聯繫中國革命的實踐，以達到進一步地養成正確的黨風，澈底地克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等項傾向之目的。

(七)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着重指出：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並且還在證明着，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鬥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今天我黨在抗日戰爭中所已經取得的偉大勝利及其所起的決定作用，就是這條正確路線的生動的證明。黨在個別時期中所犯的『左』右傾錯誤，對於二十四年來在我黨領導之下的轟轟烈烈地發展着的、取得了偉大成績和豐富經驗的整個中國革命事業說來，不過是一些部分的現象。這些現象，在黨還缺乏充分經驗和充分自覺的時期內，是難於完全避免的；而且黨正是在克服這些錯誤的鬥爭過程中而更加堅強起來，到了今天，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幹部、黨員和人民羣衆的結果，必將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堅決相信：有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這樣三次革命鬥

爭的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之下，必將使中國革命達到澈底的勝利。

〔註釋〕

〔一〕參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註四。

〔二〕羅章龍，中國共產黨初期的黨員，後來成爲中國革命的叛徒。在一九三一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羅章龍對中國革命前途表示悲觀失望，公開擁護托洛茨基、陳獨秀派的反革命主張，反對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綫，咒罵紅軍和紅色根據地，並以散發傳單的方式，將黨的幹部的名單向蔣介石匪幫告密。羅章龍爲了破壞黨所領導的革命鬥爭，成立了所謂「中央非常委員會」、「第二省委」、「第二區委」、「第二工會黨團」等組織，進行分裂黨的活動。羅章龍於一九三一年一月被開除出黨。

〔三〕參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二和註三。

〔四〕一九三〇年九月，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二次進攻長沙。當時因敵軍築壘死守，又有飛機和軍艦的援助，紅軍久攻不克，而敵人的援軍已日漸集中，形成不利形勢。毛澤東同志說服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幹部，撤退圍攻長沙的部隊，接着又說服了幹部放棄奪取中心城市九江和打其他大城市的意見，改變方針，分兵攻取茶陵、攸縣、醴陵、萍鄉、吉安等地，使紅一方面軍獲得很大的發展。

〔五〕瞿秋白同志，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和領導人之一。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的第三次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都被選爲中央委員。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秋白同志曾積極反對國民黨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內以陳獨秀爲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革命後，曾主持召集八月七日的黨中央緊急會議，結束了陳獨秀主義在黨內的統治。但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他在擔任中央領導工作時曾犯過「左」的盲動主義的錯誤。在一九三〇年九月，秋白同志主持召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停止了危害黨的立三路綫的執行。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他却受到了「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的打擊，被排斥於中央領導機關之外。從這時到一九三三

年的一個時期，他在上海同魯迅合作從事革命文化運動。一九三三年到江西紅色根據地，擔任工農民主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員。紅軍主力長征時，他被留在江西根據地。一九三五年三月，秋白同志在福建游擊區被蔣匪逮捕，六月十八日就義於福建長汀。

〔六〕林育南同志，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早期職工運動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曾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秘書長。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蔣匪逮捕，犧牲於龍華。

〔七〕李求實同志，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九二八年時曾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兼團中央宣傳部長，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的主編。一九三二年在黨中央宣傳部工作時，在上海被蔣匪逮捕，犧牲於龍華。

〔八〕何孟雄同志，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早期北方職工運動的組織者之一，曾創建京綏鐵路工會。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革命以後，曾在上海擔任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員會委員、省委農民部秘書等工作。一九三一年被蔣匪逮捕，犧牲於龍華。

〔九〕秦邦憲同志，別名博古。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先後擔任黨的上海臨時中央局和紅色區域中央局的領導者，在此期間，犯過嚴重的「左」傾路線的錯誤。抗日戰爭初期，在黨中央的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後，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在延安創辦和主持「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在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慶參加同國民黨的談判。四月，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

〔一〇〕一九三五年秋，犯「左」傾錯誤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名義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包括陝甘邊和陝北），同原在那裏的犯「左」傾錯誤的郭洪濤同志結合，將「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貫徹到政治、軍事、組織各方面工作中去，並排斥執行正確路線的，創造了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劉志丹、高崗等同志。接着又在肅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極端錯誤地逮捕了一大批執行正確路線的幹部，造成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嚴重危機。十一月，黨中央經過長征到達陝北，糾正了這個「左」傾錯誤，將劉志丹、高崗等同志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因而挽救了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險局面。

〔一一〕見斯大林「中國革命問題」、「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的任務」第二部分和「論中國革命的前途」。

〔一二〕見本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一三〕見本書第一卷「井崗山的鬥爭」中「革命性質問題」一段。

〔一四〕引自一九二九年四月「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信」。見本書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所引。

〔五〕見本書第一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够存在？」、「井岡山的鬥爭」等文。

〔六〕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向一切進攻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國民黨軍隊提議，在三個條件下訂立停戰協定，聯合抗日。三個條件是：（一）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二）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三）武裝人民。

〔七〕參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一五。

〔八〕引自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

〔九〕見本書第一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二文。

〔一〇〕引自本書第一卷所載「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够存在？」。

〔一一〕引自本書第一卷所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二〕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七部分「戰略與策略」和「時局問題簡評」第二部分「關於中國」。這裏的引語引自「時局問題簡評」。

〔一三〕引自本書第一卷所載「井岡山的鬥爭」。

〔一四〕引自本書第一卷所載「井岡山的鬥爭」。

〔一五〕引自本書第一卷所載「井岡山的鬥爭」。

〔一六〕引自一九二九年四月「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信」。見本書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所引。

〔一七〕引自「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決議」（遵義會議決議）。

〔一八〕引自本書第一卷所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第三章。

〔一九〕見本書第二卷「論政策」一文。

〔二〇〕引自劉少奇同志所作「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

〔二一〕引自劉少奇同志「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信」。

〔二二〕引自劉少奇同志所作「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

〔二三〕羅明過去曾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九三三年時任中央紅色根據地福建省委的代理書記。羅明曾因認爲黨在閩西上杭、永定等邊緣地區的條件比較困難，黨的政策應當不同於根據地的鞏固地區，而受到「左」傾分子的打擊。「左」傾分子把

他的意見錯誤地、誇大地說成是「對革命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却路線」，並在組織上開展所謂「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

〔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毛澤東同志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所訂的中國工農紅軍的紀律，後來成爲八路軍新四軍的紀律，現在則成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紀律。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因爲這些紀律的內容在各地各軍中略有出入，曾重作統一規定。「三大紀律」是：（一）一切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羣衆一針一線；（三）一切繳獲要歸公。「八項注意」是：（一）說話和氣；（二）買賣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損壞莊稼；（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

〔五〕引自一九二九年四月「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信」。見本書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所引。

〔六〕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第五章。

〔七〕引自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共中央關於衝破五次「圍剿」的總結」。

〔八〕即本書第一卷所載「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

〔九〕引自列寧「做什麼？」第一章第四節。

〔四〇〕引自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聯共（布）莫斯科組織的積極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論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合全會的工作」。

〔四一〕引自本書所載「學習和時局」。

〔四二〕布朗基主義是指以法國布朗基（一八〇五年至一八八一年）爲代表的一種革命冒險主義思想。布朗基主義否認階級鬥爭，妄想不依靠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用極少數知識分子的陰謀行動，就可以使人類擺脫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

〔四三〕引自本書所載「學習和時局」。

爲人民服務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我們是革命的隊伍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爲着解放人民的，是澈底地爲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一〕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

死在革命的人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二〕爲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爲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從人民的利益出發
對待批評

因爲我們是爲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三〕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採用了。只要我們爲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爲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爲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着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四〕，但是還不够，還要更大些，才能取

困難的光陰
得不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爲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今後我們的隊伍裏，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爲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裏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託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註釋〕

〔一〕張思德同志，中共中央警衛團的戰士，一九三二年參加革命，經過長征，負過傷，是一個忠實爲人民利益服務的共產黨員。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在陝北安塞縣山中燒炭，因炭窑崩塌而犧牲。

〔二〕司馬遷，公元前二世紀人，中國著名的文學家和歷史家，著有『史記』一百三十篇。此處引語見他的『報任少卿書』。

〔三〕李鼎銘，陝北的開明士紳，曾被選爲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

〔四〕這是指當時陝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華南各解放區所擁有的人口的總數。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爲追悼張思德同志而召集的會議上所作的講演。

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

空洞無物，沒有答覆人民所關切的任何一個問題，是蔣介石雙十演說的特色之一。蔣介石說，大後方尚有廣大土地，不怕敵人。寡頭專政的國民黨領導者們，至今看不見他們有什麼改革政治抗拒敵人的意圖和本領，只有『土地』一項現成資本可資抵擋。但是誰也明白，僅有這項資本是不夠的，沒有正確的政策和人的努力，日本帝國主義是天天在威脅這塊剩餘土地的。蔣介石大概是強烈地感到了敵人的這種威脅，只要看他向人民反覆申述沒有威脅，甚至說，『我自黃埔建軍以來，二十年間，革命形勢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堅固』，就是他感到了這種威脅的反映。他又反覆地說不要『喪失我們的自信』，就是在國民黨隊伍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人士中，已有很多人喪失了信心的反映。蔣介石在尋找方法，以期重振這種信心。但是他不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個政策或工作方面去找振作的方法，他找到了拒諫飾非的方法。他說，『國際觀察家』都是『莫明其妙』的，『外國輿論對我們軍政政治紛紛議論』，都是相信了『敵寇漢奸造謠作祟』的緣故。說也奇怪，羅斯福一類的外國人，也和宋慶齡一類的國民黨人、國民參政會的許多參政員以及一切有良心的中國人一樣，都不相信蔣

介石及其親信們的好聽的申辯，都『對我們軍事政治紛紛議論』。蔣介石對於此種現象感到煩惱，一向沒有找出一個在他認為理直氣壯的論據，直到今年雙十節才找到了，原來却是他們相信了『敵寇漢奸造謠作祟』。於是蔣介石在其演說中，用了極長的篇幅，痛罵這種所謂『敵寇漢奸造謠作祟』。他以為經他這一罵，一切中國人、外國人的嘴巴可被封住了。對於我的軍事政治，有誰再來『紛紛議論』的麼，誰就是相信『敵寇漢奸造謠作祟』！我們認為蔣介石的這種指摘，是十分可笑的。因為，對於國民黨的寡頭專政，抗戰不力，腐敗無能，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主義的政令和失敗主義的軍令，敵寇漢奸從來沒有批評過，倒是十分歡迎的。引起人們一致不滿的蔣介石所著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日本帝國主義作過多次衷心的稱讚。關於改組國民政府及其統帥部一事，也沒有聽見什麼敵寇漢奸說過半句話，因為保存現在這樣天天壓迫人民和天天打敗仗的政府和統帥部，正是敵寇漢奸的希望。蔣介石及其一羣歷來是日本帝國主義誘降的對象，難道不是事實麼？日本帝國主義原來提出的『反共』『滅黨』兩個口號，早已放棄了『滅黨』，剩下一個『反共』，難道不是事實麼？日本帝國主義者至今還沒有向國民黨政府宣戰，他們說，日本和國民黨政府之間還沒有戰爭狀態存在呢！國民黨的要人們在上海南京寧波一帶的財產，至今被敵寇漢奸保存得好好的。敵酋畑俊六，派遣代表到奉化祭了蔣介石的祖墳。蔣介石的親信們暗地裏派遣使者，幾乎經常不斷地在上海等處和日寇保持聯繫，進行秘

密談判。特別是在日寇進攻緊急的時候，這種聯繫和談判就來得越多。所有這些，難道不是事實麼？由此看來，對於蔣介石及其一羣的軍事政治發生『紛紛議論』的人們，究竟是『莫明其妙』呢，還是已明其妙呢？這個『妙』的出處，究竟是『敵寇漢奸造謠作祟』呢，還是在蔣介石自己及其一羣的身上呢？

在蔣介石的演說中，還有一項聲明，就是他否認中國將有內戰。但是他又說：『決沒有人再敢背叛民國，破壞抗戰，如汪精衛之流之所爲。』蔣介石是在這裏尋找內戰的根據，並且他是找着了。有記性的中國人不會忘記，一九四一年，正當中國叛賣者們宣佈解散新四軍，中國人民起來制止內戰危機的時候，在蔣介石的一次演說中，曾說：將來決不會有『剿共』戰爭，如果有的話，那就是討伐叛逆的戰爭。讀過『中國之命運』的人們也會記得，蔣介石在那裏曾說：中共在一九二七年武漢政府時期『勾結』過汪精衛。一九四三年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上，又給中共安上了『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八字由頭。現在又讀了蔣介石這篇演說，就使人們感覺內戰危險不但存在，而且在發展着。中國人民現在就要牢牢地記着，不知那一天的早晨，蔣介石會要下令討伐所謂『叛逆』的，那時的罪狀就是『背叛民國』，就是『破壞抗戰』，就是『如汪精衛之流之所爲』。蔣介石是擅長這一手的，他不擅長於宣佈龐炳勳、孫良誠、陳孝強（二）一流人爲叛逆，也不擅長於討伐他們，但是他却擅長於宣佈華中的新四軍和山西的決死隊（三）爲『叛逆』，並且極擅長於討伐他們。中國人民決不要忘記，當着蔣介石聲言不打內戰的時候，他已經派遣了七十七萬五千人的軍隊，這些軍隊正在專門包圍或攻打八路軍、新四軍和華

南的人民游擊隊。

蔣介石的演說在積極方面空洞無物，他沒有替中國人民所熱望的改善抗日陣綫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極方面，這篇演說却充滿了危險性。蔣介石的態度越變越反常了，他堅決地反對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強烈地仇視中國共產黨，暗示了他所準備的反共內戰的藉口。但是，蔣介石的這一切企圖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願意改變他自己的作法的話，他將搬起石頭打他自己的腳。我們誠懇地希望他改變作法，因為他現在的作法是絕對地行不通的。他已宣佈『放寬言論尺度』^{〔三〕}，就不應該以相信『敵寇漢奸造謠作祟』的污蔑之詞來威脅和封閉人們『紛紛議論』之口。他已宣佈『縮短訓政時期』，就不應該拒絕人們改組政府和改組統帥部的要求。他已宣佈『用政治方法解決共黨問題』，就不應該又來尋找準備內戰的理由。

〔註釋〕

〔一〕 龐炳勳、孫良誠、陳孝強，都是先後公開投降日寇的國民黨將領。

〔二〕 山西的決死隊，是抗日戰爭初期在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裝。參看本書第二卷『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一文註三。

〔三〕 一九四四年以來，要求結束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實行民主、保障言論自由，成為國民黨統治區域的人民的普遍呼聲。國民黨爲了搪塞人民的迫切要求，一九四四年四月，宣佈所謂『放寬言論尺度』，五月，國民黨十二中全會又宣言『保障言論自由』。但是國民黨被迫所作的這些表示，事後一點也沒有兌現，其壓制人民言論的措施，隨着人民民主運動的高漲而層出不窮。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綫*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爲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和希特勒一樣，快要滅亡了。但是還須我們繼續努力，才能最後地消滅它。我們的工作首先是戰爭，其次是生產，其次是文化。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解放區的文化已經有了它的進步的方面，但是還有它的落後的方面。解放區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還有廣大的封建遺跡。在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內，還有一百多萬文盲，兩千個巫神，迷信思想還在影響廣大的羣衆。這些都是羣衆腦子裏的敵人。我們反對羣衆腦子裏的敵人，常常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困難些。我們必須告訴羣衆，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鬥爭。爲了進行這個鬥爭，不能不有廣泛的統一戰綫。而在陝甘寧邊區這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戰爭期間，這種統一戰綫就尤其要廣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規的小學、中學，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規的村學、讀報組和識字組。不但要有新式學校，而且要利用舊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藝術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話劇，而且要有秦腔、二和秧歌。不但要有

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舊戲班，利用在秧歌隊總數中佔百分之九十的舊秧歌隊，逐步地加以改造。在醫藥方面，更是如此。陝甘寧邊區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許多人民還相信巫神。在這種情形之下，僅僅依靠新醫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新醫當然比舊醫高明，但是新醫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痛苦，不爲人民訓練醫生，不聯合邊區現有的一千多個舊醫和舊式獸醫，並幫助他們進步，那就是實際上幫助巫神，實際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統一戰綫的原則有兩個：第一個是團結，第二個是批評、教育和改造。在統一戰綫中，投降主義是錯誤的，對別人採取排斥和鄙棄態度的宗派主義也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是聯合一切可用的舊知識分子、舊藝人、舊醫生，而幫助、感化和改造他們。爲了改造，先要團結。只要我們做得恰當，他們是會歡迎我們的幫助的。

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須有爲人民服務的高度的熱忱，必須聯繫羣衆，而不要脫離羣衆。要聯繫羣衆，就要按照羣衆的需要和自願。一切爲羣衆的工作都要從羣衆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願望出發。有許多時候，羣衆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羣衆還沒有決心，還不願實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我們的工作，羣衆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願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羣衆。凡是需要羣衆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羣衆的自覺和自願，就會流於徒有形式而失敗。『欲速則不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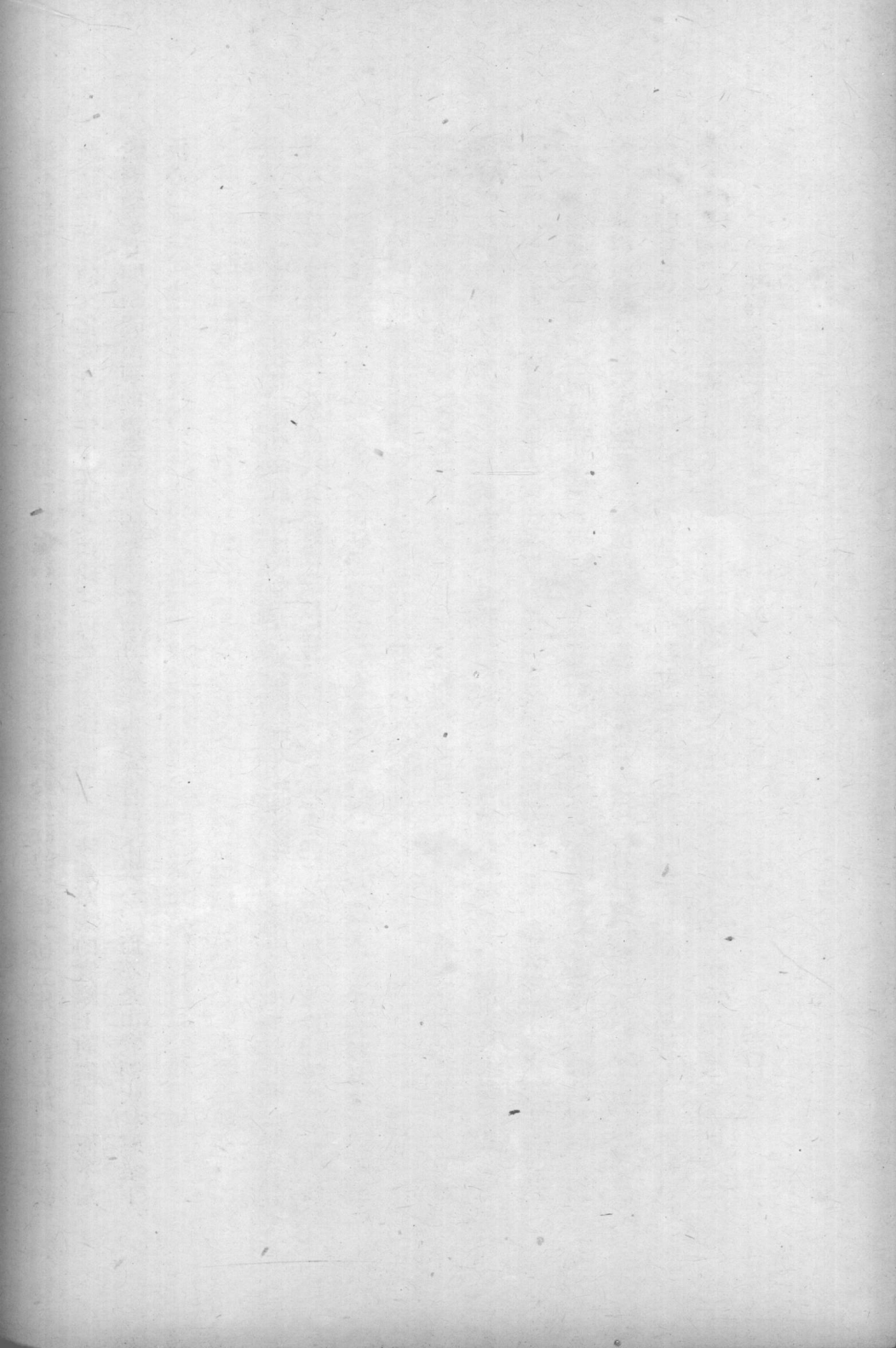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所作的講演。

這不是說不要速，而是說不要犯盲動主義，盲動主義是必然要失敗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羣衆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這裏是兩條原則：一條是羣衆的實際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裏頭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羣衆的自願，由羣衆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羣衆下決心。

〔註釋〕

〔一〕秦腔，陝西省的一種舊式歌劇。因為陝西在古代是秦國的地方，故稱秦腔。

〔二〕「欲速則不達」，孔子的話，見「論語」『子路』篇。



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各位勞動英雄，各位模範工作者！

你們開了會，總結了經驗，大家歡迎你們，尊敬你們。你們有三種長處，起了三個作用。第一個，帶頭作用。這就是因為你們特別努力，有許多創造，你們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範，提高了工作標準，引起了大家向你們學習。第二個，骨幹作用。你們的大多數現在還不是幹部，但是你們已經是羣衆中的骨幹，羣衆中的核心，有了你們，工作就好推動了。到了將來，你們可能成爲幹部，你們現在是幹部的後備軍。第三個，橋樑作用。你們是上面的領導人員和下面的廣大羣衆之間的橋樑，羣衆的意見經過你們傳上來，上面的意見經過你們傳下去。

你們有許多的長處，有很大的功勞，但是你們切記不可以驕傲。你們被大家尊敬，是應當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驕傲。如果你們驕傲起來，不虛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幹部，不尊重羣衆，你們就會當不成英雄和模範了。過去已有一些這樣的人，希望你們不要學他們。

你們的經驗，這次會議做了總結。這個總結文件說得很好，不但這裏適用，各地也可以適用，我

就不講這些了。我想講一點我們的經濟工作。

近幾年中，我們開始學會了經濟工作，我們在經濟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績，但這還只是開始。我們必須在兩三年內，使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各解放區，做到糧食和工業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給，並有盈餘。我們必須使農業、工業、貿易三方面都比現在有更大的成績。到了那時，才算學得更多，學得更好。如果那一個地方的軍民生活沒有改善，爲着反攻而準備的物質基礎還不穩固，農業、工業、貿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漲，而是停止不進，甚至下降，便證明那個地方的黨政軍工作人員還是沒有學會經濟工作，那個地方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

有一個問題必須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們的思想要適合於目前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是農村，這一點好像並沒有什麼問題，誰不知道我們是處在農村中呢？其實不然。我們有很多同志，雖然天天處在農村中，甚至自以爲了解農村，但是他們並沒有了解農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們不從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被敵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擊戰爭的農村環境這一點出發，他們就在政治問題上，軍事問題上，經濟問題上，文化問題上，黨務問題上，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項的問題上，常常處理得不適當，或不大適當。他們帶着城市觀點去處理農村，主觀地作出許多不適當的計劃，強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幾年來，由於整風，由於在工作中碰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會議上的講話。

了釘子，我們的同志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還須注意使我們的思想完全適合於我們所處的環境，然後才能使我們的工作樣樣見效，並迅速見效。如果我們真正了解了我們所處的環境是一個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被敵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擊戰爭的農村根據地，如果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看起來收效很慢，並不轟轟烈烈，但是在實際上，比較那種不從這一點出發而從別一點出發，例如說，從城市觀點出發，其工作效果會怎麼樣呢？那就決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為，如果我們從後一點出發，脫離今天的實際情況，做起來不是效率快慢的問題，而是老碰釘子，根本沒有效果的問題。

比如我們提倡採取現有樣式的軍民生產運動，發生了很大的效果，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據。

我們要打擊日本侵略者，並且還要準備攻入城市，收復失地。然而我們是處在個體經濟的被分割的游擊戰爭的農村環境中，怎樣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呢？我們不能學國民黨那樣，自己不動手專靠外國人，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依賴外國。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那末，有些什麼辦法呢？我們就用軍民兩方同時發動大規模生產運動這一種辦法。

由於是農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們的生產和供給就採取『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

由於是農村，農民都是分散的個體生產者，使用着落後的生產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還為地主所有，農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剝削，爲了提高農民的生產興趣和農業勞動的生產率，我們就採取減租減息

和組織勞動互助這樣兩個方針。減租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興趣，勞動互助提高了農業勞動的生產率。我已得了華北華中各地的材料，這些材料都說：減租之後，農民生產興趣大增，願意組織如同我們這裏的變工隊一樣的互助團體，三個人的勞動效率抵過四個人。如果是這樣，九千萬人就可以抵過一億二千萬人。還有兩個人抵過三個人的。如果不是採取強迫命令、欲速不達的方針，而是採取耐心說服、典型示範的方針，那末，幾年之內，就可能使大多數農民都組織在農業生產的和手工業生產的互助團體裏面。這種生產團體，一經成為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進步，文化也會提高，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不要很久，生產工具也會有所改良。到了那時，我們的農村社會，就會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礎的上面了。

如果我們的工作人員用心地研究這項工作，用極大的精力幫助農村人民展開生產運動，幾年之內，農村就會有豐富的糧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堅持戰鬥，不但可以對付荒年，而且可以貯藏大批糧食和日用品，以為將來之用。

不但要組織農民生產，而且要組織部隊和機關一齊生產。

由於是農村，由於是經常被敵人摧殘的農村，由於是長期戰爭的農村，部隊和機關就必須生產。由於是分散的游擊戰爭，部隊和機關也可能生產。在我們陝甘寧邊區，則更由於部隊和機關的人數和邊區人口比較，所佔比例數太大，如果不自己生產，則勢將餓飯；如果取之於民太多，則人民負擔不起，人民也勢將餓飯。因此，我們決定開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拿陝甘寧邊區說，部隊和機關每年需

細糧（小米）二十六萬担（每担三百斤），取之於民的佔十六萬担，自己生產的佔十萬担，如果不自己生產，則軍民兩方勢必有一方要餓飯。由於展開了生產運動，現在我們不但不餓飯，而且軍民兩方面都吃得很好。

我們邊區的機關，除糧食被服兩項之外，其他用費，大部自給，有些單位則全部自給。另有許多單位，並且自給一部分糧食，一部分被服。

邊區部隊的功勞更大。許多部隊，糧食被服和其他一切，全部自給，即自給百分之一百，不領政府一點東西。這是最高的標準，這是第一個標準，是在幾年之內逐漸達到的。

前方要作戰，不能採取這個標準。前方可以設立第二、第三兩個標準。第二個標準是除糧食被服兩項由政府供給之外，其他如油（每人每日五錢）、鹽（每人每日五錢）、菜（每人每日一斤至一斤半）、肉（每人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費、辦公費、雜支費、教育費、保健費、擦槍費、旱煙、鞋子、襪子、手套、毛巾、牙刷等，一概生產自給，約佔全部用費的百分之五十，可以在兩年至三年內逐漸地做到。現在已有做到了的。這個標準，在鞏固區內可以實行。

第三個標準，是在邊沿區和游擊區內實行的，他們不可能自給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給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够這樣，也就很好。

總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隊、機關，在戰鬥、訓練和工作的間隙裏，一律參加生產。部隊和機關，除利用戰鬥、訓練和工作的間隙，集體參加生產之外，應組織專門從事生產的人員，創辦農

場、菜園、牧場、作坊、小工廠、運輸隊、合作社，或者和農民夥種糧、菜。在目前條件下，爲着渡過困難，任何機關、部隊，都應建立起自己的家務。不願建立家務的二流子習氣，是可恥的。還應規定按質分等的個人分紅制度，使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員能够分得紅利，藉以刺激生產的發展。又須首長負責，自己動手，實行領導骨幹和廣大羣衆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具體指導相結合的辦法，才能有效地推進生產工作。

有人說：部隊生產，就不能作戰和訓練了；機關生產，就不能工作了。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最近幾年，我們邊區部隊從事大量的生產，衣食豐足，同時又進行練兵，又有政治和文化學習，這些都比從前有更大的成績，軍隊內部的團結和軍民之間的團結，也比從前更好了。在前方，去年一年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可是去年一年作戰方面有很大的成績，並且普遍地開始了練兵運動。機關因爲生產，工作人員生活改善了，工作更安心、更有效率，邊區和前方都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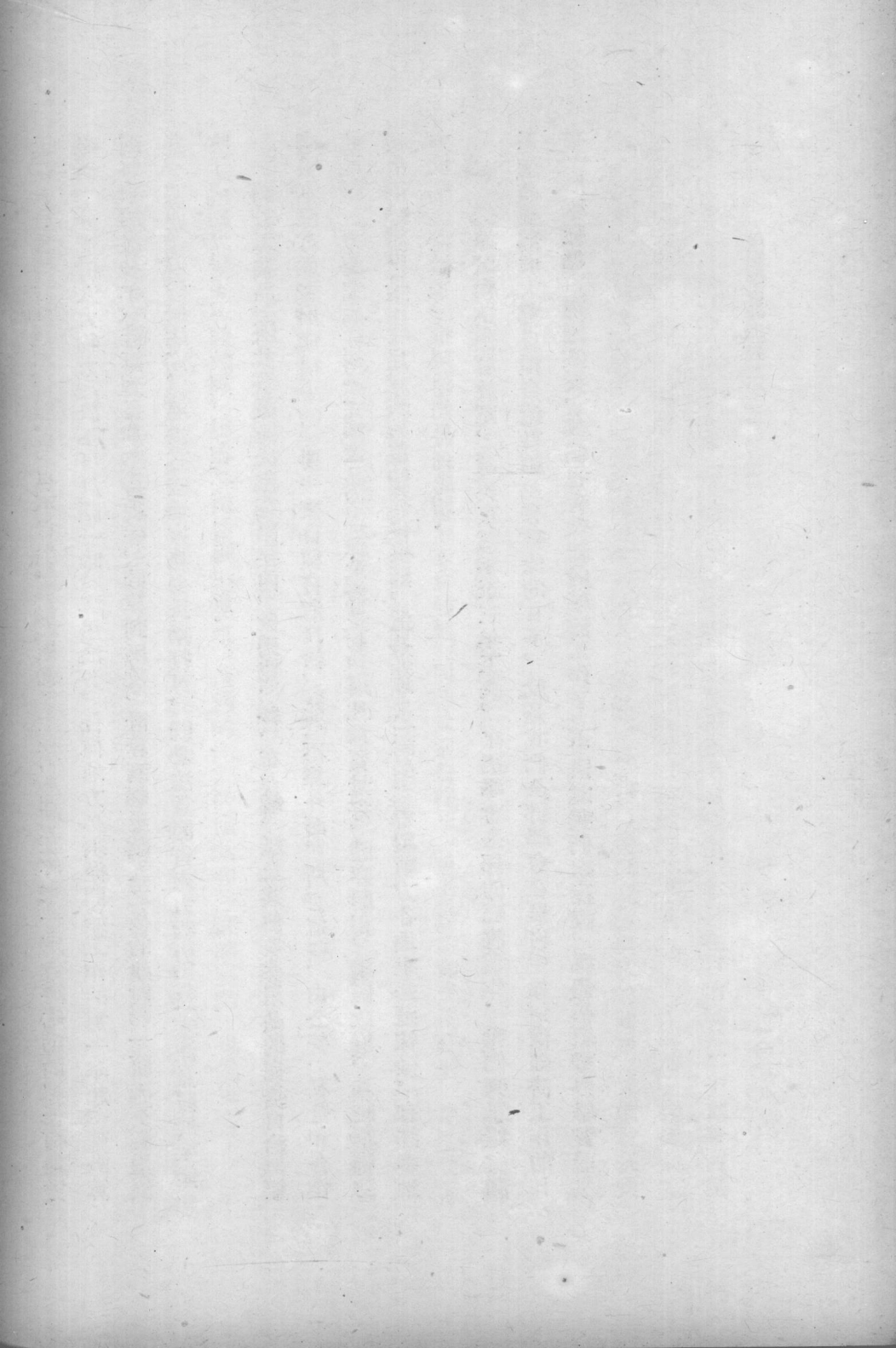
由此可見，處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的機關和部隊，如果有了生產自給運動，他們的戰鬥、訓練和工作，就更加有勁，更加活躍了；他們的紀律，他們的內部的團結和外部的團結，也就更好了。這是我們中國長期游擊戰爭的產物，這是我們的光榮。我們學會了這一條，我們就對一切物質困難都不怕了。我們將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氣，更有精力，愈戰愈強，只有我們去壓倒敵人，決不怕敵人來壓倒我們。

在這裏，有一點還須引起我們前方同志的注意。我們有些地區開闢不久，還頗富足，但是那裏的

工作人員自恃富足，不肯節省，也不肯生產。這樣就很不好，他們在將來一定會要吃虧的。任何地方必須十分愛惜人力物力，決不可只顧一時，濫用浪費。任何地方必須從開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計算到將來的很多年，計算到長期堅持戰爭，計算到反攻，計算到趕走敵人之後的建設。一面決不濫用浪費，一面努力發展生產。過去有些地方缺少長期打算，既未注意節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發展生產，吃了大虧。得了這個教訓，現在必須引起注意。

關於工業品，陝甘寧邊區決定在兩年內，做到花、紗、布、鐵、紙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給。原來根本沒有或者出產很少的，要一概自種自造自給，完全不靠外面。所有這些，由公營、私營和合作社經營三方面完成任務。一切產品，不但求數量多，而且求質量好，耐穿耐用。邊區政府、八路軍聯防司令部、黨中央西北局，對於這些抓得很緊，這是非常之對的。希望前方各地也是這樣做。有許多地方已是這樣做了，希望他們得到成功。

我們邊區和整個解放區，還要有兩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學會全部的經濟工作。我們到了糧食和工業品全部或大部自種自造自給並有盈餘的日子，就是我們全部學會在農村中如何做經濟工作的日子。將來從城市趕跑敵人，我們也會做新的經濟工作了。中國靠我們來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學習。



游擊區也能够進行生產。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我們在敵後解放區中那些比較鞏固的根據地內，能够和必須發動軍民的生產運動的問題，早已解決了，不成問題了。但是在游擊區中，在敵後之敵後，是否也能够這樣，在過去，在許多人的思想中，還是沒有解決的，這是因爲還缺少證明的緣故。

可是現在有了證據了。根據一月二十八日『解放日報』所載張平凱同志關於晉察冀游擊隊的生產運動的報道，晉察冀邊區的許多游擊區內，已於一九四四年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並且收到了極好的成績。張同志報道中所提到的區域和部隊，有冀中的第六分區，第二分區的第四區隊，第四分區的第一區隊，徐定支隊，保滿支隊，雲彪支隊，有山西的代縣和崞縣的部隊。那些區域的環境是很惡劣的：『敵僞據點碉堡林立，溝牆公路如網，敵人利用它的軍事上的優勢和便利的交通條件，時常對我襲擊，包圍，「清剿」；游擊隊爲了應付環境，往往一日數處地轉移。』然而他們仍然能够於戰爭的間隙，進行了生產。其結果：『使得大家的給養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錢油和鹽，一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幾年沒有用過的牙刷、牙粉和識字本，現在也都齊全了。』大家看，誰說游擊區不能生產呢！

游擊區也能够進行生產

許多人說：人稠的地方沒有土地。果真沒有土地嗎？請看晉察冀：『首先在農業爲主的方針下，解決了土地問題。他們共有九種辦法：第一，平毀封鎖牆溝；第二，平毀可被敵人利用的汽車路，在其兩旁種上莊稼；第三，利用小塊荒地；第四，協助民兵，用武裝掩護，月夜強種敵人堡壘底下的土地；第五，與缺乏勞動力的農民夥耕；第六，部隊化裝，用半公開的形式，耕種敵人據點碉堡旁邊的土地；第七，利用河沿，築堤修灘，起沙成地；第八，協助農民改旱地爲水地；第九，利用自己活動的村莊，到處伴種。』

農業生產是可以的，手工業及其他生產大概不能吧？果真不能嗎？請看晉察冀：『溝綫外部隊的生產，不限於農業，而且也和鞏固區一樣，開展了手工業和運輸業。第四區隊開設了一個氈帽坊，一個油坊，一個麵坊，七個月中盈利五十萬元本幣。不僅解決了本身困難，而且游擊區羣衆的需要也解決了。毛衣毛襪等，戰士們已能全部自給。』

游擊區戰鬥那樣頻繁，軍隊從事生產，恐怕要影響作戰吧？果真如此嗎？請看晉察冀：『實現了勞力和武力相結合的原則，把戰鬥任務和生產任務同樣看重。』『以第二分區第四區隊爲例。當春耕開始時，就派有專門的部隊去打擊敵人，並進行強有力的政治攻勢。正因爲這樣，軍事動作也積極了，部隊戰鬥力也提高了。這個小部隊從二月至九月初，作了七十一戰，攻下了朱東社、上莊、野莊、

鳳家寨、崖頭等據點，斃傷敵僞一百六十五名，俘僞軍九十一名，繳了三挺輕機槍，一百零一枝長短槍。『把軍事動作和大生產運動的宣傳配合起來，馬上進行政治攻勢：『誰要破壞大生產運動就打擊誰。』代、崞等縣城內敵人問老百姓：『爲什麼八路軍近來這麼厲害？』老百姓說：『因爲你們破壞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僞軍在下面紛紛議論：『人家搞大生產運動，可不要出去。』』

游擊區人民羣衆是否也可以發動生產運動呢？那些地方，也許是還沒有減租，或減租不徹底的，農民是否也有興趣去增加生產呢？這一點，晉察冀那邊也肯定地答覆了。『溝綫外部隊生產運動的開展，還給了當地羣衆以直接的幫助。一方面，用武力掩護了羣衆的生產；另一方面，又用勞力進行了普遍的幫助。有的部隊，規定了農忙時期以百分之五十的力量，無代價地幫助羣衆生產。羣衆生產情緒因此大大提高，軍民關係更爲融洽，羣衆都有了飯吃。游擊區羣衆對共產黨、八路軍的同情和擁護，從此更增高一步。』

游擊區能够和必須進行軍民的大規模的生產運動，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我們要求一切解放區黨政軍工作人員，特別是游擊區工作人員，從思想上完全認識這一點，認識這個『能够』和『必須』，事情就可以普遍地辦起來。晉察冀邊區也正是從這裏開始的：『在溝綫外部隊的生產運動中，由於幹部的思想轉變，重視生產，重視勞力和武力相結合，培養了羣衆中的英雄模範（初步總結中，有六十六個英雄模範），僅僅五個月中，我們溝綫外的部隊，不僅在生產任務上按時完成了計劃，而且特別有了許多實事求是的新創造。』

一九四五年，整個解放區，必須全體一致地從事一個比過去規模更大的軍民生產運動，到今年冬季，我們來比較各區的成績。

戰爭不但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我們要戰勝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還必須努力於經濟工作，必須於兩三年內完全學會這一門；而在今年——一九四五年，必須收到較前更大的成績。這是中共中央所殷殷盼望於整個解放區全體工作人員和全體人民的，我們希望這一計劃能夠完成。

兩個中國之命運*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同志們！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今天開幕了。

我們這個大會有什麼重要意義呢？我們應該講，我們這次大會是關係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命運的一次大會。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一)；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二)。我們這個大會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全中國人民解放出來。這個大會是一個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大會，是一個團結全中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爭取最後勝利的大會。

現在的時機很好。在歐洲，希特勒快要被打倒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的一部分是在西方，那裏的戰爭很快就要勝利了，這是蘇聯紅軍努力的結果。現在柏林已經聽到紅軍的砲聲，大概在不久就會打下來。在東方，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也接近着勝利的時節。我們的大會是處在反法西斯戰爭最後勝利的前夜。

在中國人民面前擺着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

暗的中國之命運。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被打敗。即使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也還是有這樣兩個前途。或者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就是說，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或者是另一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就是說，一個老中國。一個新中國還是一個老中國，兩個前途，仍然存在於中國人民的面前，存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面前，存在於我們這次代表大會的面前。

既然日本現在還沒有被打敗，既然打敗日本之後，還是存在着兩個前途，那末，我們的工作應當怎樣做呢？我們的任務是什麼呢？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羣衆，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爲着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我們的任務就是這一個！這就是我們大會的任務，這就是我們全黨的任務，這就是全中國人民的任務。

我們的希望能不能實現？我們認爲是能够實現的。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爲我們現在已經具備了這樣幾個條件：

第一，有一個經驗豐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萬黨員的強大的中國共產黨；

第二，有一個強大的解放區，這個解放區包括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九十一萬軍隊，二百二十萬民兵；

第三，有全國廣大人民的援助；

第四，有全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蘇聯的援助。

一個強大的中國共產黨，一個強大的解放區，全國人民的援助，國際人民的援助，在這些條件下，我們的希望能不能實現呢？我們認為是能夠實現的。這些條件，在中國是從來沒有過的。多少年來雖然有了一些條件，但是沒有現在這樣完備。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強大過，革命根據地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多的人口和這樣大的軍隊，中國共產黨在日本和國民黨統治區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現在為最高，蘇聯和各國人民的革命力量現在也是最大的。在這些條件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應當說是完全可能的。

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政策。這個政策的基本點，就是放手發動羣衆，壯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已經二十四年了，其間經過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這樣三個英勇奮鬥的歷史時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到了現在，我們的黨已經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已經成了中國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經成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中國的重心不在任何別的方面，而在我們這一方面。

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爲中國人民服務，在現時，爲着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在將來，爲着團結全國人民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只要我們能够這樣做，只要我們有正確的政策，只要我們一致努力，我們的任務是必能完成的。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國人民解放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萬歲！

〔註釋〕

〔一〕指蔣介石一九四三年所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

〔二〕指毛澤東同志準備在這次大會上要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

論聯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 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們的大會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開會的：中國人民在其對於日本侵略者作了將近八年的堅決的英勇的不屈不撓的奮鬥，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和自我犧牲之後，出現了這樣的新局面——整個世界上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神聖的正義的戰爭，已經取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中國人民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時機，已經迫近了。但是中國現在仍然不團結，中國仍然存在着嚴重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做呢？毫無疑義，中國急需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 and 同盟國配合作戰，打敗日本侵略者，使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然後，需要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包括更廣大範圍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領導解放後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爲一個獨立、自

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一句話，走團結和民主的路綫，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做，才是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報告，主要地就是討論這些要求。中國應否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已成了中國人民和同盟國民主輿論界十分關心的問題。因此，我的報告將着重地說明這個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工作，已經克服了很多的困難，獲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在目前形勢下，在我們黨和人民面前，還有嚴重的困難。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黨進一步地從事緊急的和更加切實的工作，繼續地克服困難，為完成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奮鬥。

二 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

中國人民能不能實現我們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這要依靠中國人民的覺悟、團結和努力的程度來決定。但是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對中國人民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中國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這些條件，積極地堅決地再接再厲地向前奮鬥，戰勝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是毫無疑義的。中國人民應當加倍努力，為完成自己的神聖任務而奮鬥。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目前的國際形勢是怎樣的呢？

目前的軍事形勢是蘇軍已經攻擊柏林，英美法聯軍也正在配合打擊希特勒殘軍，意大利人民又已經發動了起義。這一切，將最後地消滅希特勒。希特勒被消滅以後，打敗日本侵略者就爲時不遠了。和中外反動派的預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勢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勢力是一定要勝利的。世界將走向進步，決不是走向反動。當然應該提起充分的警覺，估計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是嚴重的曲折，可能還會發生；許多國家中不願看見本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獲得團結、進步和解放的反動勢力，還是強大的。誰要是忽視了這些，誰就將在政治上犯錯誤。但是，歷史的總趨向已經確定，不能改變了。這種情況，僅僅不利於法西斯和實際上幫助法西斯的各國反動派，而對於一切國家的人民及其有組織的民主勢力，則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蘇聯人民創造了強大力量，充當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軍。蘇聯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國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爲可能。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

這一新形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代的形勢大不相同。在那時，還沒有蘇聯，也沒有現在許多國家的人民的覺悟程度。兩次世界大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

法西斯侵略國家被打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和平實現以後，並不是說就沒有了鬥爭。廣泛地散佈着的法西斯殘餘勢力，一定還要搗亂；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陣營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壓迫其他民族的勢力，他們仍然要壓迫各國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國際和平實現以後，反法西斯

斯的人民大眾和法西斯殘餘勢力之爭，民主和反民主之爭，民族解放和民族壓迫之爭仍將充滿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殘餘勢力、反民主勢力和一切帝國主義勢力，才能有最廣泛的人民的勝利。到達這一天，決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達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給這個戰後人民鬥爭的勝利開闢了道路。也只有這後一種鬥爭勝利了，鞏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國內形勢是怎樣的呢？

中國的長期戰爭，使中國人民付出了並且還將再付出重大的犧牲；但是同時，正是這個戰爭，鍛鍊了中國人民。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鬥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國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強大的民族敵人，而且存在着強大的實際上幫助民族敵人的國內反動勢力，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不但已經有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高的覺悟程度，而且有了強大的中國解放區和日益高漲着的全國性的民主運動。這是國內的有利條件。如果說，中國近百年來一切人民鬥爭都遭到了失敗或挫折，而這是由於缺乏國際的和國內的若干必要的條件，那末，這一次就不同了，比較以往歷次，一切必要的條件都具備了。避免失敗和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奮鬥，並給以適當的指導，我們就能夠勝利。

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打敗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信心，現在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實現其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基本要求的時機，已經到來了。這一點還有疑義嗎？我以為沒有疑

義了。

這些，就是目前國際和國內的一般形勢。

三 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綫

中國問題的關鍵

談到國內形勢，我們還應對中國抗日戰爭加以具體的分析。

中國是全世界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個最大的國家之一，是在亞洲大陸上反對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國家。中國人民不但在抗日戰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戰後世界和平上將起極大的作用，在保障東方和平上則將起決定的作用。中國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爲了自己的解放，爲了幫助各同盟國，曾經作了偉大的努力。這種努力，主要地是屬於中國人民方面的。中國軍隊的廣大官兵，在前綫流血戰鬥，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界、產業界，在後方努力工作，海外華僑輸財助戰，一切抗日政黨，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對戰爭有所盡力。總之，中國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奮戰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來，中國反動分子造作謠言，蒙蔽輿論，不使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所起作用的真相爲世人所知。同時，對於中國八年抗日戰爭的各項經驗，也還沒有人作出全面的總結來。

因此，我們的大會，應當對這些經驗作出適當的總結，藉以教育人民，並爲我黨決定政策的根據。

提到總結經驗，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國有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一條是能够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一條是不但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說來它是在實際上幫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戰爭的。

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和對內積極摧殘人民的反動政策，招致了戰爭的挫折，大部國土的淪陷，財政經濟的危機，人民的被壓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團結的破壞。這種反動政策妨礙了動員和統一一切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進行有效的戰爭，妨礙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但是，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的運動並沒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政府的雙重壓迫之下曲折地發展着。兩條路線：國民黨政府壓迫中國人民實行消極抗戰的路線和中國人民覺醒起來團結起來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綫，很久以來，就明顯地在中國存在着。這就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

走着曲折道路的歷史

爲了使大家明瞭何以這個兩條路線問題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必須回溯一下我們抗日戰爭的歷史。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佔領瀋陽，幾個月內，就把東三省佔領了。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東三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爭。這個英勇的游擊戰爭，曾經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中間經過許多困難挫折，始終沒有被敵人消滅。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進攻上海，國民黨內的一派愛國分子，又一次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率領十九路軍，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進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進攻熱河、察哈爾，國民黨內的又一派愛國分子，第三次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並和共產黨合作，組織了抗日同盟軍，從事抵抗。但是一切這些抗日戰爭，除了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其他民主派別和海外愛國華僑給了援助之外，國民黨政府根據其不抵抗政策，是沒有給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爾兩次抗日行動，都被國民黨政府一手破壞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國民黨政府破壞了。

那時的國民黨政府爲什麼採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於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破壞了國共兩黨的合作，破壞了中國人民的團結。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召集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訂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黃埔軍校，實現了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綫，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掃蕩了廣東的反動勢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舉行了勝利的北伐戰爭，佔領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大部，打敗了北洋軍閥政府，發動了

中國歷史上空前廣大的人民解放鬥爭。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當北伐戰爭向前發展的緊要關頭，這個代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綫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國民黨當局的叛賣性的反人民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所破壞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被看成了仇敵，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和封建主義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這樣，背信棄義地向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來一個突然的襲擊，生氣蓬勃的中國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從此以後，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抵抗，在中國的廣大區域內，組織了人民的政府，實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創造了人民的軍隊——中國紅軍，保存了和發展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國民黨反動分子所拋棄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由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分子繼承下來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東三省以後，中國共產黨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進攻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國民黨軍隊提議：在停止進攻、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這樣三個條件之下，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國民黨當局拒絕了這個提議。

從此以後，一方面，是國民黨政府的內戰政策越發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越發高漲。各種人民愛國組織，在上海和其他許多地方建立起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

六年，長江南北各地的紅軍主力，在我們黨中央領導之下，經歷了千辛萬苦，移到了西北，並和西北紅軍匯合在一起。就在這兩年，中國共產黨適應新的情況，決定並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綫，以團結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爲奮鬥目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羣衆，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發動了英勇的愛國運動，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一)，並把這種愛國運動推廣到了全國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黨內部主張抗日的兩派愛國分子——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聯合起來，勇敢地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對日妥協和對內屠殺的反動政策，舉行了有名的西安事變。同時，國民黨內的其他愛國分子，也不滿意國民黨當局的當時政策。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當局被迫地放棄了內戰政策，承認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在盧溝橋事變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們黨召集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全國代表會議，這個會議批准了黨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來的新的政治路綫。

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當時全國人民，我們共產黨人，其他民主黨派，都對國民黨政府寄予極大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它乘此民族艱危、人心振奮的時機，厲行民主改革，將孫中山先生的

革命三民主義付諸實施。可是，這個希望是落空了。就在這兩年，一方面，有比較積極的抗戰；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仍舊反對發動廣大民衆參加的人民戰爭，仍舊限制人民自動團結起來進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動。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對待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的態度比較過去有了一些改變；另一方面，仍舊不給各黨派以平等地位，並多方限制它們的活動。許多愛國政治犯並沒有釋放。最主要的是國民黨政府仍舊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發動內戰以來的寡頭專政制度，未能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

還在這一時期的開始，我們共產黨人就指出中國抗日戰爭的兩條路綫：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戰爭，這樣就會勝利；或者是壓迫人民的片面的戰爭，這樣就會失敗。我們又指出：戰爭將是長期的，必然要遇到許多艱難困苦；但是由於中國人民的努力，最後勝利必歸於中國人民。

人民戰爭

這一時期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國紅軍主力，改編爲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留在長江南北各地的中國紅軍游擊部隊，則改編爲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相繼開赴華北華中作戰。內戰時期的中國紅軍，保存了並發展了北伐時期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的民主傳統，曾經擴大到幾十萬人。由於國民黨政府在南方各根據地內的殘酷的摧毀、萬里長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

戰爭開始時，數量減少到只剩幾萬人。於是有些人就看不起這支軍隊，以為抗日主要地應當依靠國民黨。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鑑定人，他們知道八路軍新四軍這時數量雖小，質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進行真正的人民戰爭，它一旦開到抗日的前綫，和那裏的廣大人民相結合，其前途是無限的。人民是正確的，當我在這裏做報告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已發展到了九十一萬人，鄉村中不脫離生產的民兵發展到了二百二十萬人以上。不管現在我們的正式軍隊比起國民黨現存的軍隊來（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數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擊的日軍和偽軍的數量及其所担负的戰場的廣大說來，按其戰鬥力說來，按其有廣大的人民配合作戰說來，按其政治質量及其內部統一團結等項情況說來，它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着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着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の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的團結。在內部——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後勤工作之間；在外部——軍民之間，軍政之間，我友之間，都是團結一致的。一切妨害團結的現象，都在必須克服之列。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正確的爭取敵軍官兵和處理俘虜的政策。對於敵方投誠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後願意參加反對共同敵人的人，一概表示歡迎，並給予適當的教育。對於一切俘虜，不許殺害、虐待和侮辱。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爲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戰略戰術。它善於按照變化着的具體條件從事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爭，也善於作運動戰。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爲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務是爲團結我軍，團結友軍，團結人民，瓦解敵軍和保證戰鬥勝利而鬥爭。

在這個宗旨下面，在游擊戰爭的條件下，全軍都可以並且已經是這樣做了：利用戰鬥和訓練的間隙，從事糧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產，達到軍隊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之目的，藉以克服經濟困難，改善軍隊生活和減輕人民負擔。在各個軍事根據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許多小規模的軍事工業。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於有人民自衛軍和民兵這樣廣大的羣衆武裝組織，和它一道配合作戰。在中國解放區內，一切青年、壯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願的民主的和不脫離生產的原則下，組織在抗日人民自衛軍之中。自衛軍中的精幹分子，除加入軍隊和游擊隊者外，則組織在民兵的隊伍中。沒有這些羣衆武裝力量的配合，要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於它將自己劃分爲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兩部分，前者可以隨時執

行超地方的作戰任務，後者的任務則固定在協同民兵、自衛軍保衛地方和進攻當地敵人方面。這種劃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正確的劃分，例如說，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團的作用，忽視地方兵團的作用，那末，在中國解放區的條件下，要戰勝敵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團方面，組織了許多經過良好訓練，在軍事、政治、民運各項工作上說來都是比較地更健全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後之敵後，打擊敵人，發動民衆的抗日鬥爭，藉以配合各個解放區正面戰綫的作戰，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國解放區，在民主政府領導之下，號召一切抗日人民組織在工人的、農民的、青年的、婦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職業和工作的團體之中，熱烈地從事援助軍隊的各項工作。這些工作不但包括動員人民參加軍隊，替軍隊運輸糧食，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幫助軍隊解決物質困難，而且包括動員游擊隊、民兵和自衛軍，展開襲擊運動和爆炸運動，偵察敵情，清除奸細，運送傷兵和保護傷兵，直接幫助軍隊的作戰。同時，全解放區人民又熱烈地從事政治、經濟、文化、衛生各項建設工作。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動員全體人民從事糧食和日用品的生產，並使一切機關、學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於工作或學習之暇，從事生產自給，以配合人民和軍隊的生產自給，造成偉大的生產熱潮，藉以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在中國解放區，敵人的摧殘是異常嚴重的；水、旱、蟲災，也時常發生。但是，解放區民主政府領導全體人民，有組織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種困難，滅蝗、治水、救災的偉大羣衆運動，收到了史無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戰爭能够長期地堅持下去。總之，一切爲着前綫，一切爲着打倒日本

侵略者和解放中國人民，這就是中國解放區全體軍民的總口號、總方針。

這就是真正的人民戰爭。只有這種人民戰爭，才能戰勝民族敵人。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它拚命地反對人民戰爭。

中國解放區的軍隊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裝備，它就會更加強大，就能夠最後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了。

兩個戰場

中國的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分爲兩個戰場：國民黨戰場和解放區戰場。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後，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的進攻，逐漸地將其主要軍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區戰場；同時，針對着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情緒，聲言願意和它謀取妥協的和平，並將賣國賊汪精衛誘出重慶，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實施民族的欺騙政策。從這時起，國民黨政府開始了它的政策上的變化，將其重點由抗日逐漸轉移到反共反人民。這首先表現在軍事方面。它採取了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保存軍事實力，而把作戰的重担放在解放區戰場上，讓日寇大舉進攻解放區，它自己則『坐山觀虎鬥』。

一九三九年，國民黨政府採取了反動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將抗戰初期人民和各抗日黨

派爭得的某些權利，一概取消。從此時起，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國民黨政府將一切民主黨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將中國共產黨，打入地下。在國民黨統治區各個省份的監獄和集中營內，充滿了共產黨人、愛國青年及其他民主戰士。從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爲止的五年之內，國民黨政府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一)，分裂國內的團結，造成嚴重的內戰危險。震動中外的『解散』新四軍和殲滅皖南新四軍部隊九千餘人的事變，就是發生在這個時期內。直到現時爲止，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軍隊進攻的事件還未停止，並且看不出任何準備停止的徵象。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污蔑和謾罵，都從國民黨反動分子的嘴裏噴出來。什麼『奸黨』、『奸軍』、『奸區』，什麼『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等等污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的稱號和斷語，都是這些反動分子製造出來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針對着當時的危機，提出了這樣的口號：『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按照這些適合時宜的口號，我們黨在五年之內，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動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當時的危機。

在這幾年內，國民黨戰場實際上沒有嚴重的戰爭。日本侵略者的刀鋒，主要地向着解放區。到一九四三年，侵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爲解放區軍民所抗擊；國民黨戰場所担负的，不過日軍的百分之三十六和偽軍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舉行打通大陸交通綫的作戰了，國民黨軍隊表現了手足無措，毫無抵抗能力。幾個月內，就將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廣大區域淪於敵手。僅在此時，兩個戰場分担的抗

敵的比例，才起了一些變化。然而就在我做這個報告的時候，在侵華日軍（滿洲的未計在內）四十個師團，五十八萬人中，解放區戰場抗擊的是二十二個半師團，三十二萬人，佔了百分之五十六；國民黨戰場抗擊的，不過十七個半師團，二十六萬人，僅佔百分之四十四。抗擊僞軍的情況則完全無變化。還應指出，數達八十萬以上的僞軍（包括僞正規軍和僞地方武裝在內），大部分是國民黨將領率部投敵，或由國民黨投敵軍官所組成的。國民黨反動分子事先即供給這些僞軍以所謂『曲綫救國』的叛國謬論，事後又在精神和組織上支持他們，使他們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區。此外，則動員大批軍隊封鎖和進攻陝甘寧邊區及各解放區，其數量達到了七十九萬七千人之多。這種嚴重情形，在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政策下，很多的中國人外國人都無法知道。

中國解放區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解放區，現在有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其地域，北起內蒙，南至海南島，大部分敵人所到之處，都有八路軍、新四軍或其他人民軍隊的活動。這個廣大的中國解放區，包括十個大的解放區，其地域包括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陝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區的指導中心。在這個廣大的解放區內，黃河以西的陝甘寧邊區，只有人口一百五十萬，是十九個解放區中的

一個；而且除了浙東、瓊崖兩區之外，按其人口說來，它是一個最小的。有些人不明瞭這種情形，以爲所謂中國解放區，主要就是陝甘寧邊區。這是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造成的一個誤會。在所有這些解放區內，實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共產黨人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聯合政府。解放區內全體人民的力量都動員起來了。所有這一切，使得中國解放區在強敵壓迫之下，在國民黨軍隊的封鎖和進攻的情況之下，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能够屹立不搖，並且一天一天發展，縮小敵佔區，擴大自己的區域，成爲民主中國的模型，成爲配合同盟國作戰、驅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國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不但在對日戰爭的作戰上，起了英勇的模範的作用，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各項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範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實現而奮鬥』，這一宣言，在中國解放區是完全實踐了。

國民黨統治區

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堅持獨裁統治，實行了消極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這樣，就使得它的軍隊縮小了一半以上，並且大部分幾乎喪失了戰鬥力，使得它自己和廣大人民之間發生

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蓋起的嚴重危機，使得它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不是極大地減少了，並且變成了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礙物。

為什麼在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領導下會產生這種嚴重情況呢？因為這個集團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國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這些極少數人所形成的反動階層，壟斷着國民政府管轄之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機構。他們將保全自己少數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們也說什麼『民族至上』，但是他們的行為却不符合於民族中大多數人民的要求。他們也說什麼『國家至上』，但是他們所指的國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封建法西斯的獨裁國家，並不是人民大眾的民主國家。因此，他們懼怕人民起來，懼怕民主運動，懼怕認真地動員全民的抗日戰爭。這就是他們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對內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動政策的總根源。他們在各方面都採取這樣的兩面政策。例如：一面雖在抗日，一面又採取消極的作戰政策，並且還被日本侵略者經常選擇為誘降的對象。一面在口頭上宣稱要發展中國經濟，一面又在實際上積累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一面在口頭上宣稱實行『民主』，『還政於民』，一面又在實際上殘酷地壓迫人民的民主運動，不願實行絲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頭上宣稱『共黨問題為一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一面又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殘酷地壓迫中國共產黨，把共產黨看成他們的所謂『第一個敵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個敵人』，並且每天都在積極地準備

內戰，處心積慮地要消滅共產黨。一面在口頭上宣稱要建立一個『近代國家』，一面又在實際上拚死命保持那個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統治。一面和蘇聯在形式上保持外交關係，一面又在實際上採取仇視蘇聯的態度。一面同美國孤立派合唱『先亞後歐論』，藉以延長法西斯德國也就是延長一切法西斯的壽命，延長自己對於中國人民的法西斯統治的壽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機取巧，把自己打扮成爲反法西斯的英雄。要問如此種種的自相矛盾的兩面政策從何而來，就是來自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社會階層這一個總根源。

但是，國民黨是一個複雜的政黨。它雖被這個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反動集團所統治，所領導，却並不整個兒等於這個反動集團。它有一部分領袖人物不屬於這個集團，而且被這個集團所打擊、排斥或輕視。它有不少的幹部、黨員羣衆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羣衆並不滿意這個集團的領導，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對它的領導的。在被這個反動集團所統制的國民黨的軍隊、國民黨的政府機關、國民黨的經濟機關和國民黨的文化機關中，都存在着這種情形。在這些軍隊和機關裏，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這個反動集團，其中又分爲幾派，互相鬥爭，並不是一個嚴密的統一體。把國民黨看成清一色的反動派，無疑是很不適當的。

比 較

中國人民從中國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獲得了明顯的比較。

難道還不明顯嗎？兩條路綫，人民戰爭的路綫和反對人民戰爭的消極抗日的路綫，其結果：一條是勝利的，即使處在中國解放區這種環境惡劣和毫無外援的地位；另一條是失敗的，即使處在國民黨統治區這種極端有利和取得外國接濟的地位。

國民黨政府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缺乏武器。但是試問：缺乏武器的是國民黨的軍隊呢，還是解放區的軍隊？中國解放區的軍隊是中國軍隊中武器最缺乏的軍隊，他們只能從敵人手裏奪取武器和在最惡劣條件下自己製造武器。

國民黨中央系軍隊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軍隊來要好得多嗎？但是比起戰鬥力來，中央系却多數劣於地方系。

國民黨擁有廣大的人力資源，但是在它的錯誤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補充却極端困難。中國解放區處在被敵人分割和戰鬥頻繁的情況之下，因為普遍實施了適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衛軍制度，又防止了對於人力資源的濫用和浪費，人力動員却可以源源不竭。

國民黨擁有糧食豐富的廣大地區，人民每年供給它七千萬至一萬萬市担的糧食，但是大部分被經手人員中飽了，致使國民黨的軍隊經常缺乏糧食，士兵餓得面黃肌瘦。中國解放區的主要部分隔在敵後，遭受敵人燒殺搶『三光』政策的摧殘，其中有些是像陝北這樣貧瘠的區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動手、發展農業生產的方法，很好地解決了糧食問題。

國民黨區域經濟危機極端嚴重，工業大部分破產了，連布疋這樣的日用品也要從美國運來。中國解放區却能用發展工業的方法，自己解決布疋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國民黨區域，工人、農民、店員、公務人員、知識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達於極點。中國解放區的全體人民都有飯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鬥，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

國民黨區域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國解放區則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國民黨統治者面前擺着這些反常的狀況，怪誰呢？怪別人，還是怪他們自己呢？怪外國缺少援助，還是怪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腐敗無能呢？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是誰？

真憑實據地破壞了中國人民的抗戰和危害了中國人民的國家的，難道不正是國民黨政府嗎？這個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內戰，將刀鋒向着同胞，置一切國防事業於不顧，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東北四省。日本侵略者打進關內來了，倉皇應戰，從蘆溝橋退到了貴州省。但是國民黨人却說：『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見一九四三年九月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案）唯一的證據，就是

共產黨聯合了各界人民創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國解放區。這些國民黨人的邏輯，和中國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相同，無怪乎很多問題都講不通了。

兩個問題：

第一個，究竟什麼原因使得國民黨政府拋棄了從黑龍江到蘆溝橋，又從蘆溝橋到貴州省這樣廣大的國土和這樣衆多的人民？難道不是由於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極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嗎？

第二個，究竟什麼原因使得中國解放區戰勝了敵僞軍長期的殘酷的進攻，從民族敵人手裏恢復了這樣廣大的國土，解放了這樣衆多的人民？難道不是由於人民戰爭的正確路線嗎？

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

國民黨政府還經常以『不服從政令、軍令』責備中國共產黨。但是我們只能這樣說：幸喜中國共產黨人還保存了中國人民的普通常識，沒有服從那些實際上是把中國人民艱難困苦地從日本侵略者手裏奪回來的中國解放區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這種所謂『政令、軍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謂『解散新四軍』和『退至舊黃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謂『解散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四年的所謂『限期取消十個師以外的全部軍隊』，以及在最近談判中提出來的所

謂將軍隊和地方政府移交給國民黨，其交換條件是不許成立聯合政府，只許收容幾個共產黨員到國民黨獨裁政府裏去做官，並將這種辦法稱之爲國民黨政府的『讓步』等等。幸喜我們沒有服從這些東西，替中國人民保存了一片乾淨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軍隊。難道中國人民不應該慶賀這一個『不服從』嗎？難道國民黨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義的政令和失敗主義的軍令，將黑龍江至貴州省的廣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還覺得不夠嗎？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動派歡迎這些『政令、軍令』之外，難道還有什麼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歡迎這些東西嗎？沒有一個不是形式的而是實際的、不是法西斯獨裁的而是民主的聯合政府，能够設想中國人民會允許中國共產黨人，擅自將這個獲得了解放的中國解放區和抗日有功的人民軍隊，交給失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法西斯獨裁政府嗎？假如沒有中國解放區及其軍隊，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還有今日嗎？我們民族的前途還能設想嗎？

內戰危險

迄今爲止，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堅持着獨裁和內戰的反動方針。有很多跡象表明，他們早已準備，尤其現在正在準備這樣的行動：等候某一個同盟國的軍隊在中國大陸上驅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時，他們就要發動內戰。他們並且希望某些同盟國的將領們在中國境內執行英國斯科比

將軍在希臘所執行的職務。他們對於斯科比和希臘反動政府的屠殺事業，表示歡呼。他們企圖把中國拋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國內戰爭的大海裏去。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現在正在所謂『召開國民大會』和『政治解決』的煙幕之下，偷偷摸摸地進行其內戰的準備工作。如果國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陰謀，阻止它的準備，那末，會有一個早上，要聽到內戰的砲聲的。

談 判

爲着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爲着防止內戰，中國共產黨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別的同意之後，於一九四四年九月間的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了立即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一項要求。無疑地，這項要求是適合時宜的，幾個月內，獲得了廣大人民的響應。

關於如何廢止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以及實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項問題，我們和國民黨政府之間曾經有過多次談判，但是我們的一切建議都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拒絕。國民黨不但對一黨專政不願廢止，對聯合政府不願成立，即對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務機關，取消鎮壓人民自由的反動法令，釋放政治犯，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承認解放區，撤退封鎖和進攻解放區的軍隊等等，也一項不願實行。就是這樣，使得中國的政治關係處在非常嚴重的局面之下。

兩個前途

從整個形勢看來，從上述一切國際國內的實際情況的分析看來，我請大家注意，不要以為我們的事業，一切都將是順利的，美妙的。不，不是這樣，事實是好壞兩個可能性，好壞兩個前途都存在着。繼續法西斯獨裁統治，不許民主改革，不是將重點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了，中國仍然可能發生內戰，將中國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强的老狀態裏去，這是一個可能性，這是一個前途。這個可能性，這個前途，依然存在，並不因為國際形勢好，國內人民覺悟程度增長和有組織的人民力量發展了，它就似乎沒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在外國是那些懷抱帝國主義思想的反動分子。這是一方面，這是必須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樣是從整個形勢看來，從上述一切內外情況的分析看來，使我們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氣地去爭取第二個可能性，第二個前途。這就是克服一切困難，團結全國人民，廢止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改革，鞏固和擴大抗日力量，澈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將中國建設成爲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强的新國家。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廣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派別，在外國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國的進步分子，外

國的人民大眾。

我們清楚地懂得，在我們和中國人民面前，還有很大的困難，還有很多的障礙物，還要走很多的迂迴路程。但是我們同樣地懂得，任何困難和障礙物，我們和全國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國的歷史任務獲得完成。竭盡全力地去反對第一個可能性，爭取第二個可能性，反對第一個前途，爭取第二個前途，是我們和全國人民的偉大任務。國際國內形勢的主要方面，是有利於我們和全國人民的。這些，我在前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鑒於世界大勢之所趨，中國人心之所向，毅然改變其錯誤的現行政策，使抗日戰爭獲得勝利，使中國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國早日誕生。須知不論怎樣迂迴曲折，中國人民獨立解放的任務總是要完成的，而且這種時機已經到來了。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所懷抱的宏大志願，一定要由我們這一代人去實現，誰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四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上面，我已將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綫，給了一個分析。這樣的一個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在廣大的中國人中間，至今還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具體情況。在國民黨統治區，在國外，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聞記者參觀團來到中國解放區以前，那裏的許多人對於解放區幾乎是什麼也不知道的。國民黨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區的真實

情況洩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聞記者團回去之後，立即將大門堵上，不許一個新聞記者再來解放區。對於國民黨區域的真相，國民黨政府也是同樣地加以封鎖。因此，我感到我們有責任將『兩個區域』的真相盡可能使人們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國的全部情況之後，才有可能了解中國的兩個最大政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政策何以有這樣的不同，何以有這樣的兩條路綫之爭。只有這樣，才會使人們了解，兩黨的爭論，不是如有些人們所說不過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氣用事的爭論，而是關係着幾萬萬人民生死問題的原則的爭論。

在目前中國時局的嚴重形勢下，中國人民，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分子，一切關心中國時局的外國人民，都希望中國的分裂局面重趨於團結，都希望中國能實行民主改革，都願意知道中國共產黨對於解決當前許多重大問題上所持的政策。我們的黨員對於這些，當然更加關心。

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歷來是明確的，八年的戰爭考驗了這些政策。我們的大會應該對此作出結論，作為今後奮鬥的指針。

下面，我就來說明我們黨在為解決中國問題而得出的關於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確定的結論。

我們的一般綱領

為着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並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

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迫切地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

這種共同綱領，可以分爲一般性的和具體性的兩部分。我們先來說一般性的綱領，然後再說到具體性的綱領。

在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國的現階段，我們共產黨人在這樣一個基本點上是和中國人口中的最大多數相一致的。這就是說：第一，中國的國家制度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制度，因爲這種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十八年統治證明爲完全破產了。第二，中國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因爲在中國，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表現得很軟弱；另一方面，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表現了強大能力的，領導了廣大的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領袖——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新條件。第三，在中國的現階段，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

那末，我們的主張是什麼呢？我們主張在澈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爲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爲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制度，因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業工人和僱傭農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億五千萬人口中佔了三億六千萬的農民階級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及其他愛國分子的同意。

自然，這些階級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勞資之間的矛盾，就是顯著的一種；因此，這些階級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殺這種矛盾，抹殺這種不同要求，是虛偽的和錯誤的。但是，這種矛盾，這種不同的要求，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上，不會也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這種矛盾和這種不同的要求，可以獲得調節。在這種調節下，這些階級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項建設。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並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後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綫的政治制度。我們的這種主張，是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完全一致的。孫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孫先生的偉大的政治指示。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須尊重這個指示而堅決地實行之，並同一切違背和反對這個指示的任何人們和任何集團作堅決的鬥爭，藉以

保護和發揚這個完全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

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採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託的一切事務，並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軍隊和其他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他權力機關一樣，是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它們和一切屬於少數人、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舊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於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裏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於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

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着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着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着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

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够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够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按照孫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爲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爲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在現階段上，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所主張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說來，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 and 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這個綱領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這個綱領的實行，還沒有使中國成爲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

心目中就懸着爲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爲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對於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於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爲着現階段的目標而奮鬥，爲着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爲着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爲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鬥。我們果然是這樣做了，我們共產黨人，協同廣大的中國人民，曾爲此而英勇奮鬥了二十四年。

對於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爲這個目標奮鬥，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鬆，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爲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

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爲什麼不但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麼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麼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於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民衆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任何的空談和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似乎不

是忠誠的。這是由於不了解我們所承認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我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裏的若干基本原則，是互相一致的。應當指出，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和我黨在現階段上的綱領，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東西，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比之孫先生的，當然要完備得多；特別是孫先生死後這二十年中中國革命的發展，使我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其實踐，有了一個極大的發展，今後還將有更大的發展。但是，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按其基本性質說來，是一個和在此以前的舊三民主義相區別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當然這是『中國今日之必需』，當然『本黨願為其澈底實現而奮鬥』。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為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鬥和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鬥，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並不是兩件事情。因此，不但在過去和現在已經證明，而且在將來還要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三民主義的最忠誠最澈底的實現者。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覆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採取合作的而不是採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俄國的歷史形成了俄國的制度，在那裏，廢除了人剝

創人的社會制度，實現了最新式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被人民拋棄了，人民僅僅擁護布爾塞維克黨，因此形成了俄國的局面，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國的政權機關中，即使是處在除了布爾塞維克黨以外沒有其他政黨的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或黨和非黨聯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階級或只有布爾塞維克黨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

我們的具體綱領

根據上述一般綱領，我們黨在各個時期中還應當有具體的綱領。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在幾十年中，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是不變的。但是在這個大階段的各個小的階段中，情形是變化了和變化着的，我們的具體綱領便不能不有所改變，這是當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戰爭時期，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並沒有變化，但其具體綱領，三個時期中是有了變化的，這是因為我們的敵軍和友軍在三個時期中發生了變化的緣故。

目前中國人民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中：（一）日本侵略者還未被打敗；（二）中國人民迫切地需要國

結起來，實現一個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團結，迅速地動員和統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三）國民黨政府分裂民族團結，阻礙這種民主的改革。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具體綱領即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是什麼呢？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要求是適當的，並且是最低限度的。

動員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國，澈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並建立國際和平；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要求懲辦那些分裂民族團結和反對人民的親日分子、法西斯主義分子和失敗主義分子，造成民族團結；要求懲辦那些製造內戰危機的反動分子，保障國內和平；要求懲辦漢奸，討伐降敵軍官，懲辦日本間諜；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反動的特務機關和特務活動，取消集中營；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要求承認一切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圍和進攻中國解放區的軍隊，並將這些軍隊使用於抗日前綫；要求承認中國解放區的一切抗日軍隊和民選政府；要求鞏固和擴大解放區及其軍隊，收復一切失地；要求幫助淪陷區人民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要求允許中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保鄉衛國；要求從政治上軍事上改造那些由國民黨統帥部直接領導的經常打敗仗、經常壓迫人民和經常排斥異己的軍隊，懲辦那些應對潰敗負責的將領；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優待抗日軍人家屬，使前綫官兵安心作戰；要求優待殉國戰士的遺族，優待殘廢軍人，幫助退伍軍人解決生活和就業問題；要求發展

軍事工業，以利作戰；要求將同盟國的武器和財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給抗戰各軍；要求懲辦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級公務員的待遇；要求給予中國人民以民主的權利；要求取消壓迫人民的保甲制度⁽⁵⁾；要求救濟難民和救濟災荒；要求設立大量的救濟基金，在國土收復後，廣泛地救濟淪陷區的受難人民；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證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並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農業生產；要求取締官僚資本；要求廢止現行的經濟統制政策；要求制止無限制的通貨膨脹和無限制的物價高漲；要求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和推銷產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並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工業生產；要求取消國民黨的黨化教育⁽⁶⁾，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要求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救濟失學青年，並使青年、婦女組織起來，以平等地位參加有益於抗日戰爭和社會進步的各項工作，實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兒童得到有益的學習；要求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要求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的華僑；要求保護因被日本侵略者壓迫而逃來中國的外國人民，並扶助其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要求改善中蘇邦交；等等。而要做到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要想在全國範圍內，就是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進行稍爲認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這些都是中國廣大人民的呼聲，也是各同盟國廣大民主輿論界的呼聲。

一個爲各個抗日民主黨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體綱領，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準備以上述綱領爲基礎和他們進行協商。各黨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黨之間應該協定一個共同的綱領。

這樣的綱領，對於國民黨統治區，暫時還是一個要求的綱領；對於淪陷區，除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項外，是一個要等到收復後才能實施的綱領；對於解放區，則是一個早已實施並應當繼續實施的綱領。

在上述中國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體綱領中，包含着許多戰時和戰後的重大問題，需要在下面加以說明。在說明這些問題時，我們將批評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一些錯誤觀點，同時也將回答其他人們的一些疑問。

第一 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

開羅會議已決定應使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這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裏進行活動，企圖獲得妥協的和平；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分子，經過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搭搭，並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協的危險並未完全過去。開羅會議又決定將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這是很好的。但是根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民應該怎麼辦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澈底

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一切妥協的陰謀活動，必須立刻制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現在的消極的抗日政策，將其一切軍事力量用於積極對日作戰。中國人民應該擴大自己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並在一切敵人所到之處，廣泛地自動地發展抗日武裝，準備直接配合同盟國作戰，收復一切失地，決不要單純地依靠國民黨。打敗日本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神聖的權利。如果反動分子要想剝奪中國人民的這種神聖的權利，要想壓制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要想破壞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國人民在向他們勸說無效之後，應該站在自衛立場上給以堅決的回擊。因為中國反動分子的這種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動行為，完全是幫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爲着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它是中國民族團結的破壞者，是國民黨戰場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礙物。從八年抗日戰爭的慘痛經驗中，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認識了它的罪惡，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廢止它。這個反人民的專政，又是內戰的禍胎，如不立即廢止，內戰慘禍又將降臨。

中國人民要求廢止這個反人民專政的呼聲是如此普遍而響亮了，使得國民黨當局自己也不能不

公開承認『提早結束訓政』，可見這個所謂『訓政』或『一黨專政』的喪失人心，威信掃地，到了何種地步了。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一黨專政』有什麼好處，不應該廢止或『結束』了，這是當前時局的一大變化。

應該『結束』是確定的了，毫無疑義的了。但是如何結束呢，可就意見分歧了。一個說：立即結束，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一個說：等一會再結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却不能還政於聯合政府。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兩種做法的表現：真做和假做。

第一種，真做。這就是立即宣佈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發佈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如同我們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以便恢復民族團結，打敗日本侵略者。爲着討論這些事情，召集一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動手去做。這是一個團結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擁護這個方針的。

第二種，假做。不顧廣大人民和一切民主黨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開一個由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在這個會上通過一個實際上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所謂『憲法』，使那個僅僅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安在人民頭上的、不合法的所謂國民政

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裝模作樣地『還政於民』，實際上，依然是『還政』於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誰要不贊成，就說他是破壞『民主』，破壞『統一』，就有『理由』向他宣佈討伐令。這是一個分裂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這個方針的。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採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並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制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可是，歷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因為現在誰也明白，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人民沒有自由，在日寇佔領區域，人民不能參加選舉，有了自由的中國解放區，國民黨政府又不承認它，在這種情況下，那裏來的國民代表？那裏來的『國民大會』？現在叫着要開的，是那個還在內戰時期，還在八年以前，由國民黨獨裁政府一手偽造的所謂國民大會。如果這個會開成了，勢必鬧到全國人民羣起反對，請問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如何下台？歸根結底，偽造國民大會如果開成了，不過將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

我們共產黨人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總之，都是聯合政府，團結一切願意參加的階級和政黨的代表在一起，在一個民主的共同綱領之下，為現在的抗日和將來的建國而奮鬥。

不管國民黨人或任何其他黨派、集團和個人如何設想，願意或不願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國只能走這條路。這是一個歷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

在這個問題和其他任何有關民主改革的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聲明：不管國民黨當局現在還是怎樣堅持其錯誤政策和怎樣借談判爲拖延時間、搪塞輿論的手段，只要他們一旦願意放棄其錯誤的現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們是願意和他們恢復談判的。但是談判的基礎必須放在抗日、團結和民主的總方針上，一切離開這個總方針的所謂辦法、方案，或其他空話，不管它怎樣說得好聽，我們是不能贊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國人民爭自由的目標，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國民黨政府剝奪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們不能反對日本侵略者。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在全國範圍內動員和統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們在綱領中提出了廢止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取消特務，取消鎮壓自由的法令，懲辦漢奸、間諜、親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貪官污吏，釋放政治犯，承認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圍和進攻解放區的軍隊，承認解放區，廢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許多經濟的文化的和民衆運動的要求，就是爲着解開套在人民身上的繩索，使人民獲得抗日、團結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麼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

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中國人民爭得的自由越多，有組織的民主力量越大，一個統一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這種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鞏固聯合政府的基礎。然後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後，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產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一的正式的聯合政府。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難道還不清楚麼？

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澈底地實現了。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在其臨終的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背叛孫先生的不肖子孫，不是喚起民眾，而是壓迫民眾，將民眾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權利剝奪得乾乾淨淨；對於認真喚起民眾、認真保護民眾自由權利的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則稱之爲『奸黨』、『奸軍』、『奸區』。我們希望這種顛倒是非的時代快些過去。如果要延長這種顛倒是非的時間，中國人民將不能忍耐了。

第四 人民的統一

爲着消滅日本侵略者，爲着防止內戰，爲着建設新中國，必須將分裂的中國變爲統一的中國，這

是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

但是如何統一呢？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還是人民的民主的統一呢？從袁世凱以來，北洋軍閥強調專制的統一。但是結果怎麼樣呢？和這些軍閥的志願相反，所得的不是統一而是分裂，最後是他們自己從台上滾下去。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抄襲袁世凱的老路，追求專制的統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內戰，結果把一個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自己也縮上了峨嵋山⁽⁵⁾。現在又在山上大叫其專制統一論，這是叫給誰聽呢？難道還有什麼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願意聽它麼？經過了十六年的北洋軍閥的統治，又經過了十八年的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人民已經有了充分的經驗，有了明亮的眼睛。他們要一個人民大眾的民主的統一，不要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我們共產黨人還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沒有一天不爲此而奮鬥。一九三九年國民黨推行其反動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機，國民黨人大叫其專制統一論的時候，我們又說：非統一於投降而統一於抗戰，非統一於分裂而統一於團結，非統一於倒退而統一於進步。只有這後一種統一才是真統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統一⁽⁶⁾。又過了六年了，問題還是一樣。

沒有人民的自由，沒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統一麼？有了這些，立刻就統一了。中國人民爭自由，爭民主，爭聯合政府的運動，同時就是爭統一的運動。我們在具體綱領中提出了許多爭自由爭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聯合政府的要求，同時就是爲了這個目的。不廢止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不但在國民黨統治區不能實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動員那裏的全體軍民打倒

日本侵略者，而且還將發展爲內戰的慘禍，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識了。爲什麼如此衆多的有黨有派無黨無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國民黨內的許多民主分子在內，一致要求成立聯合政府？就因爲他們看清楚了時局的危機，非如此不能克服這種危機，不能達到團結對敵和團結建國的目的。

第五 人民的軍隊

中國人民要自由，要統一，要聯合政府，要徹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沒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場上的軍隊，那是不行的。澈底地站在人民立場的軍隊，現在還只有解放區的不很大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還很不够。可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却處心積慮地要破壞和消滅解放區的軍隊。一九四四年，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一個所謂『提示案』，叫共產黨『限期取消』解放區軍隊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談判，又叫共產黨將解放區軍隊全部交給它，然後它給共產黨以『合法地位』。

這些人們向共產黨人說：你交出軍隊，我給你自由。根據這個學說，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只有很少一點軍隊，國民黨政府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一來，自由也光了。現在的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國民黨的民主分子並沒有軍隊，同時也沒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工人、農民、學生以及一切要求進步的文化界、教育界、產業界，他們一概沒有軍隊，同時也一概沒有自由。難道是由於上述這些民主黨派和人民組織了什麼軍隊，實行了什麼『封建割據』，成立了什麼『奸區』，違反了什麼『政令軍令』，因此才不給自由的麼？

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們沒有這樣做。

『軍隊是國家的』，非常之正確，世界上沒有一個軍隊不是屬於國家的。但是什麼國家呢？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的國家，還是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國只應該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並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中國的一切軍隊都應該屬於這個國家的這個政府，藉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對外國侵略者。什麼時候中國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出現了，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將立即交給它。但是一切國民黨的軍隊也必須同時交給它。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說：『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²⁾八路軍、新四軍正是因為實行了這種方針，成了『國民之武力』，就是說，成了人民的軍隊，所以能打勝仗。國民黨軍隊在北伐戰爭的前期，做到了孫先生所說的『第一步』，所以打了勝仗。從北伐戰爭後期直至現在，連『第一步』也丟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上，所以一天一天腐敗墮落，除了『內戰內行』之外，對於『外戰』，就不能不是一個『外行』。國民黨軍隊中一切愛國的有良心的軍官們，應該起來恢復孫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軍隊。

在改造舊軍隊的工作中，對於一切可以教育的軍官，應當給予適當的教育，幫助他們學得正確觀點，清除陳舊觀點，為人民的軍隊而繼續服務。

為創造中國人民的軍隊而奮鬥，是全國人民的責任。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於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

我們共產黨人願意贊助改革中國軍隊的事業。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一切願意團結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對中國解放區的軍隊，都應該看作自己的友軍，給以適當的協助。

第六 土地問題

爲着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實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農民。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時代的正確的主張。

爲什麼把目前時代的革命叫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就是說，這個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這個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這個革命的結果，將使工人階級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導中國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使資本主義獲得適當的發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裏轉移到農民手裏，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爲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並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並不單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所不同的，在中國條件下，只有我們共產黨人把這項主張看得特別認真，不但口講，而且實做。那些人們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農民的絕對大多數，就是說，除開那些帶上了封建尾巴的富農之外，無不積極地要求

『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農業生產力獲得發展，對於他們是有利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需要市場，他們也贊成『耕者有其田』；他們又多半和土地聯繫着，他們中的許多人就又懼怕『耕者有其田』。孫中山是中國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鄉村農民，實行武裝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權的時候並沒有主動地實行過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掌握政權以後，便完全背叛了孫中山的主張。現在堅決地反對『耕者有其田』的，正是這個反人民集團，因為他們是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中國沒有單獨代表農民的政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沒有堅決的土地綱領，因此，只有制訂和執行了堅決的土地綱領，為農民利益而認真奮鬥，因而獲得最廣大農民羣衆作為自己偉大同盟軍的中國共產黨，成了農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領導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實行了徹底改革土地制度的辦法，實現了孫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出而張牙舞爪，進行了十年反人民戰爭，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戰爭的，就是那個集中了孫中山一切不肖子孫在內的團體——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

抗日期間，中國共產黨讓了一大步，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個讓步是正確的，推動了國民黨參加抗日，又使解放區的地主減少其對於我們發動農民抗日的阻力。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後繼續實行下去，首先在全國範圍內實現減租減息，然後採取

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孫先生的人們不但反對『耕者有其田』，連減租減息也反對。國民黨政府自己頒佈的『二五減租』二類的法令，自己不實行，僅僅我們在解放區實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狀：名之曰『奸區』。在抗日期間，出現了所謂民族革命階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階段的兩階段論，這是錯誤的。

大敵當前，民主民生改革的問題不應該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這是國民黨反人民集團的謬論，其目的是不願抗日戰爭獲得徹底勝利。有些人居然隨聲附和，作了這種謬論的尾巴。

大敵當前，不解決民主民生問題，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據地抵抗日本的進攻。——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並且已經這樣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間，減租減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爲着抗日的。爲了減少地主對於抗日的阻力，只實行減租減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同時又獎勵地主的資財向工業方面轉移，並使開明士紳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參加抗日的社會工作和政府工作。對於富農，則鼓勵其發展生產。所有這些，是在堅決執行農村民主改革的路綫裏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兩條路綫：或者堅決反對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腐敗無能，無力抗日；或者堅決贊助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獲得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偉大的同盟軍，藉以組織雄厚的戰鬥力量。前者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路綫，後者就是中國解放區的路綫。

動搖於兩者之間，口稱贊助農民，但不堅決實行減租減息、武裝農民和建立農村民主政權，這是

機會主義者的路綫。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動員一切力量，向着中國共產黨放出了一切惡毒的箭：明的和暗的，軍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兩黨的爭論，就其社會性質說來，實質上是在農村關係的問題上。我們究竟在那一點上觸怒了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呢？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嗎？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歡迎和鼓勵，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給日本侵略者幫了大忙嗎？所謂『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所謂『奸黨』、『奸軍』、『奸區』，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難道不正是在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做了真正符合於民族利益的認真的事業嗎？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够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並吸收大量的工業品。

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億六千萬農民羣衆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衆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忽視其他約佔人口九千萬的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視在政治上最覺悟因而具有領導整個革命運動的資格的工人階級，這是不應該發生誤會的。

認識這一切，不但中國共產黨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獲得改革，甚至僅獲得初步的改革，例如減租減息之後，農民的生產興趣就增加了。然後幫助農民在自願原則下，逐漸地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產力就會發展起來。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現時還只能是建立在農民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的互助的勞動組織，例如變工隊、互助組、換工班之類，但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量的增加，已屬驚人。這種制度，已在中國解放區大大發展起來，今後應當盡量推廣。

這裏應當指出一點，就是說，變工隊一類的合作組織，原來在農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時，不過是農民救濟自己悲慘生活的一種方法。現在中國解放區的變工隊，其形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它成了農民羣衆爲着發展自己的生產，爭取富裕生活的一種方法。

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

這裏還要指出一點，就是說，從城市到農村工作的知識分子，不容易了解農村現時還是以分散的

落後的個體經濟爲基礎的這種特點；在解放區，則還要加上暫時還是被敵人分割的和游擊戰爭的環境的特點。因爲不了解這些特點，他們就往往不適當地帶着他們在城市裏生活或工作的觀點去觀察農村問題，去處理農村工作，因而脫離農村的實際情況，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這種現象，必須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國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應該覺悟到將自己和農民結合起來的必要。農民正需要他們，等待他們的援助。他們應該熱情地跑到農村中去，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裏了解農民的要求，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爲着完成中國民主革命中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即農村民主革命而奮鬥。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以後，對於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漢奸分子的土地應當沒收，並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

第七 工業問題

爲着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但是，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一切依賴外國，它的財政經濟政策是破壞人民的一切經濟生活的。國民黨統治區內僅有的一點小型工業，也不能不處於大部分破產的狀態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產力都遭到破壞的命運，農業如此，工業也是如此。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消滅日本侵略者，這

是謀獨立。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統一的聯合政府，使全國軍隊成爲人民的武力，實現土地改革，解放農民，這是謀自由、民主和統一。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零五年的歷史，特別是國民黨當政以來的十八年的歷史，清楚地把這個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裏，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和學生們，他們埋頭於自己的工作或學習，不問政治，自以爲可以所學爲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學得了許多東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後，有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必要，而這些條件是互相關聯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國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這一點，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

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爲工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佔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

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

我們共產黨人願意協同全國各民主黨派，各部分產業界，爲上述目標而奮鬥。中國工人階級在這個任務中將起偉大的作用。

中國工人階級，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以自覺的姿態，爲中國的獨立、解放而鬥爭。一九二一年，產生了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使中國的解放鬥爭進入了新階段。在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三個時期中，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了極大的努力和極有價值的貢獻。在最後打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特別是在收復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鬥爭中，中國工人階級將起着極大的作用。在抗日結束以後，可以預斷，中國工人階級的努力和貢獻將會是更大的。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爲着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爲着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鬥爭。

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將採取調節勞資間利害關係的政策。一方面，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的不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制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保障工會的權利；另一方面，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的贏利，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爲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

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後，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漢奸分子的企業和財產，應當沒收，歸政府處理。

第八 文化、教育、知識分子問題

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給予中國人民的災難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災難。特別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文化事業和教育事業，進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災難，更爲深重。爲着掃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爲着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們必須具有爲人民服務的精神，從事艱苦的工作。一切知識分子，只要是在爲人民服務的工作中著有成績的，應受到尊重，把他們看作國家和社會的寶貴的財富。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後的國家，中國的人民解放鬥爭迫切地需要知識分子，因而知識分子問題就特別顯得重要。而在過去半世紀的人民解放鬥爭，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的鬥爭中，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廣大革命知識分子對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後的鬥爭中，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後人民的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幹部，並注意團結和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

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和教育，應當採取適當的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

對於舊文化工作者、舊教育工作者和舊醫生們的態度，是採取適當的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

新觀點、新方法，爲人民服務。

中國國民文化和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爲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爲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爲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範例。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

第九 少數民族問題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否認中國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稱之爲『宗族』(種)。他們對於各少數民族，完全繼承滿清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政策，壓迫剝削，無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對於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殺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現在對於新疆少數民族的武力鎮壓事件，以及近幾年對於甘肅回民的屠殺事件，就是明證。這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的民族思想和錯誤的民族政策。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

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意上述孫先生的民族政策。共產黨人必須積極地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羣衆爲實現這個政策而奮鬥；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羣衆，包括一切聯繫羣衆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並成立維護羣衆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

多年以來，陝甘寧邊區和華北各解放區對待蒙回兩民族的態度是正確的，其工作是有成績的。

第十 外交問題

中國共產黨同意大西洋憲章和莫斯科、開羅、德黑蘭、克里米亞各次國際會議^(二)的決議，因為這些國際會議的決議都是有利於打敗法西斯侵略者和維持世界和平的。

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澈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並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係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

中國共產黨對於保障戰後國際和平安全的機構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頓橡樹林會議所作的建議和克里米亞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歡迎舊金山聯合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已經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出席舊金山會議，藉以表達中國人民的意志^(三)。

我們認為國民黨政府必須停止對於蘇聯的仇視態度，迅速地改善中蘇邦交。蘇聯是第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並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國家。在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召集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和在其後進行北伐戰爭時，蘇聯是當時唯一援助中國解放戰爭的國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後，蘇聯又是第一個援助中國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國家。中國人民對於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的這些援助，表示感謝。我們認為太平洋問題的最後的徹底的解決，沒有蘇聯參加是不可能的。

我們要求各同盟國政府，首先是美英兩國政府，對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因而損害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我們認為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

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佈廢除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並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措施。但是，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並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

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爲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否則便只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就是說，依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決不會使中國獲得真正的獨立和平等。

我們認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並無條件投降之後，爲着徹底消滅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及其所由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必須幫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沒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澈底地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便不能保證太平洋的

和平。

我們認為開羅會議關於朝鮮獨立的決定是正確的，中國人民應當幫助朝鮮人民獲得解放。

我們希望印度獨立。因為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對於南洋各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我們希望這些國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後，能夠得到建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制度的權利。對於泰國，應當仿照對待歐洲法西斯附屬國的方法去處理。

*

*

*

關於具體綱領的說明，主要的就是這樣。

再說一遍，一切這些具體綱領，如果沒有一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就不可能順利地在全中國實現。

中國共產黨在其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二十四年中，創造了這樣的地位，就是說，不論什麼政黨或社會集團，也不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在有關中國的問題上，如果採取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的意見的態度，那是極其錯誤而且必然要失敗的。過去和現在都有這樣的人，企圖孤行己見，不尊重我們的意見，但是結果都行不通。這是什麼緣故呢？不是別的，就是因為我們的意見，符合於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誰要是不尊重中國共產黨，誰就是在實際上不尊重最廣大的中國人民，誰就一定要失敗。

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的任務

關於我黨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我已在上面作了充分的說明。無疑地，這些綱領是要在全中國實行的；整個國際國內的形勢，給中國人民展開了這種期望。但是，目前在國民黨統治區，在淪陷區，在解放區，這三種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勢，不能不使我們在實行時要有所區別。不同的情形，產生不同的任務。這些任務，有些我已經在前面說到了，有些還須在下面加以補充。

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沒有愛國活動的自由，民主運動被認為非法，但是包括許多階層、許多民主黨派和民主分子的積極活動是在發展中。中國民主同盟，在今年一月發表了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和成立聯合政府的宣言。社會各界發表同類性質的宣言的，還有許多。國民黨內也有許多人，對於他們自己的領導機關的政策，日益表示懷疑和不滿，日益感覺他們的黨在廣大人民中孤立起來的危險性，而要求有一種適合時宜的民主的改革。重慶等地的工人、農民、文化界、學生界、教育界、婦女界、工商界、公務人員乃至一部分軍人的民主運動，正在發展。所有這些，預示着一切受壓迫階層的民主運動正在逐漸地向着同一的目標而匯合起來。目前運動的弱點，在於社會的基層分子還沒有廣泛地參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農民、工人、士兵和下層公教人員，還沒有組織起來。目前運動的另一弱點，是參加運動的民主分子中，還有許多人對於根據民主原則發動鬥爭以求轉變

時局這一個基本方針，還缺乏明確的和堅決的精神。但是客觀形勢，正在迫着一切受壓迫的階層、黨派和社會集團，逐漸地覺悟和團結起來。不管國民黨政府如何鎮壓，也不能阻止這一運動的發展。

國民黨統治區內被壓迫的一切階層、黨派和集團的民主運動，應當有一個廣大的發展，並把分散的力量逐漸統一起來，爲着實現民族團結，建立聯合政府，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而鬥爭。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應當給予他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國民黨統治區，共產黨人應當繼續執行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不管什麼人，那怕昨天還是反對我們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對了，就應該同他合作，爲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中國淪陷區的任務

在淪陷區，共產黨人應當號召一切抗日人民，學習法國和意大利的榜樣，將自己組織於各種團體中，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俟時機成熟，配合從外部進攻的軍隊，裏應外合地消滅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對於我淪陷區內的兄弟姊妹們的摧殘、掠奪、姦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國人的火一樣的憤怒，報仇雪恥的時機快要到來了。淪陷區的人民，在歐洲戰場的勝利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勝利的鼓舞之下，極大地增高了他們的抗日情緒。他們迫切地需要組織起來，以便盡可能迅速地獲得解放。因此，我們必須將淪陷區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區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須有大批

工作人員到淪陷區去工作。必須就淪陷區人民中訓練和提拔大批的積極分子，參加當地的工作。在淪陷區中，東北四省淪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產業中心和屯兵要地，我們應當加緊那裏的地下工作。對於流亡到關內的東北人民，應當加緊團結他們，準備收復失地。

在一切淪陷區，共產黨人應當執行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不管什麼人，只要是反對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的，就要聯合起來，爲打倒共同敵人而鬥爭。

應當向一切幫助敵人反對同胞的僞軍僞警及其他人員提出警告：他們必須趕快認識自己的罪惡行爲，及時回頭，幫助同胞反對敵人，藉以贖回自己的罪惡。否則，敵人崩潰之日，民族紀律是不會寬容他們的。

共產黨人應當向一切有羣衆的僞組織進行爭取說服工作，使被欺騙的羣衆站到反對民族敵人的戰綫上來。同時，對於那些罪大惡極不顧改悔的漢奸分子進行調查工作，以便在國土收復之後，依法懲治他們。

對於國民黨內組織漢奸反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的背叛民族的反動分子，必須向他們提出警告，叫他們早日悔罪。否則，在國土收復之後，必然要將他們和漢奸一體治罪，決不寬饒。

中國解放區的任務

我黨的全部新民主主義的綱領已經在解放區實行了並且有了顯著的成績，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後應當從各方面發展和鞏固這種力量。

在目前條件下，解放區的軍隊應向一切被敵偽佔領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發動廣泛的進攻，藉以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但是同時應當注意，敵人在目前還是有力量的，它還可能向解放區發動進攻。解放區軍民必須隨時準備粉碎敵人的進攻，並注意解放區的各項鞏固工作。

應當擴大解放區的軍隊、游擊隊、民兵和自衛軍，並加緊整訓，增強戰鬥力，為最後打敗侵略者準備充分的力量。

在解放區，一方面，軍隊應實行擁政愛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應領導人民實行擁軍優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軍民關係。

共產黨人在各個地方性的聯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會工作中，應當繼續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義綱領的基礎上，進行很好的合作。

同樣，在軍事工作中，共產黨人應當同一切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區軍隊的內

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

爲了提高工農勞動羣衆在抗日和生產中的積極性，減租減息和改善工人、職員待遇的政策，必須充分地執行。解放區的工作人員，必須努力學會做經濟工作。必須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規模地發展解放區的農業、工業和貿易，改善軍民生活。爲此目的，必須實行勞動競賽，獎勵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在城市驅逐日本侵略者以後，我們的工作人員，必須迅速學會做城市的經濟工作。

爲着提高解放區人民大衆首先是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羣衆的覺悟程度和培養大批工作幹部，必須發展解放區的文化教育事業。解放區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進他們的工作時，應當根據目前的農村特點，根據農村人民的需要和自願的原則，採用適宜的內容和形式。

在推進解放區的各項工作時，必須十分愛惜當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長期打算，避免濫用和浪費。這不但是爲着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是爲着建設新中國。

在推進解放區的各項工作時，必須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業，必須十分注意從本地人民優秀分子中大批地培養本地的工作幹部。一切從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滿腔熱情地勤勤懇懇地並適合情況地去幫助本地幹部，愛惜他們，如同愛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那就不能完成農村民主革命這個偉大的任務。

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每到一地，就應立即幫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組織以本地人民的幹部爲領導的民兵和自衛軍，而且要組織以本地人民的幹部爲領導的地方部隊和地方兵團。然後，就

可以產生有本地人領導的主力部隊和主力兵團。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如果不能完成此項任務，就不能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也不能發展人民的軍隊。

當然，一切本地人，應當熱烈地歡迎和幫助從外地去的革命工作人員和人民軍隊。

關於對待暗藏的民族破壞分子的問題，必須提起大家的注意。因為公開的敵人，公開的民族破壞分子，容易識別，也容易處置；暗藏的敵人，暗藏的民族破壞分子，就不容易識別，也就不容易處置。因此，對於這後一種人必須採取嚴肅態度，而在處理時又要採取謹慎態度。

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中國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存在。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以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

我們的大會應向各解放區人民提議，盡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以便討論統一各解放區的行動，加強各解放區的抗日工作，援助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援助淪陷區人民的地下軍運動，促進全國人民的團結和聯合政府的成立^(三)。中國解放區現在已經成了全國廣大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全國廣大人民的希望寄託在我們身上，我們有責任不要使他們失望。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集，將對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起一個巨大的推進作用。

五 全黨團結起來，爲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

同志們，我們已經了解了我們的任務和我們爲完成這些任務所採取的政策，那末，我們應該用怎樣的工作態度去執行這些政策和完成這些任務呢？

目前國際國內的形勢，在我們和中國人民面前顯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備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這是顯然的，毫無疑義的。但是同時，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困難條件。誰要是只看見光明一面，不看見困難一面，誰就會不能很好地爲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

我們的黨和中國人民一道，不論在整個黨的二十四年歷史中，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爲中國人民創造了巨大的力量，我們的工作成績是很顯然的，毫無疑義的。但是同時，我們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缺點。誰要是只看見成績一面，不看見缺點一面，誰也就不會很好地爲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

中國共產黨自從一九二一年誕生以來，在其二十四年的歷史中，經歷了三次的偉大鬥爭，這就是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現在還在進行之抗日戰爭。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爲基礎的黨，這是因爲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

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羣衆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鬥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羣衆的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爲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做了。我們黨的發展和進步，是從同一切違反這個真理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作堅決鬥爭的過程發展和進步起來的。教條主義脫離具體的實踐，經驗主義把局部經驗誤認爲普遍真理，這兩種機會主義的思想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我們黨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奮鬥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這些錯誤思想，使得我們的黨在思想上極大地鞏固了。我們黨現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萬黨員。其中絕大多數是在抗日時期入黨的，在他們之中存在着各種不純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黨的黨員中，也有這種情形。幾年來的整風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這些不純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糾正。今後應當繼續這種工作，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開黨內的思想教育。必須使各級黨的領導骨幹都懂得，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羣衆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羣衆，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的

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羣衆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繫羣衆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羣衆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羣衆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麼人有了這類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為它們脫離羣衆。我們的代表大會應該號召全黨提起警覺，注意每一個工作環節上的每一個同志，不要讓他脫離羣衆。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羣衆，細心地傾聽羣衆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裏的羣衆打成一片，不是高踞於羣衆之上，而是深入於羣衆之中；根據羣衆的覺悟程度，去啓發和提高羣衆的覺悟，在羣衆出於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羣衆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爲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鬥爭。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羣衆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羣衆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爲自己了解了的東西，廣大羣衆也和自己一樣都了解了。羣衆是否已經了解並且是否願意行動起來，要到羣衆中去考察才會知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後於羣衆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羣衆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爲自己還不了解的東西，羣衆也一概不了解。許多時候，廣大羣衆跑到我們的前頭去了，迫切地需要前進一步了，我

們的同志不能做廣大羣衆的領導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後分子的意見，並且將這種落後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羣衆的意見，做了落後分子的尾巴。總之，應該使每個同志明瞭，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羣衆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羣衆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誌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於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麼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捨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

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爲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

同志們，我們的大會閉幕之後，我們就要上戰場去，根據大會的決議，爲着最後地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而奮鬥。爲達此目的，我們要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我重說一遍，不管什麼階級，什麼政黨，什麼社會集團或個人，只要是贊成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我們就要加以聯合。爲達此目的，我們要把我們黨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紀律的原則之下，堅強地團結起來。不論什麼同志，只要他是願意服從黨綱、黨章和黨的決議的，我們就要和他團結。我們的黨，在北伐戰爭時期，不超過六萬黨員，後來大部分被當時的敵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不超過三十萬黨員，後來大部分也被當時的敵人打散了。現在我們有了一百二十多萬黨員，這一回無論如何不要被敵人打散。只要我們能吸取三個時期的經驗，採取謙虛態度，防止驕傲態度，在黨內，和全體同志更好地團結起來，在黨外，和全國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就可以保證，不但不會被敵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堅決、澈底、乾淨、全部地消滅掉，並且在消滅他們之後，把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建設起來。

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

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們，有了三次革命經驗的中國共產黨，我堅決相信，我們是能够完成我們的偉大政治任務的。成千成萬的先烈，爲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不久就要誕生了，讓我們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吧！

〔註釋〕

〔一〕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是一九三六年九月，由一二九運動中的先進青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所組織的革命青年團體。抗日戰爭爆發後，許多民先隊員參加了戰爭和建立敵後根據地的工作。國民黨統治地區的民先隊組織，一九三八年被蔣介石政府強迫解散。在解放區的民先隊組織，後來併入更廣泛的青年團體青年救國會。

〔二〕參看本書「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一文所列舉蔣介石發動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實。

〔三〕斯科比是英帝國主義派駐希臘的侵略軍的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寇在歐陸敗退，斯科比率領英軍，帶着流亡在倫敦的希臘反動政府，進入希臘。他指使並協助希臘反動政府進攻長期英勇抵抗德寇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屠殺希臘愛國人民，把希臘投入恐怖的血海中。

〔四〕保甲制度是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基層政治制度。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蔣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頒佈「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其中規定：「保甲之編組以戶爲單位，戶設戶長，十戶爲甲，甲設甲長，十甲爲保，保設保長」，實行各戶互相監視和互相告發的連坐法，以及各項反革命的強迫勞役辦法。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國民黨政府便正式宣佈在它所統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這種法西斯統治制度。

〔五〕指國民黨政府所實行的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教育。

〔六〕開羅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國在埃及京城開羅所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這次會議發表了中美英三國開

羅宣言。這個宣言會對將台灣等地歸還中國作了明確的規定。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國政府公然背棄了這一協議，派遣海軍控制台灣，企圖剝奪中國對台灣的領土主權。

〔七〕峨嵋山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名山。毛澤東同志在這裏用來指蔣介石統治集團在抗日戰爭中當作最後巢穴的四川山地。

〔八〕見本書第二卷「必須制裁反動派」、「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等文。

〔九〕引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孫中山的「北上宣言」。

〔一〇〕這是指蔣介石在他的反革命小冊子「中國之命運」內的胡說。

〔一一〕大西洋憲章是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大西洋會議結束時聯合發表的一個文件。莫斯科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月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德黑蘭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蘇美英三國於伊朗京城德黑蘭舉行的會議。克里米亞會議是一九四五年二月蘇美英三國在蘇聯南部克里米亞半島雅爾塔所舉行的會議。當時所有這些國際會議都決定以聯合的力量擊敗法西斯德國和日本，並在戰後防止侵略勢力和法西斯殘餘的再起，維持世界和平，贊助各國人民的獨立民主的願望。但在戰後，美英政府即背棄和破壞了這些國際協議。

〔一二〕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月，蘇美英中四國代表按照莫斯科會議和德黑蘭會議的決定，在美國敦巴頓橡樹林舉行會議，草擬了聯合國機構的組織草案。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在美國舊金山召開了有五十個國家代表參加的聯合國大會，當時中國解放區也派遣了董必武同志為代表參加這次會議。

〔一三〕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在延安成立了「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並由各解放區代表共同開過一次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日本投降後，因時局變化，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沒有召開。

愚公移山*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大概三件事了」

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我們做了三件事：第一，決定了黨的路綫，這就是放手發動羣衆，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第二，通過了新的黨章。第三，選舉了黨的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今後的任務就是領導全黨實現黨的路綫。我們開了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代表們對三個報告已發表了很好的意見。許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評，從團結的目標出發，經過自我批評，達到了團結。這次大會是團結的模範，是自我批評的模範，又是黨內民主的模範。

大會閉幕以後，很多同志將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將要分赴各個戰場。同志們到各地去，要宣傳大會的路綫，並經過全黨同志向人民作廣泛的解釋。

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綫，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够，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羣衆覺悟，甘心情願和我們一起奮鬥，去爭取勝利。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

「建立五萬戶」
「勝利的心」

不是反動派的。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說是你們這樣幹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却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爲什麼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昨天有兩個美國人要回美國去，我對他們講了，美國政府要破壞我們，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反對美國政府扶蔣反共的政策。但是我們第一要把美國人民和他們的政府相區別，第二要把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員相區別。我對這兩個美國人說：告訴你們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我們解放區禁止你們到那裏去，因爲你們的政策是扶蔣反共，我們不放心。假如你們是爲

了打日本，要解放區是可以去的，但要訂一個條約。倘若你們偷偷摸摸到處亂跑，那是不許可的。赫爾利已經公開宣言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三)，既然如此，爲什麼還要到我們解放區去亂跑呢？

平清盛、反印
的逆流一定被克
服

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說明了美國反動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動派的阻止中國人民勝利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動的逆流企圖壓倒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爲主流。現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說過的一樣，舊世界有三個大矛盾：第一個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個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第三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帝國主義宗主國之間的矛盾^(四)。這三種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發展得更尖銳了，更擴大了。由於這些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所以雖有反蘇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這種反動逆流總有一天會要被克服下去。

現在中國正在開着兩個大會，一個是國民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一個是共產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兩個大會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個要消滅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勢力，把中國引向黑暗；一個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中國封建勢力，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把中國引向光明。這兩條路綫在互相鬥爭着。我們堅決相信，中國人民將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的路綫的領導之下，得到完全的勝利，而國民黨的反革命路綫必然要失敗。

〔註釋〕

〔一〕指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同志所作的政治報告，朱德同志所作的軍事報告和劉少奇同志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二〕愚公移山的故事，見『列子』『湯問』篇：『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三〕赫爾利，美國共和黨的反動政客之一。他在一九四四年底任美國駐中國大使，因支持蔣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迫宣佈離職。赫爾利公開宣言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是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他在華盛頓國務院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詳見本書『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一文。

〔四〕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一部分『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

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

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我們的軍隊在遭受極端物質困難的目前狀況之下，在分散作戰的目前狀況之下，切不可將一切物質供給責任都由上面領導機關負起來，這樣既束縛了下面廣大人員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滿足下面的要求。應該說：同志們，大家動手，克服困難吧。只要上面善於提出任務，放手讓下面自力更生，問題就解決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決它。如果上面不去這樣作，而把一切事實上擔負不起來的担子老是由自己担起來，不敢放手讓下面去做，不去發動廣大羣衆自力更生的積極性，雖然上面費盡了氣力，結果將是上下交困，在目前條件下永遠也不能解決問題。幾年來的經驗，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原則，已被證明是我們解放區在目前條件下組織一切經濟生活的正確的原則。

解放區的軍隊，已經達到了九十多萬。爲着打敗日本侵略者，還需要擴大軍隊到幾個九十萬。但是我們還沒有外援。就是假定將來有了外援，生活資料也只能由我們自己來供給，這是一點主觀主義

也來不得的。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團，離開現在分散作戰的地區，到一定的攻擊目標上去作戰。這種集中行動的大兵團，不但不能生產自給了，而且需要後方的大量的物質供給；只有被留下來的地方部隊和地方兵團（其數目將還是廣大的），還能照舊一面作戰，一面生產。照此看來，我們全軍應趁目前的時機，在不妨礙作戰和訓練的條件之下，一律學會完成部分的生產自給的任務，難道還有疑問嗎？

軍隊的生產自給，在我們的條件下，形式上是落後的、倒退的，實質上是進步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在形式上，我們違背了分工的原則。但是，在我們的條件下——國家貧困、國家分裂（這些都是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所造成的罪惡結果）以及分散的長期的人民游擊戰爭，我們這樣做，就是進步的了。大家看，國民黨的軍隊面黃肌瘦，解放區的軍隊身強力壯。大家看，我們自己，在沒有生產自給的時候，何等困難，一經生產自給，何等舒服。現在，讓我們面前的兩個部隊，例如說兩個連，去選擇兩種辦法中的一種：或者由上面全部供給生活資料；或者不給它或少給它，讓它全部、大部、半部或小部地生產自給。那一種結果要好些？那一種它們願意接受些呢？在認真地試行一年生產自給之後，一定會認為後一種辦法結果要好些，願意接受它；一定會認為前一種辦法結果要差些，不願意接受它。這是因為後者能使我們部隊的一切成員改善生活；而前者，在目前的物質困難條件

下，無論怎樣由上面供給，也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至於因為我們採用了這種表面上『落後的』、『倒退的』辦法，而使我們的軍隊克服了生活資料的困難，改善了生活，個個身強力壯，足以減輕同在困難中的人民的賦稅負擔，因而取得人民的擁護，足以支持長期戰爭，並足以擴大軍隊，因而也就能够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達到最後地消滅侵略者，解放全中國的目的。這種歷史意義，難道還不偉大嗎？

軍隊生產自給，不但改善了生活，減輕了人民負擔，並因而能够擴大軍隊，而且立即帶來了許多副產物。這些副產物就是：（一）改善官兵關係。官兵一道生產勞動，親如兄弟了。（二）增強勞動觀念。我們現行的，既不是舊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徵兵制，而是第三種兵役制——動員制。它比募兵制要好些，它不會造成那樣多的二流子，但比徵兵制要差些。我們目前的條件，還只許可我們採取動員制，還不能採取徵兵制。動員來的兵要過長期的軍隊生活，將減弱他們的勞動觀念，因而也會產生二流子和沾染軍閥軍隊中的若干壞習氣。生產自給以來，勞動觀念加強了，二流子的習氣被改造了。（三）增強紀律性。在生產中執行勞動紀律，不但不會減弱戰鬥紀律和軍人生活紀律，反而會增強它們。（四）改善軍民關係。部隊有了家務，侵害老百姓財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沒有了。在生產中，軍民變工互助，更增強他們之間的友好關係。（五）軍隊埋怨政府的事也會少了，軍政關係也好了。（六）促進人民的大生產運動。軍隊生產了，機關生產更顯得必要，更有勁了；全體人民的普遍增產運動，當然也更顯得必要，更有勁了。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兩年先後開始的帶普遍性的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曾經分別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質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決定性的作用。這兩個環子，如果不在適當的時機抓住它們，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鏈條，而我們的鬥爭也就不能繼續前進。

大家明白，我們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黨的黨員，剩下的不過數萬人，而我們現在的黨員是一百二十多萬，其中大多數是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他們有很可愛的革命積極性，並願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但是，他們是帶了他們原來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入黨的。這種情形，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黨的黨員中也是存在着的。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矛盾，一個絕大的困難。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不進行一個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即整風運動，我們還能順利地前進嗎？顯然是不能的。但是，我們在大量幹部中解決了和正在解決着這個矛盾——黨內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其中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甚至地主階級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之間的矛盾，即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我們的黨就能夠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空前統一地（不是完全統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穩步地前進了。在今後，我們黨還會，也還應該有更大的發展，而我們是能夠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原則下更好地掌握將來的發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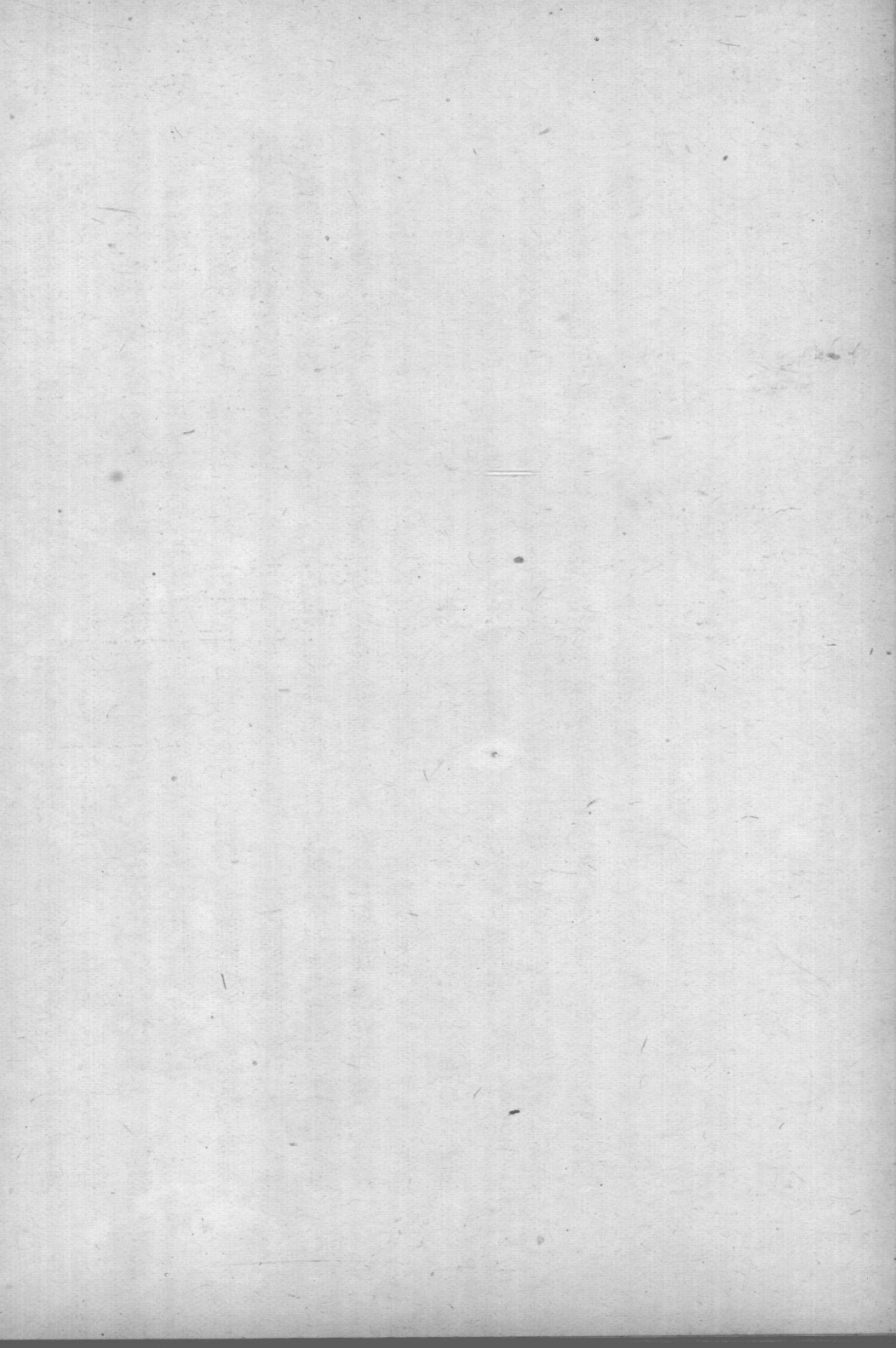
另一個環子是生產運動。抗戰八年了，我們開頭還有飯吃，有衣穿。隨後逐步困難起來，以至於大困難：糧食不足，油鹽不足，被服不足，經費不足。這是伴隨着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敵人大舉進攻和國民黨政府發動三次大規模反人民鬥爭（所謂『反共高潮』）而來的絕大的困難，絕大的矛盾。

如果不解決這個困難，不解決這個矛盾，不抓住這個環節，我們的抗日鬥爭還能前進嗎？顯然是不能的。但是我們學會了並且正在學會着生產，這樣一來，我們又活躍了，我們又生氣勃勃了。再有幾年，我們將不怕任何敵人，我們將要壓倒一切敵人了。

這樣看來，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具有何種歷史重要性，是明白無疑的了。

讓我們進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廣這兩大運動，以爲其他各項戰鬥任務的基礎。果能如此，那末，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目前正當春耕時節，希望一切解放區的領導同志、工作人員、人民羣衆，不失時機地掌握生產環節，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績。特別是那些還沒有學會生產的地區，今年應當更大地努一把力。



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

以粉飾蔣介石獨裁統治爲目的而召集的四屆國民參政會，七月七日在重慶開會。第一次會議到會者之少，爲歷屆參政會所未有。不但中共方面無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定數二百九十名的參政員中，出席的僅有一百八十名。蔣介石在開幕時說了一通話。蔣介石說：『政府對於國民大會召集有關的問題，擬不提出任何具體的方案，可使諸君得以充分的討論。政府準備以最誠懇坦白的態度，聆取諸位對於這些問題的意見。』所謂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場了。這件公案，也和帝國主義者赫爾利有關係。原來這位帝國主義者是極力慫恿蔣介石幹這一手的，蔣介石的腰這才敢於在今年元旦的演說（一）裏稍稍硬了起來，至三月一日的演說（二）而大硬，說是一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還政於民』。在蔣介石的三月一日的演說裏，對於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開黨派會議和成立聯合政府一項主張，則拒之於千里之外。對於組織一個所謂有美國人參加的三人委員會來『整編』中共軍隊，則吹得得意忘形。蔣介石竟敢說：中共必須先將軍隊交給他，然後他才賞賜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這一切，赫爾利老爺的撐腰起了決定的作用。四月二

日，赫爾利在華盛頓發表聲明，除了抹殺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動，宣稱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國主義的濫調而外，還極力替蔣介石的『國民大會』等項臭物捧場。如此，美國的赫爾利，中國的蔣介石，在以中國人民爲犧牲品的共同目標下，一唱一和，達到了熱鬧的頂點。從此以後，似乎就走上了洩氣的命運。反對者無論在中國人和外國人中，在國民黨內和國民黨外，在有黨派人士和無黨派人士中，到處皆是，不計其數。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赫爾利蔣介石這一套，不管他們怎樣吹得像煞有介事，總之是要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進一步破壞中國人民的團結，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從而也破壞美國人民及其他同盟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後和平共處的共同利益。到了今天，赫爾利不知在忙些什麼，總之是似乎暫時地藏起來了，却累得蔣介石在參政會上說些不三不四的話。三月一日蔣介石說：『我國情形與他國不同，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我們便無一個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諮詢民意之負責團體。』既然如此，不知道我們的委員長爲什麼又向參政會『聆取』起『意見』來了。按照委員長的說法，中國境內是並無任何『可以諮詢民意的負責團體』的，參政會不過是一個吃飯的『團體』而已，今天的『聆取』，於法無據。可是不管怎樣，只要參政會說一聲停開那個僞造的『國民大會』，就說違反了三月一日的聖旨，犯了王法，也算做了一回好事，積了一件功德。當然，今天來評論參政會，爲時尚早，因爲參政會究竟拿什麼東西讓委員長『聆取』，還要等幾天才能看到。不過有

一點是確實的：自從中國人民羣起反對之後，就是熱心『君主立憲』的人們也替我們的君主擔憂，勸他不要套上被稱爲豬仔國會的那條絞索，謹防袁世凱來找替死鬼。因此，我們的君主就此縮手，也未可知。然而我們的君主及其左右，是決不讓人民輕易獲得絲毫權力而使他們自己損失一根毫毛的。眼前的證據，就是這位君主將人民的合理批評，稱之爲『肆意攻擊』。據說，『在戰爭狀況之下，淪陷區域勢必無法舉行任何普遍的選舉。因此，在兩年以前，國民黨中央全會乃有於戰事結束一年以內召開國民大會、實行憲政的決定。若干方面，當時會肆意攻擊』，以爲遲了。及至他『鑒於戰事的完全結束爲時容或延長，即使戰事結束後各地秩序亦未必能於短時期內恢復，所以主張在戰局穩定之時即行召集國民大會』，不料那些人們又『肆意攻擊』。這樣一來，鬧得我們的君主很不好辦。但是中國人民必須教訓蔣介石及其一羣：對於違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騙，不管你們怎樣說和怎樣做，是斷乎不許可的。中國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實行民主改革，例如釋放政治犯，取消特務，給人民以自由，給各黨派以合法地位等項。對於這些，你們一件也不做，却在所謂召開『國民大會』的時間問題上耍花樣，這是連三歲小孩子也欺騙不了的。沒有認真的起碼的民主改革，任何什麼大會小會也只能被拋到毛屎坑裏去。就叫做『肆意攻擊』也罷，任何這類的欺騙，必須堅決、澈底、乾淨、全部地攻擊掉，決不容許保留其一絲一毫。這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因爲它是欺騙。有無國民大會是一件事，有無起碼的民主改革又是一件事。可以暫時沒有前者，不可以不立即實施後者。蔣介石及其一羣，既然願意『提早』『還政於民』，爲什麼不願意『提早』實施若干起碼的民主改革？國民黨的先生們，當我寫這最後幾行時，

你們得承認，中國共產黨人總算不是向你們『肆意攻擊』，僅僅提出一個問題，難道也不應該麼？難道你們也可以置之不答麼？你們得答覆這個問題：爲什麼你們願意『還政於民』，却不願意實行民主改革呢？

〔註釋〕

〔一〕這是指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蔣介石的廣播演講。他在講演裏對過去一年國民黨軍隊在日寇進攻前面所表現的可恥的潰敗一字不提，反而大肆污蔑人民，反對全國人民和各抗日黨派所擁護的關於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及成立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的主張，而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並拿出準備召開爲全國人民所唾棄的國民黨御用的所謂『國民大會』，作爲反對人民的擋箭牌。

〔二〕這是指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蔣介石在重慶憲政實施協進會上的演說。蔣介石除堅持『元旦演說』的反動主張之外，又提出組織由美國代表參加的三人委員會來『整編』八路軍新四軍，公開地要求美帝國主義者來干涉中國的內政。

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

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爲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越來越明顯地造成了中國內戰的危機。堅持反動政策的國民黨政府，從它在十八年前成立之日起，就是以內戰爲生活的；僅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和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入中國本部這樣的時機，才被迫暫時地放棄全國規模的內戰。但從一九三九年，局部的內戰又在發動，並且沒有停止過。國民黨政府在其內部的動員口號是『反共第一』，抗日被放在次要的地位。目前國民黨政府一切軍事佈置的重心，並不是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向着中國解放區『收復失地』和消滅中國共產黨方面。不論是爲着抗日戰爭的勝利，或是戰後的和平建設，這種情況均須嚴重地估計到。羅斯福總統在世時，他是估計到了這一點的，爲了美國的利益，他沒有採取幫助國民黨以武力進攻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爾利以羅斯福私人代表的資格來到延安的時候，他曾經贊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計劃。但是他後來變卦了，赫爾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說的話。這樣一種變卦，露骨地表現於四月二日赫爾利在華盛頓所發表的聲明，這時候，在同一個赫爾利的嘴裏，以蔣介石爲代表的國民黨政府變

成了美人，而中共則變成了魔怪；並且他率直地宣稱：美國只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當然這不只是赫爾利個人的意見，而是美國政府中的一羣人的意見，但這是錯誤的而且危險的意見。就在這個時候，羅斯福去世了，赫爾利得意忘形地回到重慶的美國大使館。這個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危險性，就在於它助長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增大了中國內戰的危機。假如赫爾利政策繼續下去，美國政府便將陷在中國反動派的又臭又深的糞坑裏拔不出腳來，把它自己放在已經覺醒和正在繼續覺醒的幾萬萬中國人民的敵對方面，在目前，妨礙抗日戰爭，在將來，妨礙世界和平。這一種必然的趨勢，難道還看不清楚麼？在中國的前途這個問題上，看清楚了中國人民要求獨立、自由、統一的不可阻止的勢力必然要代替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而勃興的美國一部分輿論界，對於赫爾利式的危險的對華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們要求改變這個政策。但是，美國的政策究竟是否改變和那一天才改變，今天我們還不能說什麼。可以確定地說的，就是贊助中國反人民勢力和以如此廣大的中國人民為敵的這個赫爾利式的政策，如果繼續不變的話，那就將給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以千鈞重負和無窮禍害，這一點，必須使美國人民認識清楚。

給福斯特同志的電報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福斯特同志和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欣悉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特別會議決定拋棄白勞德的修正主義的即投降主義的路綫〔一〕，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並已恢復了美國共產黨。我們對於美國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謹致熱烈的祝賀。白勞德的整個修正主義——投降主義路綫（這條路綫充分表現於白勞德所著『德黑蘭』一書中），本質上是反映了美國反動資本集團在美國工人運動中的影響。這個反動資本集團現在也正在力圖擴大其影響於中國，贊助中國國民黨內反動集團的反民族反人民的錯誤政策，使中國人民面臨着嚴重的內戰危機，危害中美兩大國人民的利益。美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美國共產黨反對白勞德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勝利，對於中美兩國人民目前所進行的反日戰爭和戰後建設和平民主世界的偉大事業，無疑地將有重大的貢獻。

〔註 釋〕

〔一〕白勞德是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四年美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共產黨內以白勞德爲代表的右傾思想，曾經形成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投降主義路線。白勞德從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起，在許多講演和論文中，鼓吹這種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主張，並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出版了作爲他的右傾機會主義綱領的『德黑蘭』一書。白勞德「修正」了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理論，否認美國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認爲它還「保持着青年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一些特點」，認爲美國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之間有「共同利害」，主張保護托拉斯制度，夢想經過「階級調和」來避免美國資本主義所不可避免的危機。白勞德從對美國資本主義的荒謬估計出發，從對壟斷資本本作階級合作的投降主義的路綫出發，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主持解散了美國無產階級的政黨——美國共產黨，而另行組織非黨的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白勞德的這一錯誤路線一開始就遭到以福斯特同志爲首的許多美國共產黨員的反對。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在福斯特同志領導下，通過批判白勞德路線的決議。同年七月，又舉行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特別全國代表會議，決定澈底糾正白勞德路線，重建美國共產黨。白勞德後來仍然堅持其販賣無產階級的主張，公開擁護杜魯門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並進行反黨的派別活動，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二月被驅逐出黨。

對日寇的最後一戰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八月八日，蘇聯政府宣佈對日作戰，中國人民表示熱烈的歡迎。由於蘇聯這一行動，對日戰爭的時間將大大縮短。對日戰爭已處在最後階段，最後地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到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奪取其武器和資財，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必須放手組織武裝工作隊，成百隊成千隊地深入敵後之敵後，組織人民，破擊敵人的交通綫，配合正規軍作戰。必須放手發動淪陷區的千百萬羣衆，立即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配合從外部進攻的軍隊，消滅敵人。解放區的鞏固工作仍應注意。今冬明春，應在現有一萬萬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區的人民中，普遍地實行減租減息，發展生產，組織人民政權和人民武裝，加強民兵工作，加強軍隊的紀律，堅持各界人民的統一戰綫，防止浪費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爲着加強我軍對敵人的進攻。全國人民必須注意制止內戰危險，努力促成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新階段已經到來了，全國人民應該加強團結，爲奪取最後勝利而鬥爭。

